



READERS

读者®

■ 熬出来的胜利

■ 永远的“笳吹弦诵”

■ 珍惜生命，远离股市



ISSN 1005-18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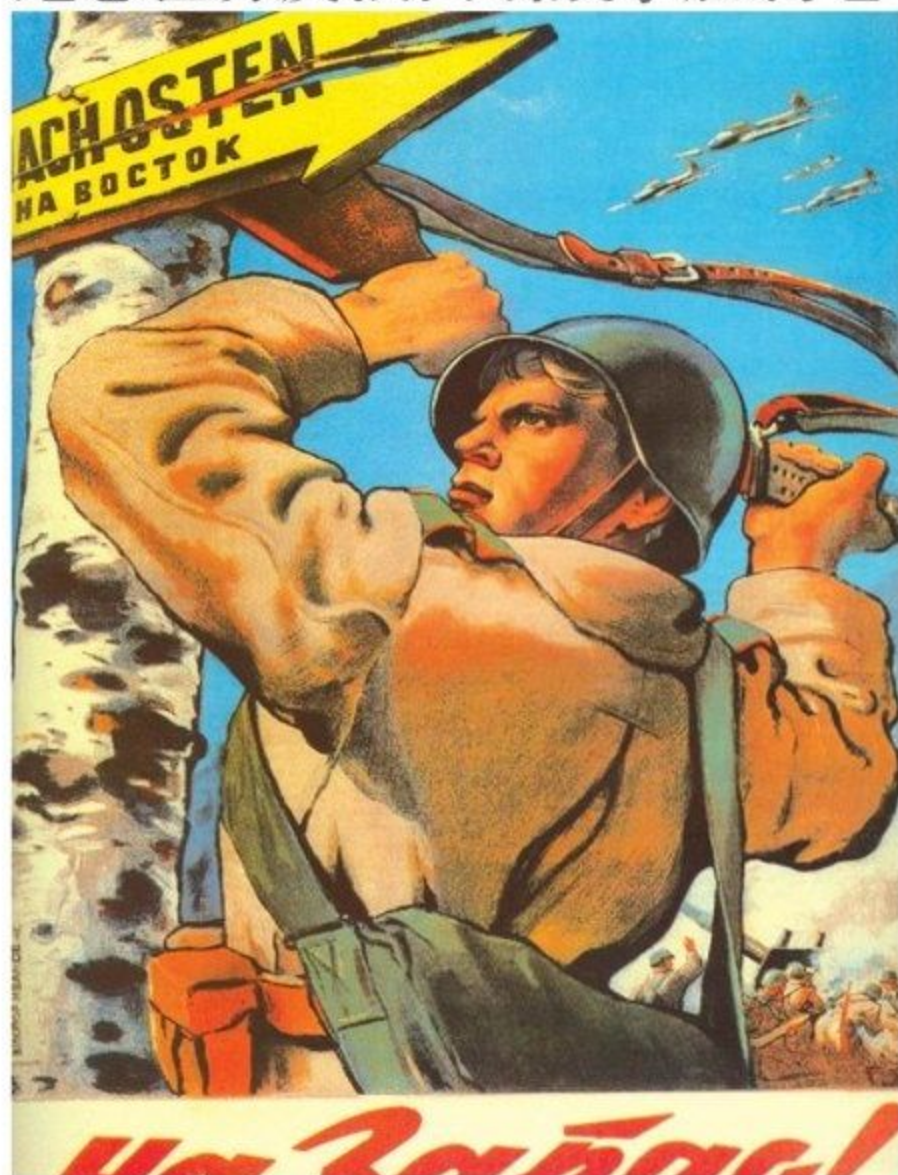


扫描二维码 关注《读者》

2015·18

主办：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总第599期 九月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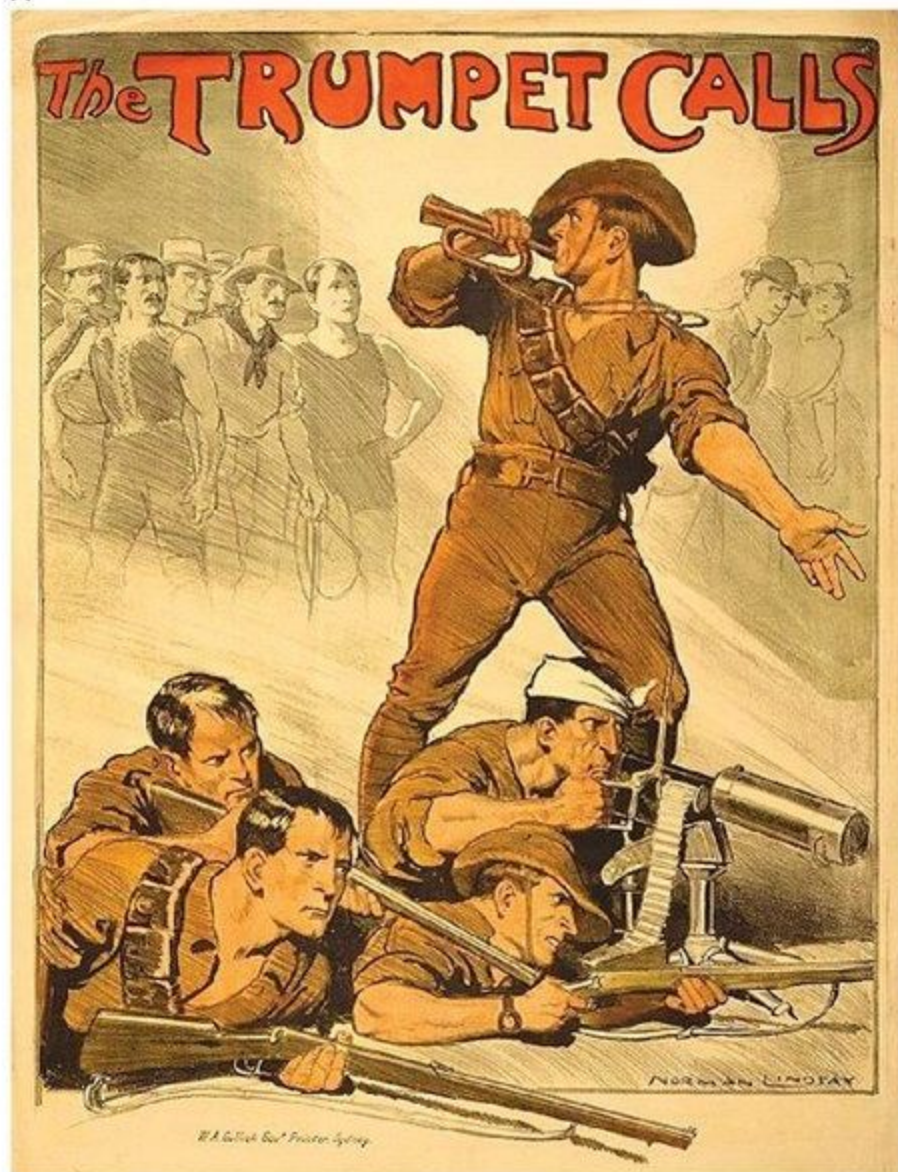
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海报欣赏



A



B



C



D

(A苏联 B荷兰 C澳大利亚 D荷兰)

脸红

◎狄 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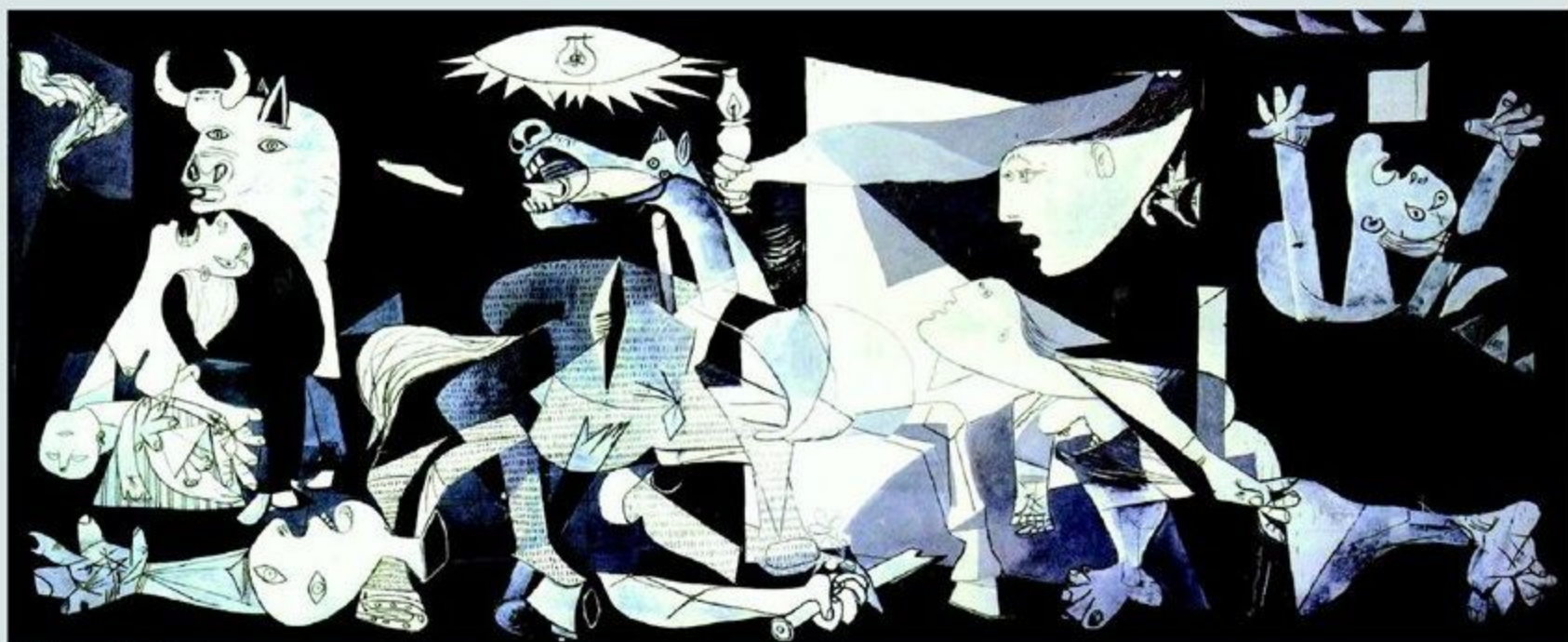
在“二战”最艰苦的时期，为节约能源，英国的伦敦、伯明翰等大城市的火车站售票处，都立有一面宣传牌，上面写道：“你有必要开始这次旅行吗？”很多英国人因此放弃了远行，把省下的车票钱投入设在车站的募捐箱内，用以抗击纳粹。

据说，那些因公务需要或家有急事而不得不选择乘坐火车的人，都会竖起衣领，行色匆匆，他们不仅怕被藏在火车站角落里的记者偷拍，更怕遇到熟人。即使面对检票员，他们也常常不自觉地脸红……

我理解这种脸红，显然并非因为他们做了什么错事，而是出于一种本能，就像他们真的做了亏心事。虽然他们选择乘坐火车有不得已的原因，也属个人自由，却依然会为此而感到不好意思。

依照弗洛姆的理论，人会感到不好意思，是文明的一种体现。在亚当和夏娃为赤身裸体而脸红的那一刻，文明就产生了。达尔文在书中就曾以整整一章的篇幅，探讨“人为什么会脸红”这个看似无足轻重的话题。他以自己深谙的生物学的逻辑推理方式，抽丝剥茧，反复论证，最后得出结论——人是地球上唯一会脸红的动物。或许正因为懂得脸红，人才是地球上唯一配得上“文明”二字的动物。当然，文明并非与生俱来，它需要后天成长环境的熏染、社会教育的养成，并且还需要时间的沉淀。

（王 筱摘自《今晚报》）



《格尔尼卡》毕加索绘



ISSN 1005-1805

CN 62-1118/Z

·主管/主办·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人 吉西平

编委会执行主任 陈泽奎

编辑出版 读者杂志社

社长 总编辑 富康年

常务副社长 副总编辑 宁 恢

副社长 侯润章 袁勤怀 任 伟
副总编辑

·编辑部·

主 任 张 涛

副主任 陈天竺

责任编辑 李 霞

编辑 贾 真 孙烈举

蔡 喆 马逸尘

美术编辑 刘全镭

制版 祁国宏

·发行印制部·

(0931) 8773310(传真)

副总监 刘志伟 8773036

区域发行经理

王 焱 8773039 姚宏霞 8773054

雷 洋 8773094 夏玉柱 8773092

胡慧雄 8845947

·广告部·

(0931) 8773029(传真)

总 监 杜孟瑛 8773309

广告经理 韩学斌 8773073

尹 莲 8773042

·品牌发展和综合部·

主 任 王 玮 (0931)8722496

行政助理 王 丹 8773070

品牌助理 樊又菲 8176293

稿 酬 叶丽琼 8773352

邮 购 白熠峰 8773350

陈志明 8773241

·新媒体部·

北京读者天元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李 进 (010)64701208

经理(兰州) 周 丹 (0931)8773170

目 录 2015年第18期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

- | | |
|-----------------|---------|
| 4 / 熬出来的胜利 | 刘 统 |
| 13 / 关于“二战”的冷知识 | |
| 14 / “二战”历史漫画 | |
| 16 / 希望的种子 | 魏清潮 |
| 24 / 永远的“笳吹弦诵” | 陈平原 |
| 28 / 无可争辩的事实 | 查尔斯·斯文尼 |
| 34 / 记录抗战历史的苦行僧 | 卓成华 |
| 62 / 寿山先生 | 李春雷 |
| 64 / 迟到半个世纪的荣誉 | 张达明 |

文 苑

- | | | |
|--------|-------------|-----|
| 【卷首语】 | 1 / 脸红 | 狄 青 |
| 【文 苑】 | 19 / 出租车司机 | 阎连科 |
| | 37 / 生活就是哲学 | 傅佩荣 |
| | 51 / 人之调和 | 何鑫业 |
| | 53 / 安静 | 龙应台 |
| | 58 / 美丽的藩篱 | 刘心武 |
| | 59 / 下酒 | 蔡 澜 |
| 【书林一叶】 | 20 / 向死而生 | 李开复 |
| | 70 / 狼的尊严 | 姜 戎 |

人 物

- | | | |
|--------|-------------|-----|
| 【名人轶事】 | 41 / 胡雪岩的考题 | 何慧慧 |
| | 57 / 最后的计算 | 王吴军 |

社 会

- | | | |
|--------|--------------------|-----|
| 【杂谈随感】 | 50 / 说“孩子话” | 魏蕊蕊 |
| | 52 / “有话”和“没话” | 林 希 |
| | 54 / 国外演讲与名牌内裤 | 莫 言 |
| | 60 / 你可能一辈子都无法这样旅行 | 西门湄 |

- | | | |
|--------|----------------|-----|
| 【社会之窗】 | 46 / 珍惜生命，远离股市 | 李晓鹏 |
|--------|----------------|-----|

人 生

- | | | |
|--------|----------------|------|
| 【人世间】 | 40 / 台湾老兵的两个故乡 | 蒋一谈 |
| 【人生之旅】 | 32 / 听见流星的声音 | 梁朝伟 |
| | 61 / 一个人的倾城之恋 | 晚睡姐姐 |



首届
国家期刊奖



第二届
国家期刊奖



第三届
国家期刊奖



双高期刊

(总第599期) 九月(下)

人生

- 【婚姻家庭】 26 / 这才是爱情里最重要的事 李筱懿
68 / 我与妻子的传奇缘分 余杰
- 【两代之间】 31 / 父亲的心肝 张国立
48 / 离别 于建嵘
49 / 转变 侯文咏

生活

- 【心理人生】 22 / 在任何一种生活里都能找到幸福 金星
67 / 民意是如何被篡改的 宋桂奇
- 【生活之友】 69 / 第四种说话之道 游识猷
- 【经营之道】 71 / 不增产的法拉利跑车 周牧辰

文明

- 【文化茶座】 56 / 大树底下不长草 李国文
66 / 总防范别人, 自己先犯错 罗振宇
- 【军事天地】 42 / 别人“家”的阅兵 韩旭阳

悦读

- 【言论】 23 / 言论
- 【漫画与幽默】 38 / 漫画与幽默
- 【影像】 44 / 老街·小店·旧时光 John Salminen

点滴

- 【意林】 65 / 安闲清福 那秋生
65 / 尊重 李广森
65 / 大雨 黄惠子
- 【点滴】 21 / 在这个世界慢慢地行走 朱德庸
27 / 青蛇 李碧华
30 / 中年与学力 林国卿
33 / 沉静与狂喜 李银河

互动

- 【互动】 72 / “《读者》光明行动”(29)

艺术

- 【封面】 铭刻(设计作品) 墨者

(((· 联系我们 ·)))

杂志社电话 (0931)8773352

杂志社传真 (0931)8773353

文字投稿 duzhe@duzhe.cn

美术投稿 duzhe.ms@duzhe.cn

通讯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中央广场邮局

《读者》信箱 730030

社址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568号

读者网 www.duzhe.com

《读者》微信 [duzheweixin](https://www.duzhe.com)

《读者》微博 @读者



· 更便捷实惠的阅读 ·

《读者》Web版 通过读者网订购

《读者》iPad版 苹果应用商店搜索读者

《读者》数字版 龙源期刊网、亚马逊、掌阅书城等平台均有售, 搜索读者

《读者》手机报 发送短信dub到659000

《读者》手机杂志发送短信KTDZB到

10658080

或扫描二维码订阅



移动用户



电信用户



联通用户

印刷 兰州新华印刷厂

总发行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报刊发行局

出版日期 每月1日、15日

如有印装问题, 请致电: (0931)8773054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甘肃昶泰律师事务所 (0931)8822550

本社所付作者的稿酬, 已包括纸介质及数字形态出版的《读者》杂志的稿酬。因各种原因, 我社未能联系到的作者的稿酬查询及其他有关稿酬的未明事宜, 请与杂志社联系 (0931-8773352)。

《读者》(盲文版) 《读者》(维文版)
《读者》(藏文版) 定期出版



熬出来的胜利

●刘 统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作为一个军事历史的研究者，翻阅那些浩如烟海的历史档案时，心中常常涌起一股激动之情。那些战争的领导者、亲历者写下的电文、报告、总结，都是一个个鲜活的故事，都是可以载入史册的篇章。于是，我循着当年的历史足迹，去感悟前辈们是如何在八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中，战胜日本侵略者的。

一、为什么是持久战

近年来的抗战研究中，大家越来越多地赞扬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发挥的作用。国军进行的一系列大规模会战，才叫气壮山河。而共产党八路军的战斗，规模很小，次数不多，实在没什么可以拔高的。所以似乎大家形成的共识是：国军在抗日正面战场

上起主导作用，八路军在敌后游击，起的只是牵制作用。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国军英勇奋战，为何屡战屡败？共产党在敌后游击，为何把日本人搞得无可奈何？

中日开战，打的就是不对称战争。侵略中国是前日本政府的基本国策，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进入近代社会，工业发展需要资源。而日本最缺的就是资源，于是盯上了中国。战争是最快的发财手段，于是日本以举国之力来了两次豪赌。第一次打清政府，在军队人数和武器装备都处于劣势的条件下打赢了甲午战争，清政府的巨额赔款让日本赚得钵满盆满。第二次打俄国，从俄国人手里把中国的辽东半岛抢到手，大连成了日本侵略中国的第一块跳板。日本人在大连搞经济掠

夺，成立的第一个大公司就是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表面上看，这不就是个修铁路管运输的公司吗？其实“满铁”最大的部门叫调查部，养了几千名调查员。现存的“满铁”档案中记载，日本人走遍了东北、华北的山山水水，将中国的国土资源、政治、经济、文化情况，了解得极为详细具体。这就说明日本的野心根本不在挣点小钱，而是从长远谋划全面占领中国。在开战之前，日本的情报工作无孔不入，精细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举个例子：1928年5月，中共领导人分批秘密前往莫斯科出席“六大”。周恩来扮作古董商人，乘一艘日本客轮，由上海去大连。到大连码头上岸时，日本水上警察厅的警察对周进行盘问。周编了一套简历和社



会关系，日本警察说：“我看你不姓王，而姓周。你不是做古董生意的，而是当兵的。”警察打开抽屉找出档案卡片说，“你就是周恩来。”周恩来大吃一惊，但是日本警察并未逮捕他，而是放他走了。周恩来赶紧毁掉证据，改道去了哈尔滨。

周恩来的经历并非意外，日本的情报机构早就掌握了大量情报。中共在上海的秘密活动，也在日本警方的掌控之中。由此可见，日本在侵略中国的准备过程中，做了多少细致的工作，这样发动的战争，绝非盲目。

而国民党在做什么呢？蒋介石被内战搞得焦头烂额，江西苏区的红军要围剿，阎锡山、冯玉祥在中原和他叫板，各地的土军阀还没收编。所以“九一八”事变日本关东军以两万人的兵力进攻20万人的东北军，蒋介石实在是力不从心，只得依靠国际联盟调停。东北就这样丢了。当蒋介石刚刚签了《国共合作协议》，收编了西南军阀，日本就急不可耐地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因为他们知道，如果让蒋介石建设5年，中国有了实力，日本就打不赢了。

国民党军队被迫抗战时，将领们起初还是有信心的。淞沪会战、徐州会战、南京保卫战，国民党军队的人数是日军的几倍。无论国人如何呐喊声援，等来的却是一次接一次的失败。是国军将士不勇敢吗？不是。战争从来不是单纯凭勇气取胜的，关键在于统帅的决心和部署。说实话，国军将领还不具备指挥现代化战争的能力，参战部队中有战斗力的中央军是少数，多数是杂牌部队，装备和训练水平都很差。每

次会战，国军都是把战线拉开几十里，做宽正面防御。日军虽然人少，但凭着优良的武器和训练有素的战术水平，抓住国军的薄弱环节，一举突破，导致国军全线崩溃。几战下来，国军不仅损失了有生力量，而且在后撤过程中，大量的难民跟着逃，造成了更大的灾难。

当八路军开赴山西抗日前线时，毛泽东表现出一种谨慎和示弱的态度。八路军代表彭雪枫去太原见阎锡山时，毛泽东在电报中嘱咐他：“同各方接洽，在积极推动抗战的总方针下，要有谦逊的态度。不可自夸红军长处，不可说红军抗日一定打胜仗，相反要请教他们各种情况，如日军战斗力、山地战、平原战等红军素所不习的情形，以便红军有所根据，逐渐克服困难。不可隐瞒红军若干不应该隐瞒的缺点，例如：只会打游击战，不会打阵地战；只会打山地战，不会打平原战；只宜于在总的战略下进行独立自主的指挥，不宜于以战役战术上的集中指挥去束缚他，以致失去其长处，这些都应着重说明。”

阎锡山当时组织了20万人的军队，据守忻口、娘子关，准备和日军板垣师团打一场太原保卫战。既然共产党说八路军战斗力不行，那就到敌后去策应配合作战吧。林彪带着一一五师来到平型关，准备打日军的后勤运输线。今天的平型关还保留着历史原貌，关口在山顶上，把着一条上山的羊肠小道。两边的山脊上是古代长城，关后的洼地是屯兵的关城。如果按国军将领的想法，一定是居高临下，据险而守，但是林彪把战场设在山下几

十里的关沟。这是十里长的峡谷，最窄处仅能通过一辆大车。就是从山坡上往下扔石头，也能把沟底的人砸个半死。林彪要在这里打伏击，来场漂亮的歼灭战。果然，日军运粮队排着一字长蛇阵进了沟。林彪一声令下，机枪、手榴弹打得日军措手不及。大家喊着“缴枪不杀”向山沟里冲，想尽快结束战斗。没想到日军往山坡上爬，抢制高点，与八路军战士拼起刺刀。一场肉搏战打到黄昏，以日军全部阵亡结束。

林彪事后的报告说：“敌人确实是有战斗力的。也可以说，我们过去从北伐到苏维埃战争中还不曾碰到过这样强的敌人。我所说的‘强’，是说他们的步兵也有战斗力，能各自为战，虽打败负伤了亦有不肯缴枪的。战后只见战场上尸体遍野，却捉不着活的。敌人射击的准确、运动的隐蔽、部队的掌握，都颇见长。与此种敌人作战，如稍存轻敌观念，做浮躁行动，必易受损失。我们的部队仍不善作疏散队形之战，特别是把敌人打坍台后，大家拢在一起，喧嚷：‘老乡，缴枪啊！’其实对日本人喊‘老乡缴枪’，不但他们不懂，而且他们也不是老乡——这种时候，伤亡往往很多。”

平型关之战，毛泽东是亦喜亦忧。喜的是，八路军打了场胜仗，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士气。

忧的是，奔赴抗日前线的八路军就4万多人，都是长征留下来的宝贝。照平型关战役这样打，打不了几次就损失完了，还怎么抗日？战争的法则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不是头脑一热去牺牲当烈士。从井冈山起家，毛

泽东和红军一直处于弱势，和强大的敌人做斗争，不能采取常规作战的方式，一定要探索出一条新路。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于1938年5月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

谋划战略，首先要认清敌我力量的对比，把自己摆在一个正确的位置上，才能清醒地分析形势，制订策略。毛泽东指出：企图和敌人硬拼的“速胜论”和害怕敌人的“亡国论”都是错误的，现在日本侵略者虽然处于优势，但我们也不是一点办法没有。他分析，“中国是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这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被另一个小而强的国家所攻击。在这样的情况下，敌人占地甚广的现象发生了，战争的长期性发生了。敌人在我们这个大国中占地甚广，但他们的国家是小国，兵力不足，在占领区留了很多空虚的地方。这就给我们开展游击战提供了条件。因此抗日游击战争最主要的不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的战役作战，而是在外线单独作战；因此抗日游击战争就不是小规模，而是大规模的。于是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等一全套的东西都发生了。战争的长期性，随之也是残酷性，规定了游击战争不能不做许多异乎寻常的事情，于是根据地的问题、向运动战发展的问题等也发生了。于是中国抗日的游击战争，就从战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要求把游击战争的问题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基于这个估计，毛泽东设想了持久抗战的过程：“这种持久战，将具体地表现于三个阶段之中：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

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论持久战》）这实际是说：战争初期，我们打败仗、丢失土地是不可避免的，敌人要占就让他去占。等日军进攻到一定程度，军队散开，就没那么强大了，地也占不住了。这时我们就和他相持，用游击战打击他、消耗他。等到国际形势发生变化，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形成，我们再配合盟军反攻。形势总是互相转换的。毛泽东说：“我们说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是从全部敌我因素的相互关系得出的结论。敌强我弱，我有灭亡的危险。但敌尚有其他缺点，我尚有其他优点。敌之优点可因我之努力而被削弱，其缺点亦可因我之努力而被扩大。我方反是，我之优点可因我之努力而加强，缺点则因我之努力而克服。所以我能最后胜利，避免灭亡，敌则将最后失败。”

共产党和八路军持久抗战的方式，就是敌后游击战。毛泽东指出：“从三个阶段来看，中国抗日战争中的游击战，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它将在人类战争史上演出空前伟大的一幕。不要以为少打大仗，一时显得不像民族英雄，降低了资格，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游击战争没有正规战争那样迅速的成效和显赫的名声，但是‘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在长期和残酷的战争中，游击战争将表现出很大的威力，实在是非同小可的事业。”（《论持久战》）因此，八路军的方针是：“基本的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如何进行游击战？关键是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和军队一起进行抗日战争。毛泽东说：“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欺负我们，主要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被烧死不可。”“军队须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

引用这么多毛泽东的话，是想说明一点：在战争初期，作为领导人，能不能给全国军民指出一条正确的抗战之路，至关重要。蒋介石作为国民党之领袖，面对土地沦陷、军队溃败、人民被屠杀，他心如刀绞，每天都在日记里倾诉自己内心的痛苦，有时甚至想自杀。但是他的思想是被动的，想不出什么对付日军的好办法，只能苦撑危局。毛泽东则很低调，开始就把自己摆在弱者的位置上，想办法怎么持久抗战，怎么与日本人打游击，改变双方的强弱态势。这就是差别。毛泽东说：“我们反对主观地看问题，说的是一个人的思想，不根据和不符合客观事实，是空想，是假道理，如果照了做去，就要失败，故须反对它。但是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持久战和最后胜利没有人做就不会出现。做就必须先有人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提出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方能做得好。”（《论持久战》）所以毛泽东经常说：“无论做什么事，方向和路线都是最重要



的。”方向、路线对了，没人可以有人，没枪可以有枪；方向、路线不对，人再多也会失败。之后的抗战过程，再次印证了这个道理。

二、犬牙交错

阎锡山组织的太原保卫战，将士们打得很顽强，使板垣师团正面无法突破。于是河北的日军回过头来，在娘子关突破了孙连仲的防线，导致阎锡山腹背受敌，被迫放弃太原。太原保卫战、徐州会战国民党军的相继失败，使华北沦陷。国民党的军队和政府都撤退了，日伪政权尚未巩固，华北平原和太行山区都处于空白状态。

毛泽东看到了机会。国民党走了，共产党正好去填补空白。于是中共中央命令八路军做战略转变，占据太行山区、五台山区，然后出山向华北平原和山东进军。他在1937年9月21日给彭德怀的电报中说：“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出己的拿手好戏，在这出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在战略上让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11月13日他又命令各部队：“红军的任务在于发挥进一步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同日寇力争山西全省的大多数乡村，使之化为游击根据地。发动民众，收编溃军，扩大自己，自给自足，不靠别人。多打小胜仗，振奋士气，用以影响全国，促成改造国民党、改造政

府、改造军队，克服危机，实现全面抗战之新局面。”

根据中共中央的命令，八路军三个师分头行动。一一五师聂荣臻部在五台山建立了晋察冀根据地，一二九师刘伯承部在太行山南建立晋冀豫根据地，一二〇师贺龙部到河北建立了冀中根据地，一一五师陈光部到山东建立了根据地，八路军的其他部队挺进冀东、冀南、平北、平西，陆续开辟了大大小小的根据地。华北战场出现了一个奇特的局面——犬牙交错。

什么叫犬牙交错？就是敌占城市，我占农村；敌占平原，我占山区。共产党在红军时期建立根据地的经验，这时又被用到了对日抗战上。八路军的根据地都在边区，避开交通便利的铁路、公路，在各省交界的深山里，在平原交通线的中间地区，占领那些偏僻、落后的农村。从地图上看，这些根据地都是零碎的、与敌占区交错的。毛泽东把这种布局叫“做眼”。他说：“从敌后游击战争的根据地看来，每一孤立的根据地都处于敌之四面或三面包围中，前者例如五台山地区，后者例如晋西北地区。但若将各个根据地联系起来看，并将各个游击战争根据地和正规军的战线联系起来看，我又把许多敌人都包围起来……由是敌我各有加于对方的两种包围，大体上好似下围棋一样，敌对于我、我对于敌之战役和战斗的作战好似吃子，敌之据点和我之游击根据地则好似‘做眼’。在这个‘做眼’的问题上，表示了敌后游击战争根据地之战略作用的重大性。”（《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眼”做得多了，这盘棋就走活了。北平是当时日本侵略华北的中心，从城里出来到西山，就没有公路了。萧克的部队1938年年底从太行山出来，越过紫荆关，途经赵各庄、野三坡等地进入宛平县，于1月中旬到达斋堂川的上、下清水村，创建了平西根据地。萧克赋诗一首：“北渡拒马河，百花山在望。建立挺进军，深入敌心脏。”其实，北平敌伪的控制区到香山为止，西边的山区就是八路军的天下了。

建立根据地，不急于打仗，而是发动群众，扩大队伍。蒋介石给八路军的编制仅仅3个师，发饷按4万人算。毛泽东既然要搞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就要冲破蒋介石的限制，放手扩编。一个连扩为一个团，一个团扩到一个师，对蒋是“先斩后奏”“只斩不奏”。扩充部队，有人还要有枪。人好办，枪从哪儿来？跟日本人打仗伤亡太大，共产党懂得国情。当年兵荒马乱的光景，村里有点钱的人，谁不买杆枪看家护院啊。八路军到村里，就宣传抗日。打鬼子干不干？干就扛枪跟我走。地主武装、帮会武装，有气节的不想当汉奸，又势单力薄怕打不过鬼子。八路军就去收编，跟着共产党抗日吧。思想工作一做，这些地方武装的人和枪都过来了。吃饭的问题怎么解决呢？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打土豪。阎锡山在山西抗战时曾提出过口号：“减租减息，合理负担。”共产党觉得很好，就拿过来用。号召农民减租减息，号召地主出钱抗日。这样，不用蒋介石发军饷，八路军就把生存问题解决了。

进军敌后的过程中，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反奸防特。日军是擅长情报工作的，他们收买汉奸，获取信息，对我方造成很大威胁。1938年8月，中央命令军队中成立锄奸局。电报说：“日寇有庞大的特务机关、长久的侦探工作的经验，对抗日军队是不断地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阴谋。派遣侦探，收买人员，挑拨离间，以求从内部来瓦解抗日军队。”因此，中央决定在总部、各师、各旅及军区成立锄奸局，设特派员。组织上锄奸局保有独立的系统，各级军政首长应调遣最好的干部来做这种工作，物色绝对忠实及有信仰的适当干部做锄奸局局长。中共把红军时期政治保卫局的体制和经验运用于同日军情报机关的斗争，有效切断了日本的情报来源，使他们摸不清八路军的动向。

共产党、八路军深入敌后，开辟根据地，形成了“犬牙交错”的局面，打在了日军的软肋。日军从没遇见过这样的对手。国民党军队打仗，从来都是堂堂之阵，阵线分明。这样的仗好打，日军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长处，组织战役，实施突破，取得胜利。共产党的游击战，使日本人的优势没有了，唯一的劣势完全暴露了，这就是：日本兵太少了。

1939年，日军“中国派遣军”24个师、24个混成旅，主力在武汉和华南正面战场作战。华北没有重大战事，日军华北方面军只有9个师、12个混成旅。这些部队摆在华北，只能占领大城市和铁路沿线，一个县城也就是一个大队或中队驻守。百来个日本兵要看守方圆上百里的地

盘，不是杯水车薪吗？所以日军只能在重要的镇子和交通要道上修个炮楼，再远点的村子就管不住了。八路军则有广阔的天地可以活动，在铁路、公路之间的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除了正规部队，八路军还到处建立游击队。这些游击队熟悉当地情况，来去飘忽，更使日本人头疼。

怎样消灭八路军和游击队呢？日军的长处也用不上了。八路军都是小股活动，日军很难集中优势兵力。扫荡吧，集合几千人去找几十个八路军，代价太大，事倍功半；不打呢，眼看着八路军到处活动，又气又急。进山扫荡抗日根据地，日军的机械化装备的优势完全用不上。卡车进不了山，只有羊肠小道，有的地方连路也没有。日军从将军到士兵都得步行，口粮还得自己背，真是痛苦万分。在山里全靠两条腿，看着八路军在对面山上，差一天的路程也赶不上。何况八路军还有自己的警报系统。在山顶上放棵“消息树”，看见日军进山，一个山头接一个山头放倒“消息树”，几十里外很快就得到警报，开始转移钻山沟，跟日军捉迷藏，或者找个合适的地形，打鬼子一个伏击。所以日军进山扫荡，人少了怕挨打，人多了后勤跟不上，也不能持久。山地游击战使武器装备简陋的八路军发挥了长处，而有装备优势的日军遇到了困难。抗战就这样相持下去。

在创建敌后根据地的过程中，共产党充分发挥了群众路线和组织能力的优势。八路军走到一个地方，不是单纯占地划界，而是向群众宣传，让群众拥护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建立基层党组

织。有了群众的支持，就能在日军的眼皮子底下建立公开的和秘密的根据地，为长期抗战打下稳固的基础。

三、“百团大战”与“五一大扫荡”

八路军走出太行山，在华北平原、山东建立根据地，扩充队伍，力量日趋壮大，成为敌后抗日战场的主力军，这是日本侵略者不能容忍的。1939年秋，多田骏任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他意识到日军“如不及早采取措施，华北将成为中共的天下”。他制定了“囚笼政策”，企图彻底摧毁华北八路军和抗日根据地。

所谓“囚笼政策”，就是对根据地实施军事讨伐，大修铁路、公路、据点和碉堡，在平原地区修筑封锁沟，在山区采取并村策略，和制造无人区，对根据地构成网状分割包围，然后发挥其交通工具的优势，分区扫荡。刘伯承指出：“敌人要用铁路作柱子，公路作链子，据点作锁子，来造一个囚笼，把我们军民装进里边去，凌迟处死。”

日本人进行的一项大工程，就是把阎锡山原来修的窄轨正太、同蒲铁路改成宽轨，与华北平原的平汉铁路并轨，实现了华北和山西铁路运行的一体化。在华北平原上修了纵横的高速公路网，把我军的根据地封闭在一个个“格子”里，确实给我军的机动作战和联系造成了巨大的困扰。

这时，正面战场的形势也很严峻。日军占领了华南，控制了全部海岸线，国军的外援基本断绝。1940年5月，日军占领宜



昌，封闭了三峡出口，开始对重庆狂轰滥炸。国军的处境极为艰难，希望八路军在后方作战，吸引部分日军，缓解正面战场的压力。主持八路军总部的彭德怀认为，八路军已发展到40万人，具备了和日军决战的力量。他决定发动“百团大战”，给华北日军来个沉重打击。

“百团大战”不是集中兵力与日军进行会战，而是各部队就地展开破袭战。破坏同蒲、正太铁路和山西、河北的公路，以及矿山、车站等基础设施，拔掉日军的一些据点。大家早就憋着劲要和日本鬼子大干一场，部队的士气高昂。从8月20日开始，八路军105个团，20余万人对华北的铁路、公路干线和沿线敌军据点展开猛烈攻击，同时动员百姓配合破路。一时间，山西、河北烽烟四起，杀声震天，日军措手不及，疲于应付。

但是，在攻击日军据点的战

斗中，八路军伤亡惨重。10月29日，一二九师主力将日军一个大队500余人包围在蟠龙镇以东的关家垸。彭德怀亲临前线，志在必得。八路军对日军据点形成合围，展开攻击，日军依托防御工事顽强抵抗。天明后日军飞机向我军轮番轰炸扫射，战斗打得非常激烈。我军没有火炮，仅凭轻武器攻坚，每占一个山包，都要同日军反复争夺。刘伯承师长见战斗胶着，部队伤亡严重，打电话问彭德怀是否放弃进攻。彭德怀向刘伯承下死命令：“拿不下关家垸，就撤掉一二九师的番号，杀头不论大小。”刘伯承只得硬着头皮打下去，激战至31日拂晓，歼敌400余人。由于日军援兵到达，一二九师主动撤出战斗，残余的日军在援军接应下突围。

“百团大战”持续了3个半月，大小战役1824次，毙伤日伪军20645人，消灭日伪据点

2993个。山西境内的铁路、隧道、车站被严重破坏，使日军在相当一段时间不能恢复交通。但是八路军伤亡17000人，中毒2万余人。这是八路军在抗战期间打的规模最大的战役。成绩是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囚笼政策”，有力策应了正面战场。失误是全面暴露了我军实力，引起日军的高度重视，导致后来日军残酷的大扫荡。

1941年7月，日本军部免去多田骏的华北方面军总司令职务，由冈村宁次大将继任。冈村于1913年陆军大学毕业后来中国，从事情报和参谋工作。1932年8月任关东军副参谋长，指挥进攻热河。1938年任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指挥武汉会战。1940年4月晋升陆军大将。冈村是中国通，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彭德怀对其评价很高。冈村上任后，对华北情况做了详细调查，巡视了一些重要战区。他认定要



巩固日本在华北的统治，必先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武装。长期的对峙不能结束战争，必须连续进攻，使八路军失去反抗能力，才能彻底解决问题。他制定了《肃正作战实施纲要》，确定日军进军的重点是首先对冀东、冀中和山东进行“扫荡”，然后对太行山区及冀鲁豫地区进行“扫荡”，集中兵力消灭八路军的指挥机构。

在精心策划和调兵遣将后，冈村推出了他的“强化治安运动”计划。与前任不同之处是：由过去的军事进攻为主，变为七分政治三分军事，实行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一体化的“总力战”。他将华北分为“治安区”（敌占区的城市、交通线及附近地区）、“准治安区”（八路军游击区和敌我争夺地带）及“未治安区”（抗日根据地），采取不同的对策。在“治安区”建立伪政权和各种伪组织，并村编乡，实行保甲连坐，强化控制。在“准治安区”大修封锁沟和碉堡，制造无人区，防止八路军深入活动，切断其与根据地的联系。对“未治安区”进行扫荡，实行野蛮的烧光、抢光、杀光的“三光”政策，摧毁抗日根据地，袭击八路军的党政军领导机关。

从1941年8月中旬开始，冈村调集华北日军5个师团和伪军共7万多人，对我晋察冀边区的北岳、平西两个军分区进行扫荡。为了报复八路军的“百团大战”，冈村称此次扫荡为“百万大战”。运用“分进合击”“铁壁合围”的战术，企图对晋察冀军区、各军分区机关和主力部队进行包围，聚而歼之。

日军第一波的大扫荡从8月

23日开始，聂荣臻率晋察冀边区党政军机关向阜平地区转移。5万日军向阜平合围，9月1日晋察冀机关、学校七八千人被合围于阜平以北的狭窄地区内，处境十分危急。聂荣臻派侦察分队携带一部电台向东走，以军区呼号故意暴露目标，误导日军分兵向台峪合击。聂荣臻率部当晚西进40公里到常家渠，隐蔽了5天。然后转移到平山县文玉地区，脱离险境。

1942年，冈村宁次加大了扫荡力度，对冀中根据地发动“五一大大扫荡”，同时突袭太行山八路军总部，造成八路军中心根据地的严重损失。

5月19日，日军第四旅由平定、昔阳、井陉出动，第一一〇师及八十一旅各一部由河北元氏、赞皇出动，24日控制了太行山峻极关（摩天岭）。第四旅进至辽县（今左权县），与峻极关之敌会合。第三十六师和第三旅由西线的长治、武乡、辽县和东线的武安同时出动，集中力量，对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驻地窑门口、青塔、偏城、南艾铺地区完成了合围。5月24日，日军转入第二期作战，在飞机支援下，以麻田为总目标，对合围圈内的八路军展开“向心大合击”。

八路军总部于5月23日开始转移。次日凌晨，虎头山、前阳坡、军寨等阵地都发生激烈的战斗。化装深入的日军挺进队在麻田发现了八路军首脑机关，引导多路日军向麻田方向合围。左权参谋长指挥警卫连200多人顽强地抵御着2000多日伪军的轮番进攻。

5月24日，总部机关趁黑夜

转移，第二天队伍在辽县十字岭吃饭，突然遭到日军的包抄袭击。被围的都是携带物资过多、行动迟缓的机关、学校和后勤单位，有几千人，多数人没有作战能力，四散溃逃。著名史学家李新当时就在队伍中，他回忆：

正在做饭的时候，我正拿着手提小洋铁桶打饭。这时，我看见彭总带着大约一个排的警卫员，从半山坡横着走过去了，他们不循路径，一直往前疾走。我心中一紧，糟了，今天要出问题。忽然天上的飞机来了，开始轰炸，同时四面枪炮声大作。山腰路上的驮马被炸得滚滚而下，山洼里部队秩序大乱，各人径自奔逃。只要一颗炸弹下来，便有不少死伤，有的血肉横飞。我提着饭桶往山上跑，边走边吃，想努力爬上山顶，看个究竟，以便决定行动。

一抬头，看见左权将军在一排灌木旁边，像钢铁一样立在那里。他一面指挥战士们对敌射击，一面呼喊机关干部们向他手指的方向突围。我走近时，他大声喊道：“李新，快把背包扔了，往上走！向东！”我顺着山脊往上爬。山脊有路，可以跑得快些，但敌机不断轰炸，有些同志不敢往上跑，结果就没有突围出去。

在最危急的时刻，左权一边指挥警卫连阻击日军，一边督促彭德怀赶快转移，彭德怀脱险后，左权继续指挥机关人员突围，坚守在十字岭上。一发炮弹落在左权身边，左权的头部、胸部、腹部都中了弹片。就这样，一位才华横溢、智勇双全的八路军高级将领不幸牺牲了。

这是抗战期间八路军最惨痛

的一次失败，损失很大。1942年5月的大扫荡，对华北抗日根据地和八路军都是最沉重的打击。党的基层组织也遭受严重破坏，多数无法公开活动。人民群众被杀被捕多达5万人。日军在冀中平原上修造据点、碉堡，挖封锁沟，昔日一马平川的冀中平原被分割成2600多个小块，变成了“抬头见岗楼，出门登公路，无村不戴孝，到处是狼烟”的恐怖世界！

彭德怀1945年2月在延安华北工作座谈会上曾深有感触地说：“冈村宁次的这一套极其残酷复杂的形式、方法，我们都是——一直不熟悉的，这套办法给我们造成的痛苦是很大的，也因此很被动。华北根据地缩小（五台只有阜平，太行只剩涉县、黎城、平顺，冀鲁豫只剩范县、观城，共剩6个县城），根据地人口，1941年10月统计，只剩1300万，为最少的时期。根据地遭到了严重的损失、破坏，人民生活水平突然降低，敌特、国特大肆活动。”（《彭德怀传》）在这种不利的局面下，只能暂时退却，保存力量。1943年1月1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抽调敌后大批干部来延安保留培养的决定》：

一、华北及华中各战略区域，在保持工作需要的最低条件下，应抽调大批干部送来延安保留培养。

二、保留培养干部的目的，不仅为了适应目前敌后的环境，同时也是为了将来发展的需要。因此，应该坚决选送质量好的干部。

把各根据地的优秀干部集中到延安，是什么意图呢？毛泽东告诉新四军的陈毅和饶漱石：

“整个抗战尚需两年，要保存我军基本骨干，不怕数量减少，只要骨干存在就是胜利。”“根据中日战争形势，华中敌后形势可能日趋严重。根据地中一切工作应避免张扬，应采取各种可能的方法来尽量保存我之力量，以度过今后最危险的两年。”

根据中央命令，新四军第三师参谋长兼苏北军区参谋长彭雄和八旅旅长田守尧1943年3月率11名团以上干部赴延安。途中与日军巡逻艇遭遇，在激战中彭雄与船上全体干部壮烈牺牲，这场惨案震动延安。各根据地开始着力开辟秘密交通线，对干部实行一站站的接力护送。确有把握后，高级干部才能启程。到11月，陈毅才离开江苏盱眙黄花塘新四军军部，经淮北、鲁南、冀鲁豫、太行根据地，于1944年3月到达延安。

四、熬过黑暗是黎明

“五一大扫荡”之后，华北平原的抗日形势进入了低潮。日本鬼子、伪军、汉奸到处搜捕八路军留下的干部、战士和武器、粮食等物资，不断对原抗日根据地的村庄进行扫荡和清剿。在清晨或夜晚，几十或上百一伙的日伪军经常突然包围一个村庄，大搜大抢。他们也积累了一些经验，发明了一种“剔抉清剿”的方法。每次清剿都是先抓青壮年男人，认为可能是八路的，就按以下方式严加盘查：

（一）问年月，凡答不上民国年号的就是八路。

（二）问党外问题都回答，问党内问题闭口不答的就是共产党。

（三）突然喊军队口令，凡

立正或表情有变化者就是八路。

（四）扒开衣服看肩膀，扛枪的人有一层厚皮。一般老乡身上泥垢多，八路军身上清洁干净，腿上有打绑腿的痕迹。

（五）老百姓衣服破烂，八路军干部衣服整洁。另外穿好鞋、带钢笔、牙刷和人丹的都是八路军的干部。

（六）盘问时胆小害怕的是老百姓，从容镇定的是八路。

搜寻八路军埋藏的物资，也有一套办法：

（一）村外的假坟墓，一般土色是新的。

（二）石板下或石头堆下经常是埋东西的地方。

（三）老树中的空洞、庙里的夹墙、水井下、烟囱里都可能藏东西。

（四）搜查时发现无人家的地方有许多脚印、车辙，地上有碎布和纸片。

（五）从井里提上水来看，水里有油渍，必定有东西。

（六）老人、小孩、病人看守的地方，也可能藏东西。

运用这些方法，敌人确实屡次得手。八路军的伤病员和隐蔽在村里的干部被抓去不少，我军转移时埋藏的武器、物资和粮食，也被敌人挖了出来。

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坚持抗日斗争，首先要学会保存自己。在冀中平原上，敌人靠炮楼能把村庄、田野一览无余。四通八达的公路，敌人的卡车往来奔驰。一个地方发生战斗，邻近的敌人很快就来增援。深深的封锁沟阻碍游击队的行动，夏天地里有青纱帐，还可以隐蔽，等秋后庄稼收完了，野外就不好躲藏。残酷的战争教育了人民，也充分发挥

了人民的聪明才智。著名的地道战就是在那个时代产生的。

地道最早是在河北蠡县发展起来的，这里是敌军“蚕食”扫荡的重点地区。村干部为了躲避敌人的突然袭击和追捕，就在荒郊野外过夜。冬天无处藏身，有人就在树林或坟地里挖个一丈多深的地洞，里面铺些柴草，干部夜里披件大衣在洞里睡觉。这种地洞只能藏一个人，大家管它叫“蛤蟆蹲”。

但是冬天洞里暖和，外边冷，天亮时就从洞口往外冒白气，像一缕轻烟。在野外转悠的汉奸发现了，一些洞被敌人起开了。在野外蹲不住，只好又回村里来。村民在闲场、空院、牲口圈等地方挖洞，或在家里修夹壁墙、垒间密室，以躲避敌人搜索。家里挖洞不好保密，敌人扫荡时，进村就拿铁条到处乱扎，发现洞里有人，抓出来轻则一顿痛打，重则抓走。还逼着找旁人家的洞，追问八路和粮食藏在哪里。这种单出口的洞很快就失去了效用。

后来为了对付敌人的扫荡和清剿，群众发明了多口洞，家家相通，这就是初级的地道。有了多口洞，鬼子想抓人就不那么容易了。有一次，一个村干部被敌人抓住，敌人问他枪在哪里，他说：“没在手上，放在洞里了。”敌人用一条长绳绑着他的手，让他进洞去拿。他在洞里喊够不着，要敌人把绳子松一松，乘机挣脱绳索从别的洞口跑了。敌人等了半天，只拉上来一条空绳子，气得朝洞里打了几枪，丧气地走了。

“五一大扫荡”期间，定县北疃村的民兵和百姓钻进地道抗

击敌人，结果被敌人施放毒气，牺牲了几百人。这给冀中军民一个血的教训：必须把地道改造成能运动、能打仗、能储存物资的多功能地道。大扫荡后的残酷环境，促进了地道战的全面发展。

于是，地道战在华北平原的村庄中普遍开展起来。各村百姓用自己的双手，在地下修起了四通八达、构造巧妙的地道网络。挖地道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一个两百户的村庄，挖一条500米长的地道，就要全村2/3以上的劳动力干整整一个月。到1944年冬，冀中区的地道总长度就达到了12000多公里。保定的冉庄地道、北京顺义的焦庄户地道至今保存完好，它们是历史的见证：我们的前辈为了民族的独立和自由，为了打击日本侵略者，付出了何等艰辛的代价！

就在敌后抗日进入最艰苦的阶段时，形势又发生了变化。1941年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1942年6月中途岛海战后，美军转入反攻。日军将战争重点转向南太平洋，不断从中国战场抽调日军主力。正面战场日军兵力严重不足，国军开始反攻。日军华北战场的兵力锐减，守备日军中18岁以下的学生兵越来越多，完全没有作战经验。部队普遍编制不满，有的一个联队就差100人。冈村宁次只能守摊，无力再发动新的攻势。共产党和八路军卷土重来，再次回到华北平原和山东，恢复根据地，开展积极主动的游击战。

此时的游击战，在形式和战术上都成熟很多。在敌强我弱的环境下，主力部队的游击战遵循“分散性、地方性、群众性”的原则，将主力部队划分为灵活机

动的小股武工队，深入敌后游击区开展斗争。发展了大量民兵游击小组，成为游击战的主要力量。华北的方针是“敌进我进”，就是进到敌占区去。敌人在我腹心区“扫荡”，我军主力转移到外线。武工队去敌占区闹得天翻地覆，端敌人的老窝，让敌占区没有一处安宁的地方。这样，敌人的“扫荡”“蚕食”都不会成功，它只好回去“清乡”。“清乡”越清越不清，最后大多会变成两面派政权。

于是，武工队回到平原村庄，先镇压汉奸，震慑那些投靠敌军的人，使他们不敢再为日本人做事。在敌人出入的必经路口，专门捕捉敌人派出的特务和侦探。这叫“猫捉老鼠”，吓得敌人不敢离开据点，鬼子要扫荡没有情报，要给养没人敢进村，在据点里干着急。与敌占区交界处的民兵熟悉地形，在青纱帐里袭击来回游动的日伪军。山东清河区一个庄的民兵在青纱帐里埋伏，用粪叉子叉住了30多个敌人，这叫“太公钓鱼”。

八路军武工队与民兵密切配合，力量越来越壮大。1943年后，游击战日益活跃，从以往的小打小闹发展到围困据点，主动进攻敌人。例如，山东以联防区为单位，选择一个重点打击的据点，由各村轮流去骚扰敌人。一个村的民兵又分成若干组，从天黑闹到天亮。放枪、扔手榴弹，弄得敌人彻夜不安。渤海区董家口据点的伪军在炮楼里哀求：“俺七天七夜都没睡好觉，叫俺歇一歇吧。”

山东根据地军民注重军事斗争和政治攻势相结合，普遍采用记“红黑点”的方式瓦解伪军。

关于“二战”的冷知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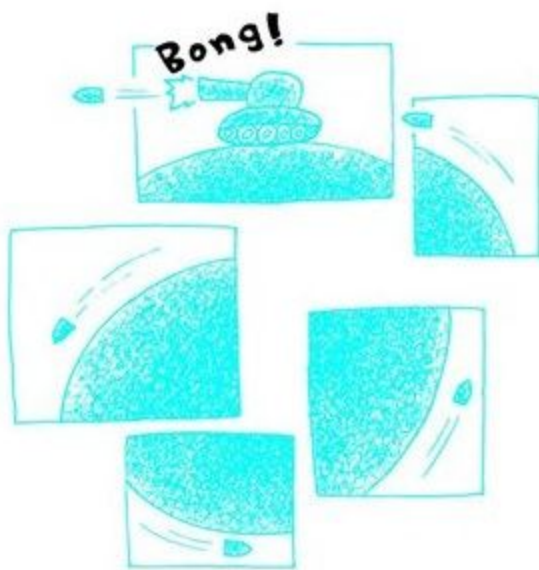
1. “二战”的死伤总数在5000万~7000万人，其中超过8成来自4个国家：俄罗斯、中国、德国和波兰，这其中一半为平民，主要是妇女和儿童。

2. “二战”中战斗持续时间最长的是大西洋战场，从1935年持续到1945年。

3. 1923年出生的苏联男性有8成死于“二战”。

4. 希特勒在他的办公桌上放了一个相框，相片上的人是福特汽车公司的创始人亨利·福特。亨利·福特在密歇根州迪尔伯恩的办公桌上也放了纳粹领导人希特勒的照片。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一书中，提到他的一些反犹太人的观点来自福特。

5. 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后，被迫于1919年签署了《凡尔赛条约》，由此德国失去了其所有的海外殖民地，大多数德国人反对该条约，他们的怨气最终导致“二战”爆发。



6. “二战”期间，德军共有3363名将军，而美军只有1500名。

7. “二战”结束前夕，当盟军部队抵达德国莱茵河的时候，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朝河里撒尿。撒尿活动从下等兵到最高统帅丘吉尔，著名铁血将军巴顿也不甘落后，把自己的排泄物排到了莱茵河里。

8. 在纳粹德国决定用毒气消灭犹太人之前，曾考虑将他们遣送到马达加斯加岛。

9. 1941年12月8日，英美对日本宣战。同年12月11日，德国正式对美国宣战，美国是德国唯一正式宣战的国家。

（小雪摘自搜狐网、铁血社区，小黑孩图）

伪军人员谁做了一件好事，就给他记一个红点；谁干了一件坏事，就给他记个黑点。在对据点喊话时，经常公布情况，让伪军心里有数。对不接受警告的，找机会给予打击，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各区还争取伪军家属，经常找伪军家属开会，要她们劝说伪军反正。喊话时经常指名道姓，让某某伪军听听他家人的劝说。伪军最怕点名，家人的话比我们的宣传还管用。政治攻势的效果还是显著的。1943年，山东共瓦解了伪军7000多人，还在伪军内部建立起1000多个眼线。这使日军更加势单力薄，一天天走向衰败。

1944年至1945年8月之前，华北战事不多，战场相对平静。利用这个时期，延安进行了整风和大生产，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和组织，建立了自给自足的经

济体制。各根据地也在发展生产，组织群众，巩固军队和游击队。这为夺取抗战胜利和抗战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共中央在1944年年底指出：“如果各地明年一年，用极大努力，在军民生产方面有一个普遍的高涨，由现在的克服困难，走向不久将来的丰衣足食，我们就能在经济上（粮食及日用品）胜过大后方及沦陷区，而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战争愈持久，我们愈丰富、愈强盛。数年之后，我们将成为中国最强有力的政治力量，由我们来决定中国命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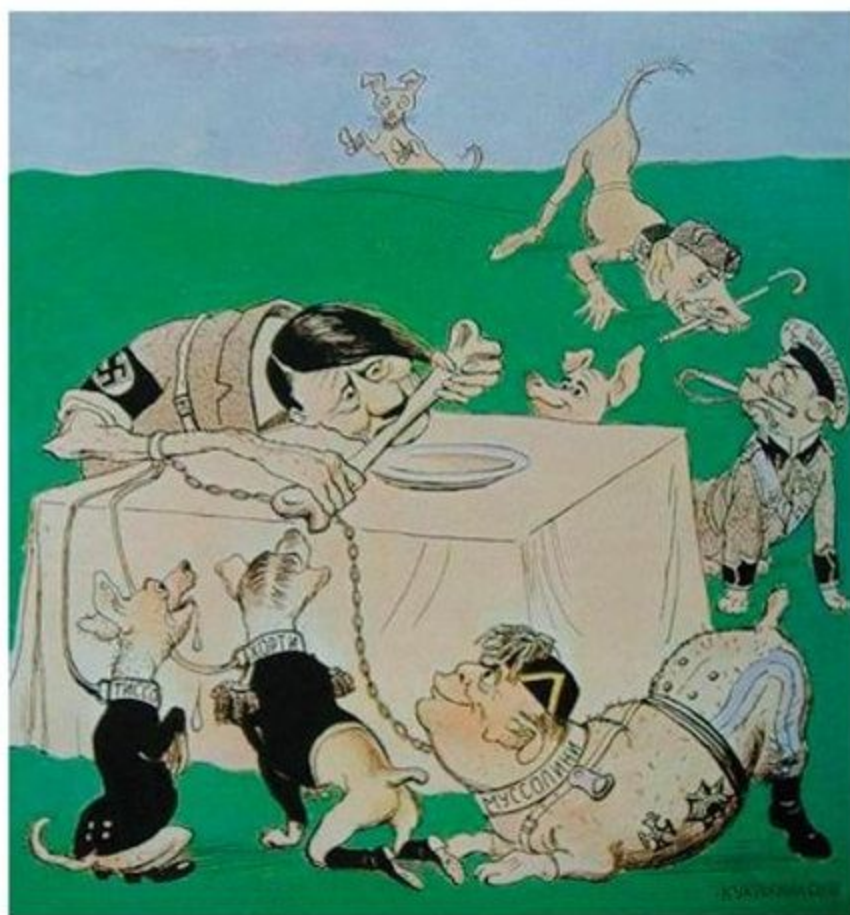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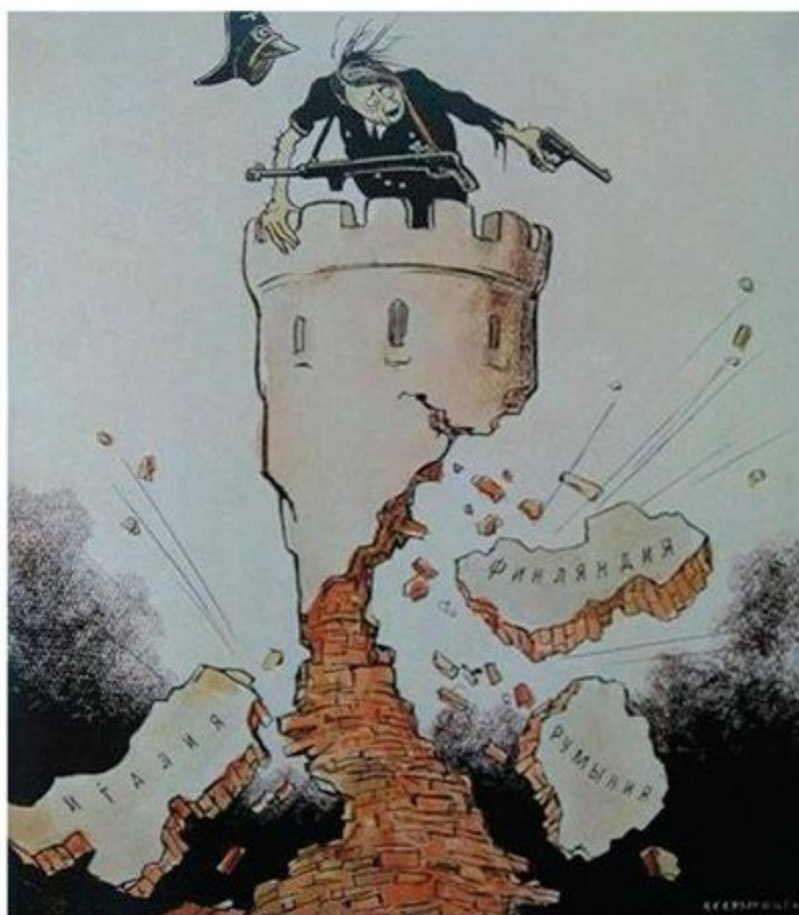
20世纪60年代，我们在总结中共抗战的历史经验时，用了一个字：熬。这个字蕴含了丰富的内容。面对强敌，首先要有坚韧不拔的意志，在任何艰难困苦的环境下，不动摇、不退缩。其次还要有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

在以弱胜强的战斗中，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趋利避害，扬长避短；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在持久战中等待时局的变化，最后战胜侵略者。中共的游击战术，抗战期间上升为人民战争理论。在长期的战争中，实力弱的军队要想战胜强大的敌人，关键是依靠人民。有了人民的支持配合，我们的军队才能生存下来，发展壮大。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参与战争，任何敌人都无法战胜我们。虽然中间会有很多艰难曲折，正义的一方终将获得最后的胜利。毛泽东总结的“兵民是胜利之本”，就是这个道理。这些历史经验，对于我们今天开创新的事业、应付变化多端的局面、克服种种困难，依然有着借鉴的价值和深远的意义。

（天佑摘自《读书》2015年第6、7期，李晨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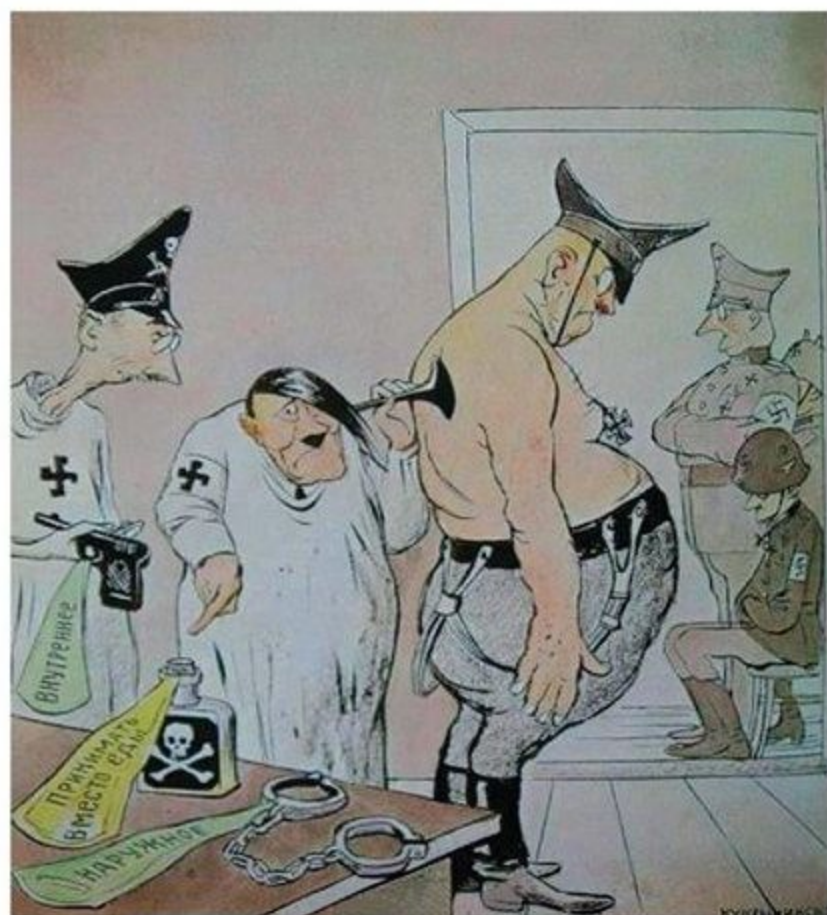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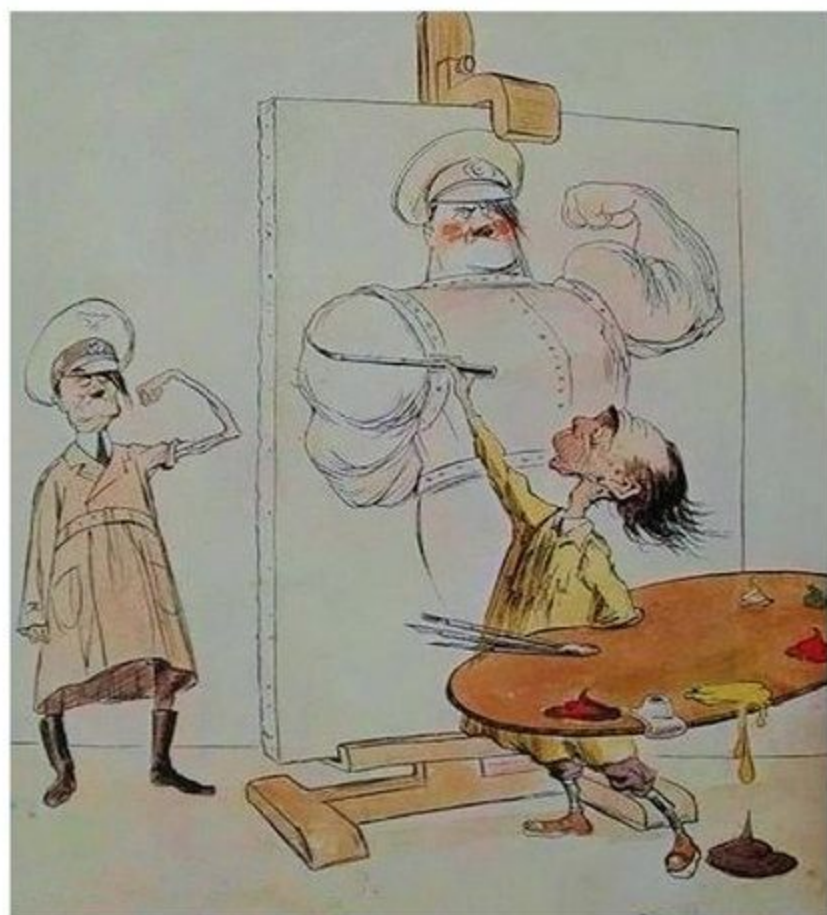
“二战” 历史漫画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漫画家创作的一系列优秀的反法西斯漫画，在前线广受红军将士的喜爱，并由此坚定了苏联红军的作战意志与决心。

（耀 君摘自《科学大观园》2015年7月上）





饥饿把整个列宁格勒（圣彼得堡）逼疯了，希特勒的“巴巴罗萨计划”把这座城市围困得像铁桶一样密不透风。每天都有成百上千架轰炸机轮番轰炸这座城市。希特勒狂妄叫嚣着不接受列宁格勒的投降，一定要把这座城市从地球上抹掉。围攻从1941年9月9日开始，在尔后的800多天里，海港、铁路、河运枢纽等交通要道都被炸毁，一半地面建筑被夷为平地。

人们赖以生存的公共设施、电力能源、供气系统都遭受了极大的破坏。粮食供应更是严重供不应求，只能实行配给制。德军企图把守城军民活活饿死。空前的大饥荒造成65万人死亡。

列宁格勒城里能吃的东西几乎都被吃光了，城市里生存下来的平民，饿得眼睛直放绿光。人们除

了躲避轰炸，还要到处捕捉鸟雀、老鼠，下河捕捞鱼虾，摘树叶、剥树皮、挖草根，连心爱的宠物——狗、猫、鸽子等都被杀了，填进了人们的肚子。

战争的硝烟弥漫在列宁格勒的郊区，这里坐落着一座8层楼高的种子研究所。战争爆发之前，研究所里聚集了一群科学家，50多人，专门研究麦子的遗传基因、杂交、花粉传授，还从事高光效生理、培育良种和病虫害抗体等科学研究。科学家们为全苏联十几个大农庄提供大量良种，实现了农业的年年增产。

战前，集体农庄风景如画，笔直的白桦树耸立在山边。秋天的田野上，微风轻拂，大片金黄色的麦浪起伏翻滚，在夕阳的照射下，耀金掠影。沉甸

希望的种子

●魏清潮





甸的麦穗，向人们展示着丰收的喜悦，也彰显着科学家们用心血凝结的丰硕成果。

残酷的战争并没有粉碎他们的希望和梦想，研究所里10多名青壮年科学家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拿起枪投入前线防空旅的战斗；所里30多名年纪较大的科学家，坚守着岗位，守护着希望，继续工作，同时也保卫着储存有10多吨麦子良种的仓库。

尽管大楼的周边已被德军炸得坑坑洼洼，但命运之神眷顾了这个研究所，空袭和炮火没有炸到这座建筑。

1942年的初冬，天色灰暗，漫天飞雪，寒风刺骨，列宁格勒保卫战进入了艰苦卓绝的阶段。研究所所长普罗列夫一筹莫展，按照能量守恒定律，一个正常人每天需要补充2000卡路里的热量，而研究所的科学家每人每天只能领到250克面包，所含热量不足400卡路里，只是正常人应补充热量的1/5。饥饿威胁着每一个人，而粮食供给还在逐步减少。几位年老体弱的科学家已经倒下了，被饿死的人已经有6个了。种子仓库就在研究所里面，钥匙就在普罗列夫手里，十几吨种子粮不仅能救活所里的人，还能救活一大批急需粮食的人。

普罗列夫是一个热爱长跑运动的50多岁的老头，本来身体素质不错，这时候也饿得头发晕。他小心翼翼地打开桌子下面的抽屉，拿出他夫人送给他的唯一一小瓶伏特加酒喝了两口，感觉身体暖和多了。他想起10多天前去区委开会时遇到的一幕：

一辆载着面包的卡车为了躲避一辆吉普车，在第七大道拐弯处倾倒，许多面包从车里滚了出来。闻着香喷喷的面包，饿得发慌的居民围了上来，犹如一群严冬里嗅到了肉香的饿狼。不到两分钟，周围已经站满了饥民。司机紧张地从驾驶室爬了出来，脸色铁青，大声吼道：“这是前线将士的口粮！”顿时，就像战士接到命令一样，一个个饿得黑瘦干瘪的饥民摇晃着麦秆似的身体，弯下腰，捡起了一片片面包，轻轻拍掉沾在上面的雪和尘土，往麻袋里装。人们边捡边咽着口水。拾完了，众人把倾斜的车推了起来，又把一袋袋面包装进车里，司机迅速地跳进驾驶室，向前线方向开去。

普罗列夫被那个场景深深地感动着，灵魂仿佛得到了升华。

在区委开会时，区委书记巴托洛夫盯着普罗列夫的眼睛，郑重地说：“种子是战后生产的源泉，

是人民的希望，一粒都不许动，不管是谁，都无权动它，这是党交给你的战斗任务！”普罗列夫毫不犹豫地完成任务，并传达给研究所的每一位同志。

种子研究所里能吃的麦麸、糠粉、甘蔗渣都快被吃完了，所长普罗列夫、副所长塔莉亚决定带领所里剩下的25个人凿冰捕鱼，但由于经验不足，收获甚微。

面对困境，人们的意志和信念是活下来的精神食粮，其力量无比巨大。当前线德军的炮弹排山倒海地向列宁格勒前沿阵地轰炸过后，竟出现了片刻的宁静——德军正在等待苏军的报复行动。

悠扬激昂的旋律在城市上空奏响，时而低沉，如泣如诉，仿佛在诉说苏联人民遭受德军侵略的苦难；时而激越高昂，象征着苏联人民浴血奋战、抗击侵略的坚强意志和顽强战斗的必胜信心。

种子研究所的25位科学家摇摇晃晃地站起来，肃立在广播前，听着激动人心的乐章，一个个泪流满面，祖国、人民在他们的心中重如千斤。

所长普罗列夫带领25位科学家，举起拳头，庄严宣誓，为了苏维埃，决不丢失一粒种子。

当列宁格勒的人们都饿疯了的时候，人们开始绞尽脑汁，搜肠刮肚地到处寻找食物。同时，人们开始关注储存在种子研究所里的10多吨小麦种子。

为防止发生意外，区委配发给种子研究所4把冲锋枪、两把手枪，研究所的每个人都忍受着饥饿，加强了对种子仓库的安全保卫工作。

一天早晨，化验师安德烈再也起不了床，他的身体变得僵硬；负责研究种子基因变异的伏罗加在巡逻的路上被绊倒了，再也没有起来；负责麦种病虫害研究的莫霍夫死在了厕所里面……短短一个月内，研究所里又饿死了5个人。

生活最艰难的是丹妮亚——这位两年前从大学调到研究所的副研究员即将临产，同事们每天都在本来已经十分有限的供给面包里挤出一点给她，单位也把仅剩的一小袋麦麸留给她。她含着泪水，盯着食物说：“这不是食物，而是同志们的生命，我不能接受。”大家盯着她的肚子坚定地说：“这不是食物，而是新生的希望，你应该收下。”丹妮亚哽咽了，热泪奔涌而出。

列宁格勒保卫战打得异常激烈，那是历史上最惨烈的围城战，为了每一寸土地，交战双方进行着艰难的“拉锯战”。每一公里土地都洒满苏维埃战



士的热血。

一天晌午，一阵急促的吉普车喇叭声夹杂着整齐的跑步声惊动了种子研究所的工作人员。普罗列夫和科学家们急忙跑出来，只见一队士兵已经包围了种子仓库。一位穿着呢子军装、戴着中将军衔的大胡子将军，气势汹汹地走过来，边走边大声喊道：“所长在哪里？”普罗列夫踉踉跄跄地走到他面前。“所长同志，我们是前线第七军团的，研究所的粮食作为战时物资被征用了，你们要服从命令！”大胡子中将斩钉截铁地说。“不行啊！中将同志……”普罗列夫的话还没说完就被中将打断。“为什么不行？前方将士正在浴血奋战，每天都有成千上万人死去，将士们正在挨饿受冻，调点粮食，你敢说不行！”大胡子将军脸色紫胀，气愤地吼道。“中将同志，这不是粮食，而是良种，是科学家们的心血，打退德国人之后，我们要用这些种子，让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这也是列宁格勒人民的希望啊！”普罗列夫掷地有声地说。“真的动不了？”将军的声调低了许多。副所长塔莉亚用轻柔的女中音说：“将军同志，你看看这些科学家，也都快被饿死了，我们一粒种子都不敢吃，因为这是希望！这是人们活下去的精神支柱啊！”塔莉亚边说边指着站在旁边的十几位面黄肌瘦、瘦骨嶙峋的科学家。将军深情地望着科学家们，热泪盈眶。

他突然喊了一声“集合”，包围种子仓库的一排士兵“啪啪”地整齐列队，站在科学家们面前。“敬礼”，将军和士兵们向科学家们投去敬佩的目光，立正并行了一个军礼，然后转身走了。

在德军的几轮轰炸之后，列宁格勒的黎明静悄悄。100多个穿着破棉袄的饥民不顾门卫的阻挡，冲进了种子研究所。普罗列夫撑着一根拐杖出来了，能勉强走路的科学家们也都迎了上来。不同的是，这次副所长塔莉亚腰间佩带着手枪。饥民们大声嚷嚷，用石块叮叮当当地猛砸紧锁着的种子仓库，仓库门的铁板很厚很坚固，根本砸不动。这次塔莉亚站到了仓库门前，拔出手枪，朝天空开了几枪。顿时，空气像凝固了一般，安静下来。塔莉亚用沉重的声音不紧不慢地说：“同志们，这批种子，连前线正在流血的将士都不敢动，谁吃了它，就吃掉了赶走德军之后人民的希望！我们和你们一样，宁愿被饿死，也绝不吃一粒种子。”听到这里，有一伙饥民即刻冲进了伙房，打开大锅一看，一锅热气腾腾的清汤，里面飘着甘蔗渣和玉米秆

粉，这就是科学家们的早餐。

这时有人发现在研究所后面的菜地里，屹立着一排新修的坟墓，大雪纷纷扬扬，阳光下，白色的墓碑闪烁着晶莹的光。普罗列夫指着墓碑说：“他们是为保护良种、保卫希望，被活活饿死的科学家。”

研究所里，一边是装满粮种的仓库，一边是被活活饿死的科学家的墓碑。饥民们中已经有人泣不成声，他们面对坟墓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如潮水般离开了。

列宁格勒在1941年至1942年骇人的严冬中坚守着，苏维埃继续加固这座城市的防御网，历经千难万险，建立了横越拉多加湖的被称为“冰上公路”的补给运输线。一车车的粮食和装备被运进城市；一车车的饥民，首先是妇女儿童，被运往后方。

没有等到粮食供应的缓解，种子研究所的科学家又是一个接一个地被饿死。所长普罗列夫死在粮食仓库门口，临死前，他把仓库的钥匙掷重地交到副所长塔莉亚手中……

经过800多个日日夜夜，人类历史上最残酷、最惨烈的反围城战，在1944年1月14日，苏联三个方面军向围困列宁格勒的德军进行大规模的反攻后结束，这座英雄城市终于迎来了彻底解放。

当胜利的礼炮打响，种子研究所的科学家，除了上前线参战的以外，只剩下饿得没了人形的副所长塔莉亚、研究员古德里安、副研究员丹妮亚。研究所的菜地里整齐地排列着29座坟茔。

科学家们用生命换来的良种，在战后列宁格勒集体农庄恢复生产的时期，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为了纪念这些科学家，列宁格勒市民把这座种子研究所命名为“希望的种子”。

（晓雪摘自《散文选刊》2015年第7期，本刊有删节，李晓林图）

一、静：少说话，多倾听。二、缓：沉着做事，不急不躁。三、忍：面对不公，别气愤，别宣泄，忍让是智慧。四、让：退一步，海阔天空。五、淡：一切都看淡些，很多事情随着时间会变成云烟。六、平：是平凡，是平淡，是平衡。

——南怀瑾先生六字诀



● 阎连科

出租车司机

一个城市繁华喧嚣的程度，大抵可以用出租车的数量来衡量。

听说北京的街道上，每天都奔跑着8万辆出租车（不含无照黑车），如同一个城市每天都被打包，装在出租车上一样。那8万个出租车司机，并不是8万个普通人，他们是8万个移动的远程喇叭和口才上佳的国家政策传声筒与义务宣传员。

全世界都在惊叹北京出租车司机的好口才，惊叹他们对上至天文地理、下至皇宫街巷无所不知。当然，你坐上那棕黄兼白色的出租车后，他们最爱跟你说的和生活中的鸡蛋、韭菜、炸酱面大相径庭，而在他们看来，完全就是日常餐桌上的萝卜白菜——平常但不可或缺的政治与国家大事。他们谈论公众人物，就如同谈论他们亲戚中的小舅子；说中南海的一些见闻，就如同谈论胡同里四合院中厅堂间摆的桌子和椅子。

不关心国家大事，是不配做北京的出租车司机

的。我之所以爱坐出租车，也多少是因为爱听他们那带有几分夸张的广播和宣传。如果哪次坐上出租车，没有听到司机高谈阔论地跟我聊国家政治，我就会觉得这趟出租白坐了，白白花了我的几十元钱。尤其去机场或从机场回家，出租车费每次上百元，那是一定要从他们嘴里买些“国家机密”和趣闻逸事的。然而前天，我从机场返回家时，那个三十几岁、身材微胖的司机却一反常态，无论如何都不肯和我多说一句话。从我上车到将至家门口，一个多小时的车程，无论我问什么，他都是点头或摇头，一定要开口说话时，也只会说出三个字：“不知道”。

这让我有些意外了，让我千真万确地以为，我花上百元坐的出租车是去听繁华闹戏却进了哑剧场。搭乘着这辆哑然的出租车，出机场，过五环，到四环，再从四环路随着蚂蚁搬家般的车队走上三环路，就在我因为听不到阔谈的声音而失望到疲劳睡着时，出租车司机把我摇醒了。他告诉我已经到家了，并问我：“你知道我今天为何不爱说话吗？”我怔怔地提着行李下了车，站在车边望着他，望着他那丰润的脸和红亮的唇。他停顿了一会儿，朝我笑一笑，说他老婆晚婚晚育终于住进妇产医院快要生产了，他昨夜做了一个梦，梦里说：他今天跑车如果一天只说十句话，他的儿子可能是皇帝；如果说上五十句，就要降为宰相、总理、部长这一级；如果说超过了一百句，就只能是司长、局长了，天天开会念文件，唇和舌头忙个不停。他告诉我这些时，脸上有些憋不住的神秘和失落，如明明可以考得更好，却只差半分没有考到最好的学生那样。

“你今天一共说了多少句话？”我问他。

“最少上千句。”他笑着对我说，又从车窗探出头来解释，说他今天一天跑车，忘了昨夜的梦，见了我才又想起来。他拉着我一路都在回忆和估算他今天一共说了多少话，说的内容是什么。他一整天话是说多了，可好在说的都是政治，都是国家大事。根据他今天说话的多少和内容看，他家将出生的儿子未来不是总理、部长、司长和厅局长，而是一个国家新闻办公室的发言人或中央电视台新闻节目的主持人。

司机说完朝我笑一笑，开车驶进了车来车往的汪洋大海里。

（生如夏花摘自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孤独是生命的礼物》一书，刘志刚图）



与病魔抗争了17个月后，李开复将他自2013年9月得知自己罹患淋巴瘤以来，治疗过程中鲜为人知的故事和心路历程，以及从死亡线上回来后的人生思考与读者分享。

生病之前，我被美国《时代周刊》评选为“2013年全球最有影响力100人”之一，我意气风发地赴美受奖，自认为实至名归、当之无愧。然而，吊诡的是，领奖回来没几个月，我就发现自己生病了。我被赤裸裸地暴露在病痛的风暴中，再大的影响力、再高的知名度都帮不了忙；在诊疗间、病床上，我什么都不是，就是一个随时可能在呼吸之间失去所有的病人。

那时候，我常常怨天怨地，责怪老天爷对我不公平。我从内心深处发出呼喊：“为什么是我？我做错了什么？这是因果报应吗？我是天之骄子啊！我有能力改变世界、造福人类，老天爷应该特别眷顾我，怎么可以把我抛在癌症的烂泥潭里，跟凡夫俗子一起在这里挣扎求生？”

朋友看我很痛苦，特地带我去拜见星云大师，并让我在佛光山小住几日。有一天，早课刚过，天还没全亮，我被安排跟大师一起用早斋。饭后，大师突然问我：“开复，有没有想过，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

我不假思索地回答：“‘使影响力最大化’‘世界因我不同’！”这是我长久以来的人生信仰：一个人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世界，就看自己有多大的影响力；影响力越大，做出来的事情就越能够发挥效应……这个信念像肿瘤一样长在我身上，顽强、固执，而且快速扩张。我从来没有怀疑过它的正确性。

大师笑而不语，沉吟片刻后说：“这样太危险了！”

“为什么？我不明白！”我太惊讶了！

“人是很渺小的，多一个我、少一个我，世界都不会有变化。你要‘世界因我不同’，这就太狂妄了！”大师说得很轻、很慢，但一个字一个字说得清清楚楚。“什么是‘影响力最大化’呢？一个人如果老想着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你想想，那其实是在追求名利啊！问问自己的心吧！千万不要自己骗自己

……”

听到这里，我简直如五雷轰顶，从来没有人这么直接、这么温和而又严厉地指出我的盲点。我愣在那里，久久没有答话。

“人生难得，人活一回太不容易了，不必想要改变世界，能做好自己就很不容易了。”大师略停了停，继续说，“要产生正能量，不要产生负能量。”他说的每一个字都落在我的心田里，“面对疾病，正能量是最有效的药。病痛最喜欢的就是担心、悲哀、沮丧，病痛最怕的就是平和、自信，以及对它视若无睹。我患糖尿病几十年了，但我无视它的存在，每天照样做我该做的事，我现在还不是活得好好的！”

那几天常听大师开示，我觉得自己过去坚信不疑的很多价值观、信念都是有缺陷的。我当时还带着很多因为身份、名望、地位而来的自负，大师的话语，我虽然记住了，可是我并没有完全明白，也没有完全接受，甚至还有点儿不服气。

有一天，我想到我时常在微博上针砭时弊，也曾对一些负面的社会现象口诛笔伐，于是请教

向死而生

◎ 李开复





大师要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社会上的“恶”。没想到，大师还是以一贯平和的语气回应我：“一个人倘若一心除恶，表示他看到的都是恶。如果一心行善，尤其是发自本心地行善，而不是想要借着行善来博取名声，才能引导社会，对社会产生正面的效应。”

“可是，如果看到贪婪、邪恶、自私等负面的现象，又该怎么办呢？”我想辩解。

大师说：“要珍惜、尊重周遭的一切，不论善恶美丑，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就像一片生态完整的森林里，有大象、老虎，也一定有蟑螂和老鼠。完美与缺陷本来就是共存的，也是从人心产生的分别。如果没有邪恶，怎能彰显善的光芒？如果没有自私的狭隘，也无法看到慷慨无私的伟大。所以，真正有益于世界的做法不是除恶，而是行善；不是打击负能量，而是弘扬正能量。”

养病期间，大师的话语时常在我心中回荡。我想的最多的就是“影响力”这三个字。

那时候，我确实沉溺在各种浮躁的快感中，我是万众瞩目的焦点，走到哪儿都有粉丝围绕着我；我在微博上的影响力，让我能够轻易发起万人实名抵制某一档红火的电视节目；我认为自己是路见不平、仗义执言的大侠，丝毫未察觉自己已经越界。我坚信自己是在关心社会，但骨子里我已经被千万粉丝冲昏了头。每一个社会重大事件，粉丝都会期待我的表态，于是我陷入言论被转发与关注的热潮中，不能自己。甚至还运用我的专业知识，筛选最值得关注的微博，好让我的言论更具有影响力。

大师重重点醒了我，他说：“追求影响力最大化，最后就会用影响力当借口，去追求名利。不承认的人，只是在骗自己。”为了追求更大的影响力，我像机器一样盲目地快速运转，我心中那只贪婪的野兽霸占了我的灵魂，各种堂而皇之的借口，遮蔽了我心中的明灯，让我失去准确的判断力。我告诉自己，有了影响力，我就可以伸张正义，做更多有意义的事。但我的身体很诚实，我长期睡不好、痛风、便秘，还患了几次带状疱疹。这些警示都太微弱了，无法撼动我那越来越强大的信念。人说“不到黄河心不死”，狂心难歇，最后身体只好用一场大病来警告我，把我逼到生命的最底层，让我看看自己的无知、脆弱、渺小，也让我从身体小宇宙的复杂多变，体会宇宙人生的深邃和奥妙。

身体病了，我才发现，其实我的心病得更严

重！当我被迫将不停运转的机器停下来、不再依赖咖啡提神的时候，我的头脑终于可以保持清醒，并清楚地看到，追逐名利的人生是肤浅的，试图改变世界的人生是充满压力的。珍贵的生命旅程，应该抱着初学者的心态，对世界保持儿童般的好奇心，好好体验人生；让自己每天都比前一天有进步、有成长，不必改变别人，只要做事问心无愧，对人真诚平等，这就足够了。如果世界上每个人都能如此，世界就会更美好，不必等待任何一个救世主来拯救。

现在，之前汲汲营营追求的一切，在我心里都渐渐淡了。卸掉身上很多看不见的负担，我才有能力辨识，网上许多激昂、沸腾的讨论，常常都充满了负能量。

昨日种种，譬如昨日死；今日种种，譬如今日生。病中醒来，昏聩的心灵也醒过来了。我现在不太看网络消息，更不觉得自己需要网上仗义执言。眼不见，心不烦，不见可欲，使人心不乱；不烦不乱，就不会给身心带来压力。压力是一切疾病之源，就算是对自己的健康负责，我也势必要远离过去的生活方式了。

（留痕摘自中信出版社《向死而生：我修的死亡学分》一书，戴晓明图）



扫描二维码，分享文章

在这个世界慢慢地行走

◎朱德庸

我一个人在这个世界慢慢地行走。

独自、孤单地走，直到遇见了我的太太，从此两人携手在这个世界慢慢地行走。

在行走的过程中，我们经常遇见想加入我们行列的人，但最终他们发现，这并非一条快速通往财富的康庄大道，他们就会勃然大怒，恶念在这个世界慢慢地、慢慢地行走，驱赶当初所有承诺的善念。

这种情形如同石块般散落在路上，有时我们搬开它，有时我们被绊倒，有时我们被砸伤，有时我们惊讶、有时我们失望、有时我们愤怒。

如今我和太太仍然手牵着手在这个世界慢慢地行走，同时我们也知道路上依然充满着碎石。

（唐丽光摘自新浪网作者的博客）

在任何一种生活里都能找到幸福

◎金星

做母亲时我是个最平常的女人，我对孩子们的期望也只是他们能够像平常人家的孩子一样，快乐、健康，以后能为自己的人生做出选择。虽然他们的妈妈有点特殊，但我希望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就能学会用平常心看待世界，能与人真诚交流，从最普通的生活里看到最真实的美好。

我经常在与普通人的交流中得到快乐。我不会用我的光环罩着你，你也不用迎合我。所以我跟骑三轮车的大爷、看门的保安、打扫卫生的阿姨关系都很好。每次带着孩子碰见他们，我总会热情地打招呼，孩子们看在眼里，就知道该怎么尊重别人。

搬家之前，我特别喜欢逛家附近的一间小店，里面卖的都是一两百元的花裙子。由于常买常穿，和老板娘也熟了，拉拉家常，讨价还价，最后开开心心地做成了买卖。如果孩子们在身边，他们会看到这就是真实的生活。妈妈虽然也会去旗舰店买名牌衣服，用来出席一些重要场合，但生活里更常去的是这样的街边小店，你来我往，买卖间更有人情在。

陕西南路路口，晚上经常会有一对安徽小夫妻，他们摆着一个炒米粉小摊，过去我们是那里的常客，他们做的东西既干净又好吃。认识他们有六七年了，他们刚有孩子的时候，我就把我们家老三的衣服全打包送给他们。我说：“别嫌弃啊，都是些穿不了的，扔了怪可惜的。”他们接过衣

服，特别感激。但从不见他们四处说和我很熟，也不会因此不收我们吃米粉的钱，该怎样还是怎样，大家心里都特别踏实。许久不见了，他们会关心一下我最近是不是太忙，让我别太累。有一年新年，我把小两口请到我们家的院子里来，那晚所有的客人都吃上了他们做的炒面、炒饭、馄饨，客人们都说好吃。我看着这小两口，到上海谋生，从没孩子到有孩子，一直本本分分地生活，这成为我在上海最重要的记忆和风景。我经常带着孩子们去那里，就算现在搬家后离得远些，每个月也会特地跑过去吃点东西。人与人之间这种真实平等的关系真美，我想让孩子们从小

就能理解这种美。

有一天，我在录节目，收到老公的短信：“我跟你讲个故事。”那天老公带着嘟嘟去一个弄堂里修大衣拉链，一对80多岁的老夫妻在那里摆摊，老太太给老头儿打下手，那老头很娴熟地就把拉链修好了。老两口的生活极其简朴，却充满对生活的热情，还带着一辈子的手艺在继续为别人服务，这个画面把嘟嘟感动坏了。在回家的路上，他一直跟他爸爸念叨：“那对老夫妻太幸福了，爸爸，你看到了吗，他们真是太幸福了！”这种幸福感染了我儿子，也感染了我老公，他们急着要和我分享这种幸福。

我有能力的时候，会尽力给孩子们创造一个优越的成长环境。但世事无常，我不能保证这样的物质基础会一直存在。如果有一天，我突然住不起大房子，也没有那么多人认识我了，我就想让孩子们明白，就算回到一个最普通的生活层面，我们一样可以过得很好。他们已经在别的地方看到了那种最平常的幸福，不是住在高楼大厦里，不是西装革履，而是在最简单的生活和最丰富的心灵里。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种生活方式，命运将你推向任何一种层面都别奇怪，别怨天尤人，它并没有剥夺你幸福的权利，在任何一种生活里，我们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从容摘自《广州日报》2015年7月10日）





中国人真是太善良。

——80岁的日本老人丸山严骑行近千公里，跨东北三省寻找中国恩人，称当年战败后，有个哈尔滨人经常接济他们一家

将薪比薪，是找不痛快的快捷方式。

——不要随便问别人赚多少钱

女人就像股票，本来看好的股票买到手就一个劲儿下跌，以前看不到的弱点和缺点都暴露出来了；一旦抛出去，到别人手里又变得那么可爱。

——男人评价女人

我炒股不是为了赚钱，而是因为分析股票需要动脑子，这样不容易得老年痴呆。

——杭州一97岁老人躲过暴跌，被封“股神”，自称炒股为防老年痴呆

迟到毁一生，早退穷三代；按时上下班，必成富一代。

——这是一首来自网络的打油诗，如今被贴在了重庆九龙坡区石桥铺一家大型保险公司的打卡机上方。以前该公司出勤率就很高，现在员工的出勤率更是达到百分之百

想让女人安静下来，就用前置摄像头对准她，从而见证一秒内完成收腹、并腿、挺胸、收下巴、瞪眼睛、嘟嘴唇、摆Pose、整理发型、露出安静甜美微笑的人类敏捷奇迹。

——最好用的方法

战斗民族的自拍非同一般，



爬上铁路桥自拍被电死，和熊合影被咬死。

——随着越来越多由自拍引发的意外发生，俄罗斯内务部不得不专门印制传单，呼吁民众自拍时注意安全

只顾自己玩乐不陪孩子(63.7%)，没有耐心、打骂孩子(50.9%)，过于溺爱孩子(46.4%)，让老人带孩子(44.4%)。

——近日，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就家长们比较常见的“不靠谱”的育儿行为对1003人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上述四项排在前列

你住的城市下雨了，很想问你有没有带伞。可是我忍住了，因为我怕你说没带，而我又无能为力，就像我爱你却给不了你想要的陪伴。

——宫崎骏

感觉工作干得不错，但一直没有得到提拔，心态开始失衡，从当第二任县委书记开始，就只想着怎么多挣钱了。

——河北大名县原县委书记边飞敛财上亿获死缓，称未获提拔后只想挣钱

情商高呢，主要是让别人高兴；智商高呢，主要是让自己高兴；智商不高情商也不高呢，主要就是自己不高兴了还不让别人高兴。

——智商与情商

我们说别再有广岛（原爆），别再有长崎（原爆），但没有人说别再有南京（大屠杀）。

——韩国慰安妇证言纪录片《与记忆共生》遭日本多数影院拒绝，对此，影片拍摄者、日本自由记者土井敏邦表示

上不去的工资、睡不饱的觉、喂不胖的钱包、减不下去的腰。

——懒人的烦恼

爱情就是不吵架的时候觉得可以为他去死；吵架的时候觉得最该死的人是他；吵完架觉得，天啊，他要是死了我也不活了。

——女人的矛盾心态

婚姻，说到底，不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吸引，而是一种生活方式向另一种生活方式的投奔。

——胡剑云

家长逼婚，暂停营业。

——陕西咸阳一快餐店老板30岁还无对象，面对父母堵门逼婚，无奈贴出上述告示

（徐杰、余长生、汪杰、王树芳、若子等摘）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原址

永远的“笳吹弦诵”

◎陈平原

“七七事变”爆发，平津很快陷落。1937年8月，奉部令，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在长沙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2月西迁入滇，4月抵昆明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胜利后，1946年7月31日联大结束，三校各自返回平津。据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称：“9年之中，先后在联大执教的教授290余人，副教授48人。前后在校学生约8000人，毕业生有3800人。”日后，这些教授与学生中英才辈出，这所大学因而永垂不朽。

1937年10月，借助于报纸公告、电台广播、私人通信等，获得信息的三校学生纷纷历尽艰险，赶往长沙报到。11月1日，学校正式上课。上午9点，响起了空袭警报，师生并未逃避，校史上加了个括号——实在也无处可躲。作者的本意是，当时尚未来得及挖防空洞；我则理解为，已经没有退路了，故师生们置生死于度外，大义凛然地走进教室。此举颇具象征意义，就在这连天炮火中，大幕徐徐拉开——“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八年抗战，中国的大学不仅没被战火摧毁，还发展壮大，这实在是个奇迹。据历史学家称，1937年，抗战爆发前夕，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含国立、省市立、私立）108所，教员7560人，职员4290人，学生41992人；1945年，抗战胜利时，专科以上学校（含国立、省市立、私立）141所，教员11183

人，职员7257人，学生83498人。具体到部分著名大学，情况尤其明显。比如，浙江大学1936年有教授、副教授70人，在校生512人；到1946年复原返杭时，教授、副教授达到201人，在校生2171人。中央大学1937年有在校生1072人，教授、副教授133人，全校教师290人；到抗战结束前的1944年，在校生3837人，全校教师590名，其中教授、副教授290名。唯独声名最为显赫的西南联大，因系三校合一，发展规模受到很大限制。同样以1944年为例，西南联大各类学生加起来，不过2058名，教职员382名，其中教授、副教授179名，数量上远不及中央大学。也就是说，作为整体的西南联大，其办学规模约略等于中央大学的2/3。考虑到中央大学和西南联大均为国立大学，其经费来源一样，单看这两组数字，便能明白国民政府的态度。对于大学来说，规模不等于水平，更不等于贡献。但无论如何，中国的高等教育没有被战火摧毁，反而越战越强，这点很让人欣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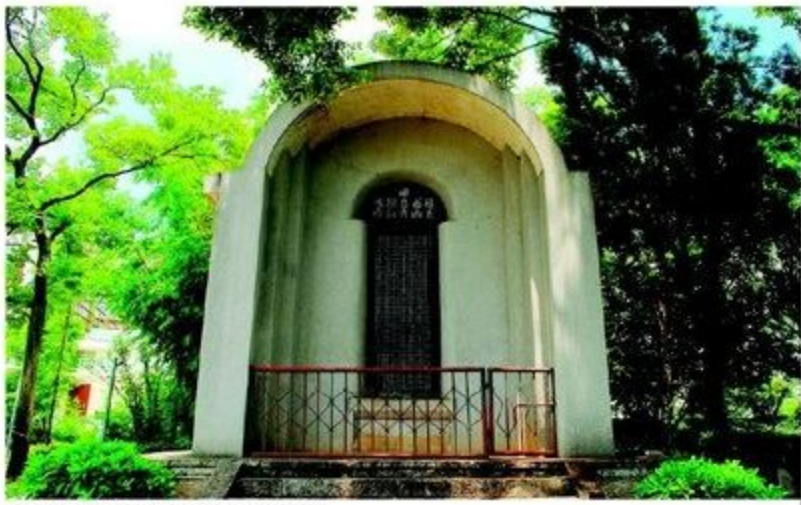
抗战中，中国大批大学内迁，其意义怎么评价也不过分——保存学术实力、赓续文化命脉、培养急需人才、开拓内陆空间，更重要的是，表达一种民族精神及抗战的坚强意志。而绝大多数大学的迁徙活动，并不是事先设计好的，而是迫于战火临近，不得不一再搬迁。像西南联大那样暂驻长沙，而后迁往昆明，已经算是很幸运的了。创建于1907年的国立同济大学，校址原在上海吴淞镇北，抗战八年间，辗转内迁六次：一迁上海市区，二迁浙江金华，三迁江西赣州，四迁广西八步，五迁云南昆明，六迁四川李庄。而国立浙江大学同样历尽艰辛——经过四次大的搬迁，行程2600余公里，足迹遍及浙、赣、湘、桂、闽、粤、黔七省，于1940年1月到达黔北，在遵义、湄潭、永兴等地坚持办学，直至抗战胜利，于1946年5月返回杭州。在遵义、湄潭等地办学的浙大，据中国核武器研制的主要奠基人之一王淦昌回忆：“虽然条件艰苦，生活清贫，但我们朝气蓬勃，精神愉快，学术氛围很浓，有‘东方剑桥’的雅称。同事之间、同学之间、师生之间团结友爱，亲密无间，平等相待。”正因如此，浙大人对贵州心存感激，南归之前，专门以校



长竺可桢的名义立碑纪念。

当然，抗战中内迁大学之立碑纪念，最著名的，还属冯友兰撰文、闻一多篆额、罗庸书丹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具体谈论的是西南联大，但碑文所表达的情感，尤其是南渡而能北归的欢欣与赞叹，属于全体内迁高校的师生。

中国大学如此大规模内迁，且坚持到最后胜利，这确实是个奇迹。“二战”中其他国家的大学，也都面临各种危机，但唯一可比较的，是苏联的诸多学校。康斯坦丁诺夫等编的《苏联教育史》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卫国战争形势，不能不影响到国民教育和苏维埃学校活动。成千上万高年级学生、教师和大学生，满怀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离校参加了民兵、红军和游击队。”为了保护儿童，政府将靠近前线的幼儿园和小学撤退到后方。至于学校课堂则是“讲授的内容具有更大的实用性”，“同生活建立了更密切的联系，并设立了战时防御题目的讲授”。毫无疑问，高等院校与卫国战争的关系更为密切：“为了抢救高等学校的物质、文化财富，高等学校的全体师生及员工进行了奋不顾身的斗争，把147所高等院校的教学实验设备、图书馆、珍贵陈列品，撤退到国家的后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

方。”而斯大林格勒战役获胜后的第八天，一批苏联的大学教授来到这个被彻底破坏的城市，重建医学院，第二年便恢复了正常的教学工作。苏联卫国战争中，与西南联大的遭遇最为相似的，莫过于莫斯科大学。“就在1941年6月22日战争爆发的当天下午，（莫斯科大学）就有数百名教师、研究生和本科生以及职工投笔从戎，参加了保卫祖国的斗争。”不久，又有物理系、历史系的师生数百人上前线。整个战争期间，该校有3000多人参加苏联红军，许多人牺牲在战场。而留在学校里的专家，则“彻底修订了科研工作计划，把一些有关和平建设的课题取消了，而把具有国防意义的课题放在首位”。莫斯科大学具体的迁徙行程是：1941年10月开始，大部分师生迁到土库曼共和国首都阿什哈巴德，12月1日复课；1942年夏季，战局不利，

又迁往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随着苏军由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1943年春，莫大胜利回迁莫斯科。换句话说，莫斯科大学漂流在外的时间不到一年半。

英国的大学虽被轰炸，但未被占领；法国全境被占领，大学因而无处可迁；唯有苏联，在卫国战争中同样存在大学内迁的现象，但因时间不长，没能像西南联大那样——不但未被战火摧毁，还在发展壮大的同时，催生出许多美好的“故事”与“传说”。

有一点值得注意，基于对长期抗战的预期、对学问的敬重，以及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国民政府并没像“一战”中的英美或“二战”中的苏联那样，征召大批的大学生（更不要说教授）入伍。在这个问题上，教育部及大学校长们有更为长远的考虑。面对各方激烈争议，教育部不为所动，他们认定：“抗战既属长期，各方面人才，直接间接均为战时所需。我国大学，本不甚发达，每一万国民中，仅有大学生一人，与英美教育发达国家相差甚远。为自力更生抗战建国之计，原有教育必得维持，否则后果将更不堪。至就兵源而言，以我国人口之众，尚无立即征调此类大学生之必要。”浙大

校长竺可桢，也在《大学生与抗战建国》中表达了类似的观点：“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美各国都送大量的大学生上前线去是失策，到了战后才深深地感觉到。”“国家为了爱护将来的领袖人物起见，不把大学生送往前线去冲锋杀敌，他们则应奋身图报，努力上进，能把将来建国的重任担当起来，方可对得起战死沙场的勇士，方不愧为今日之程婴。”当局表彰热血青年投笔从戎，但不做硬性规定，这也是抗战中教授及大学生牺牲较少的缘故。西南联大纪念碑的碑阴刻有“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参军人数834人，牺牲5人。实际上，还有若干没来得及汇入此题名的，但总的来说，并没有太大牺牲。

（樊鑫摘自北京大学出版社《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一书）

这才是爱情里最重要的事 ●李筱懿

一凡是我最难忘的朋友，只是，在她28岁的时候，上天就把她从我们身边带走了。

如果你认识她，或许会和我一样喜欢她。

她是个既安静又开朗的姑娘，言语恰到好处，有她在，既不会觉得聒噪，也不会感到冷场。她周到地照顾着每个人的情绪，也能委婉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她散发着温和的光彩，从不灼痛别人的世界。

就是这么一个姑娘，28岁之前，她都是幸运的。

从重点小学、初中、高中毕业，顺利考上重点大学；大学里和高高帅帅的学长恋爱，毕业后嫁给他；工作地点距离父母的住所只有20分钟步行路程，中午可以悠闲地回到从小生活的地方吃饭、午休；生了个好看的女儿，被外公外婆视若珍宝抢着带，自己也没有变成臃肿的新手妈妈；工作体面平顺，按部就班地晋升，由于处事大方得体，同事关系也融洽，是个被领导器重的中层干部。

生活如果看起来美好得像假的，那十有八九就是假的，或者，命运会在最出其不意的时候来个反转，唰唰存在感。

我还记得那是某个夏天的傍晚，一凡头一回没有事先打电话就直接到我的办公室，我忙着手里的活，她坐在我身边的椅子上呆呆地咬着指甲，等我忙完，她惨淡地笑着，眼神愣愣地说：“筱懿，我得癌症了。”

卵巢恶性肿瘤。

这是一种早期很难被发现的女性重

症，除了遗传性卵巢癌之外，没有多少可行的预防措施，只能早诊早治，争取早期发现病变。

可是，一凡发现的时候，已经不早了。

我怀疑上天预先知道她的人生结局，才安排了好得不真实的这28年，然后海啸般吞噬一切，只留下光秃秃的沙滩，像是对她幸运人生的最大嘲讽。

那天，我和我认识了20年的姑娘——我的发小一凡，在我们走过了无数次的林荫路上来来回回地踱步，我拉着她冰冷的手，努力不在她面前流泪。

突然，她停下来，轻声对我说：“别告诉任何人，我已经这样了，我父母、老公、女儿还得继续生活，让我想想，怎么安顿好他们。”

她抱抱我，转身回家。第一次，她没有嘻嘻

哈哈地挥手向我告别，而是头也不回地走远。我看着她的背影完全消失，才蹲在地上放声大哭。

每天，我都装作若无其事地给她打个电话，她的语气日渐轻松。半个月后，她在电话里说：“我解決好了，咱们中午一起吃饭吧。”

在她最喜欢的菜馆，她小口地喝着冬瓜薏米煲龙骨汤，我不催，她愿意说什么，愿意什么时候说，随她。

“我先和老公说的。我给他看了病历，对他说，老公啊，我陪不了你一辈子啦，你以后可



我一天比一天聪明了。这真是悲哀！对于世情，我太明白——每个男人，都希望他生命中有两个女人：白蛇和青蛇。同期的、相间的，点缀他荒芜的命运。只是，当他得到白蛇，她渐渐成了朱门旁惨白的余灰，那青蛇，却是树顶青翠欲滴的嫩叶子；待他得了青蛇，她反是百子柜中闷绿的山草药，而白蛇，则是抬尽了头，方能得见的天际皑皑飘飞柔情万缕的新雪花。每个女人，



青 蛇

●李碧华

也希望她生命中有两个男人：许仙和法海。是的，法海是用尽千方百计博你偶一欢心的金漆神像，仰之弥高；许仙是依依挽手、细细为你画眉的美少年，给你讲最好听的话语来熨帖心灵。但只因到手了，他没一句话说得准，没一个动作硬朗。万一法海肯臣服呢，又嫌他刚强怠慢，不解温柔，枉费心机。

（刘 影摘自新星出版社《青蛇》一书）

得找个人接替我好好疼你呦。

“女儿太小，你父母年纪大，又在外地，今后你独自带着小姑娘，大人小孩都受罪。我父母年纪适中，女儿又是他们一手带大的，你要是同意，今后还让他们带着，老人有个伴儿，你也不至于负担太重，能匀出精力工作、生活。

“咱们两套房子，我想趁我还能动，把现在住的这套过户给我父母：一来，给他们养老；二来，如果他们用不上就算提前给女儿的嫁妆。如果你不介意，把我那一半存款存到女儿户头上，算她的教育基金。另外那套新房子，你留着今后结婚用，你肯定能找个比我更好的姑娘，得住在和过去没有半点关系的新房子里才对得住人家。”

我问：“他怎么说？”

一凡放下汤勺：“他没听完就快疯了，说我胡扯，让我先去把病看好。可是我知道根本看不到。

“我想让老公没有负担地开始新生活，他那么年轻，不能也不值得沉没在我这段生活里；我想给女儿有爱和保障的未来，不想她爸爸凄凄惨惨地带着她，也不想让她面临父亲再婚和继母关系的考验，那样既难为孩子也难为她爸爸；我还想给父母老有所依的晚年，他们只有我一个女儿，俩人还不到60岁，带着外孙女好歹有个寄托，他们还算是有知识的老人，孩子的教育我不担心。

“我不想为难人性，更不想用最亲爱的人今后的命运去考验爱情的忠贞，或者亲情的浓稠。我只希望在我活着的时候，在我力所能及的条件下，把每个我爱的人安置妥当。生活是用来享受的，而不是拿来考验的。

“我和老公讲道理，他最后同意了，他明天送我去住院，然后，我们一起把这事儿告诉我父母，这是我们小家庭商量后的决定。”

一凡半年后去世了。

就像她生前安排的那样，女儿在外公外婆家附近上幼儿园，维持着原先的生活环境，老公每天晚上回岳父岳母家看女儿，也常常在那儿住。他们的关系不像女婿和岳父母，倒像儿子和岳父母。

两年以后，她的老公恋爱了，对方是个善良知礼的姑娘，另外那套房子成为他们的新居，婚礼上，除了男方女方的父母，一凡的父母和女儿也受邀出席。

因为无须在一起近距离生活，所以大家几乎没有矛盾，女儿也喜欢漂亮的新妈妈，每年清明，大家一起给一凡送花儿。

在一个原本凄惨的故事里，每个人都有了最好的归宿。

每个人都因为一凡的爱而幸福安好，这才是真正的爱情，以及亲情——不只有激情，不仅是索取，不光为自己，还有对他人的善意与安置。

曾经，我以为爱情里最重要的事是“爱”本身，一凡让我明白，“爱”本身不难，难的是许对方一个看得见的未来，爱情里最重要的事，是我知道自己会离去，却依旧要照顾好你，给你一个妥帖的未来。

这才是一个女人柔韧的坚强、宽阔的善良，以及无私的爱。

（依依摘自《现代青年》2015年第5期，刘程民图）



扫描二维码, 分享文章



本文为美国退役空军少将查尔斯·斯文尼于1995年5月11日在美国国会发表的演讲。

我是美国退役空军少将查尔斯·斯文尼。我是唯一一位参加了两次对日本原子弹轰炸的飞行员。

在此，我将陈述本人亲身经历的往事。我要强调指出，我所陈述的都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而有些人就是无视这些明显的事实，因为这些事实与他们头脑中的偏见不符。

时至今日，像绝大多数人一样，我最不希望发生的一件事就是战争。当我国正在大萧条中挣扎时，日本开始了对邻国的侵略——搞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法西斯总是打着漂亮的旗帜去掩饰最卑鄙的阴谋。

这种“共荣”是通过对中国进行残酷的总体战进行的。日本作为一个国家，认为自己命中注定要统治亚洲，进而占有整个亚洲的广袤土地。日军屠杀无辜的人们，没有丝毫的怜悯和犹豫。在惨绝

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中，30万手无寸铁的平民被屠杀。这是犯罪，是事实。

日本认为美国是阻止其现在亚洲的“神授”命运的唯一障碍。于是日本对驻扎于珍珠港的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进行了经过精心策划的偷袭。偷袭时间定于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因为此时行动可以最大限度地摧毁舰队、消灭人员，给美国海军以致命的打

击。

数千名美国水兵的生命湮灭于仍然沉睡在珍珠港湾底的美海军亚利桑那号军舰里。其中许多士兵甚至不清楚为什么遭到突然袭击。

科雷希多的陷落及随后日军对盟军战俘的屠杀，驱散了人们对日军兽性的最后一丝怀疑。即



无可争辩的事实

◎〔美〕查尔斯·斯文尼

使是在战时，日军的残暴也是令人发指的。

巴丹死亡行军充满了恐怖。日本人认为投降是对自身、对家庭、对祖国、对天皇的侮辱。他们自身和对敌人都不手软。巴丹半岛上的7万多名美军和菲律宾战俘惨遭殴打、枪杀、被刺刀捅死，或惨死于疾病和饥饿。

随着美国在广阔的太平洋向日本缓慢、艰苦地进军，日军显

示出自己的冷酷无情、桀骜不驯。无论战事多么令人绝望，无论机会多么渺茫，无论结果多么确定，日军都全力以赴去杀死尽可能多的美国人。

日军用言语和行动表明，只要有一个美国人踏上日本本土，他们就处决所有的盟军战俘。日本为大屠杀做准备，强迫盟军战俘为自己挖掘坟墓。即使在投降后，他们仍然处决了一些战俘。

《波茨坦公告》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本人认为这是荒唐可笑而不屑考虑的。我们从截获的情报中得知，日本打算拖延时间，经谈判争取可以接受的条件，之后再投降。

在1945年8月6日之前的几个月里，美国飞机开始轰炸日本本土。一个个日本城市化为火海，成千上万的日本人死去。但日军发誓决不投降。他们准备牺牲自己的人民，换取他们所追求的光荣和荣誉。

他们拒绝救助平民，尽管我们的飞行员事先已就可能来临的空袭投撒了传单。

即使在使用原子弹轰炸了广岛之后，日本军部仍然认为美国只有一枚原子弹，日本可以继续坚持。在8月6日之后，他们有3天的时间用于投降，但他们坚决不。只有在长崎受到原子弹轰炸后，日本天皇才宣布投降。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日军仍声称他们可以而且应该继续战斗。一个陆军军官团体发动叛乱，试图截获并销毁天皇向日本人宣布投降的诏书。



这些事实有助于说明我们所面临的敌人的本质，有助于认清杜鲁门总统在当时进行各种选择时所要考虑的背景，有助于理解为什么对日本进行原子弹轰炸是必要的。

50年过去了，在某些人看来，日本成为受害者，美军成为凶残的征服者和报复者。自然，为了支撑这种歪曲历史的说辞，他们必然要故意无视事实或者编造新的材料以证明这种论调。其中最令人吃惊的言论之一，就是他们否认日军曾进行过大屠杀。

关于杜鲁门总统为什么要下达对日本进行原子弹轰炸命令的争论，在某些情况下已演变成数字游戏。史密斯策划的“原子弹轰炸后果”展览，显示了卑劣的论调，这种论调在史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

“原子弹轰炸后果”展览传递出这样的信息——日本是受害者，美国是罪恶的侵略者。想象一下，如果你的孩子去看展览，他们会留下什么样的印象？他们还会知道事情的真相吗？

在一个全国性的电视辩论中，我听到这样一位所谓的杰出历史学家声称，对日本投射原子弹是没有必要的，杜鲁门总统是想用原子弹吓唬俄国人，日本本来已经打算投降了。

有些人提出，艾森豪威尔将军曾说过，日本已准备投降，没有必要使用原子弹。然而，基于同样的判断，艾森豪威尔曾严重低估了德国继续战斗的意志，在1944年就下结论说，德国已无力进行攻势作战。这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判断，其结果是阿登战役的激战。那场战役，数万盟军牺牲，并带来了允许德国拖延战

争和有条件投降的风险。

一个相当公正的结论是，根据太平洋战争的情况，可以合理地预计，日本将是比德国更疯狂的敌人。

有一种言论认为，如果盟军进攻日本本土，我们的伤亡人数不是100万，而是只要死上46000人就够了。“只不过是46000”！你能够想象这种言论的荒谬吗？好像这些美国人的生命是无关紧要的。

根据对日本战时行为的判断，我认为，对日本本土的进攻将是漫长而代价高昂的。根据我们所知道的情况，日本并不打算无条件投降。

在对硫磺岛的进攻中，60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官兵牺牲，美军伤亡总数达27000人。

但对那些认为我们的损失“仅是46000人”的人，我要问：“是哪46000人？谁的父亲？谁的兄弟？谁的丈夫？”

数以万计的美军焦急地等待着进攻——他们的命运取决于日本下一步怎么走。日本可以选择在任何时刻投降，但他们选择了拖延。

而就在日本“无所作为”的时候，随着战事的进行，美军每天伤亡900多人。

我曾听到一种说法，称我们应该与日本谈判，达成一个日本可以接受的有条件投降。

我从来没听任何人提出过与法西斯德国谈判投降。这是一个疯狂的念头，任何有理性的人都不会说出这样的话。与一个邪恶的法西斯魔鬼谈判，就是承认其合法性，即使是已经在事实上打败了它。这并不是那个时代空洞的哲学上的原则，而是人类的正

义要求，必须彻底、干净地铲除法西斯恶魔的势力，必须粉碎这些邪恶的力量。法西斯的领导者已经无情地打碎了外交的信誉。

为什么太平洋战争的历史这么容易就被遗忘了呢？也许原因就存在于目前正在进行着的对历史的歪曲，对我们集体记忆的歪曲。

战败50年后，日本领导人轻率地声称他们是受害者，广岛、长崎遭原子弹轰炸事件与南京大屠杀在实质上是一回事！

整整几代日本人都不太清楚他们的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干了些什么。这就可以理解他们不明白日本需要道歉的原因了。

与德国人认罪的态度不同，日本人坚持认为他们没做错任何事，他们的行为是受当时局势所迫。这种态度粉碎了任何真正可以弥合创伤的希望。

只有时刻铭记历史，才能带来真正的原谅，而遗忘就可能冒重复历史的危险。

通过精心策划的政治和公关活动，日本现在建议使用“太平洋胜利日”来取代“对日本胜利日”这一术语。他们说，这一术语将会使太平洋战争的结束显得不特别与日本有关。

有些人可能会提出，这些文字能说明什么呢？对日本胜利——太平洋的胜利——让我们庆祝一个事件，而不是一个胜利。

文字或话语可以像任何一种武器一样具有毁灭性：上是下，奴役是自由，侵略是和平。

今天日本巧妙地打起种族主义这张牌，以此来宣扬其行为的正义性。日本不是进行罪恶的侵略，而只是从白人帝国主义中解放受压迫的亚洲大众。解放！是



朋友客厅的墙上挂了一幅字，我一眼便认出是溥杰的书

中年与学力

●林国卿

法，朋友误认为我懂书法，其实我之前只见过那特殊字体一次；我又认出他桌上的紫砂花瓶是顾绍培的百寿瓶，朋友颇觉惊奇，而我只是在拍卖图录上见过它。

我闲来喜欢乱翻书刊，床头常放轻松的图文书籍——有关玉器、紫砂、书法、茶叶、烟斗等等，一本说尽，过眼即记，几十年累积，印在脑海里，虽然浅薄，但对懒得翻书的朋友来说，已感惊奇。

人过中年，进退不齐，专长

不一，老同学相见，最能体认中年以后的变化。求学时，所读所学雷同，人人差异不大；经过数十年，读不读书，经不经事，人人不同，见面即知差异变大。

晚清《蕙风词话》虽然说词，可这段话于中年人有益，其中说道：填词造句要自然，有两条道路，一是性灵流露，一是书卷酝酿。性灵是天分，书卷是学力，但“中年以后，天分便不可恃，苟无学力，日见其衰退而已”。可见年轻时才气纵横，过了中年，若学力不进，亦日渐衰退。

（刘 振摘自《深圳商报》2015年7月6日，董克诚图）

的，他们用屠杀“解放”了2000万无辜的亚洲人。我坚信，这2000万无辜的人，他们的家人、他们的后代，永远也不会欣赏日本“崇高”的行为。经常有人问我，用原子弹轰炸日本是否是出于报复，是否是蓄意毁灭一个古老而令人尊敬的文明。

对此，有如下事实：其一，在最初的轰炸目标列表上包括京都。虽然京都也是一个合法的目标，在先前的空袭中未曾予以轰炸，但国务卿史迪文森还是把它从目标列表中去掉了，因为京都都是日本的古都，也是日本的文化、宗教中心。其二，在战时，我们受到命令的严格约束，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轰炸东京的皇宫——尽管我们很容易识别皇宫并炸死天皇。我们并没有那样做，毕竟我们不是为了报复。我经常想，如果日军有机会轰炸白宫，是否也会像美军这样克制。我认为日军不会。

在此让我澄清一个事实，纠

正一个长期以来的偏见，那就是我们故意选择人口密集的城市轰炸。其实，我们要轰炸的每一个目标城市都有重要的军事价值。广岛是日军南方司令部所在地，并集结了实力可观的防御部队。长崎是工业中心，有两个重要的兵工厂。在这两个城市，日本都把兵工厂和部队配置于市区中心。

像在任何一场战争中一样，我们的目标——理所当然的目标——是胜利。这是一个不可动摇的目标。

我不否认战争双方死了许多人，不仅是两国人民，还有全世界的人民。我不为战争的残酷而骄傲、欢乐，我不希望我国或敌国的人民受难。每一个生命都是宝贵的。但我认为，这个问题应该去问日本战犯，是他们以日本人民为代价，追求自身的辉煌。他们发动了战争，并拒绝停止战争。难道他们不应为所有的苦难、为日本的灾难负最终的责任

吗？

如果日本人真切地了解过去，认清他们的国家在战争中的责任，他们将会看到，日本战犯应负起战争的罪责。日本战犯应该给亚洲人民一个答复，是谁把灾难强加给亚洲各国，最后强加给自己。

今天，我站在这里作证，并不是庆祝原子弹的使用，而是希望我的使命是最后一次。我们整个民族应该对原子弹的存在感到恐惧。

战争的代价总是高昂的，正如罗伯特·李将军所说：“战争如此残酷是件好事，否则就会有人喜欢它。”

由于德国和日本法西斯被击败，世界变得更好了。日本和美国的年轻人不再相互杀戮，而是出生、成长、成家立业，在和平中生活。作为10个孩子的父亲和21个孩子的祖父，我可以表示，我很高兴战争就这样结束。

（章 琦摘自豆丁网）



父亲的心肝

◎张国立

朋友浩子是台湾的资深媒体人，当过报社记者、电视台新闻部总监，如今在搞我迄今仍没搞懂的新媒体。我俩都有气喘的毛病，曾经一起拿出喷剂交流品牌。

去年年底，参加朋友女儿的婚礼时遇到浩子，他气色很差，经多方打听，加上对浩子的威胁恐吓，他终于说出实话，肝有点问题。经过两家医院的诊断，他先休养了一阵子，接着得接受换肝手术。

换肝？我有两个朋友换过肝，过程的痛苦不是旁人能想象的。而且，肝源从哪儿来？在台湾几乎不可能等得到肝。朋友们提了很多建议，甚至问浩子经济状况如何，能否挺得住。

浩子那阵子心情很苦闷，一度肝昏迷被送进医院急救，接着他的哥哥也因家族遗传，患肝癌过世。他打起精神帮着料理老哥的丧事，再默默面对自己的病情。

我忍不住又问：“浩子，有肝可换吗？”

浩子换肝和其他人不同，他不愁没肝，愁的是要不要接受。

浩子有两个女儿，与他感情很好，老大今年大学毕业，小女儿上大二了。看来单亲老爸很受女儿的宠爱。手术前我去他家探病，两个女儿对父亲要

动手术，已做好准备，把老爹服侍得仿佛身处人间天堂。然后我又问了肝从何处来的敏感问题，浩子才缓缓地说：“女儿捐的。”

不是一个女儿要捐，两个都要捐。

但医生说，得花点功夫做检验，看哪个女儿的肝适合他。小女儿对捐肝给老爸的事，非常坦然，可是也不讳言，她从小怕痛，连打针都怕，不过她还是要捐。

医院的检验结果出来了，小女儿的肝比较适合。大女儿私下跑去医院向医生请求：能不能用她的，因为她妹怕痛。用哪个女儿的肝，当然是医生说了算。

要动手术了，父女一同住院，一切顺利。浩子上周搬出加护病房，每天能说说笑笑到院子里去晒太阳了。

女儿是父亲永远的心肝，突然发现父亲更是女儿的心肝。勇敢的女儿向老爸证明：我们爱你，不能没有你。

至此，谈什么孝顺、家庭和睦，都显得俗气。

感情是种很微妙的东西，它不声不响地把人缠到一块儿，等到醒来，早已缠得难舍难分，便没什么好说的，躺在其中享受。这世界上还有什么比身体内有女儿的肝更暖心的事呢？又有什么比把自己的肝植入老爸体内，更让人安心的呢？

亲情是种依靠，孩子在外面遇到多大的挫折，回到家都有父母的庇护。风狂雨骤，没我家的墙厚瓦实。

我爱喝酒，不过最近每拿起酒瓶就放下，想到浩子父女，不论多好的酒也没他们的亲情来劲。好，没酒，就流点泪净化我的灵魂。恰好女儿来电话，问我最近在忙什么，我说了浩子的事，女儿沉默了几秒才回答：“老爹，我也会捐肝给你，可是你能不能好好照顾自己，少抽点烟、少喝点酒？”

我摸摸肚皮，肝到底在哪个方位？我对肝说：“肝啊，你给我好好争气。”望着山下一栋栋楼，这么晚，许多人家仍亮着灯，那星星点点的暖意透过窗，飘进一溜银河的星斗。

世界多么美好，为了庆祝浩子离开加护病房，我该喝杯酒，还是不喝酒了，上床睡个安稳觉吧。我想通了，孝顺是个名词，亲情才是动词。

（赵自力摘自《新民晚报》2015年6月22日，宋德禄图）

听见流星的声音

◎ 梁朝伟

2012年年初，《大魔术师》上映。之后的三年里，我和尔冬升各忙各的，几乎再没见过面。

这三年中，我听说这位老友跑去横店拍了一部和群众演员有关的电影，叫作《我是路人甲》。当时最令我感到好奇的，其实不是他为什么要去拍路人甲，而是他要怎么拍。这个一出道就当男主角、才貌双全又很任性的大个子，从来都没当过路人甲，他要怎么去拍路人甲的人生？

就是这样一个人，最近突然找到我，说要请我看电影。于是，我有幸提前看到了这部传说中的《我是路人甲》。

这是一次很意外的观影经历，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概括的话，我会想到“舒服”。对，这是我今年看过的最舒服、最清新的一部影片，也是我最喜欢的类型，既传递了信息，又引人思考，无论笑或哭都发自内心，毫不勉强。

尔冬升好像变了，变成熟了。我想他听到这句话可能会不太开心。2001年，我去横店拍《英雄》。那是我第一次去横店，当时天气已经转凉，那地方没有那么多的人。我每天骑着单车去片场，收工之后也会骑车到处转转，无聊时还会买些烟花，然后找个空旷的地方放一放。横店的夜晚很静，放烟花的时候会吓得一些乡亲大叫，我则躲起来偷笑，假装与我无关。

那年的11月19日，新闻说晚上会有狮子座流星雨。半夜收工后，我拖着导演，还有组里的人跑去片场的楼顶很兴奋地等着。突然，一颗流星划过，接着，又是一颗。起初我们都开心地欢呼，接下来就被越来越多的流星吓到，每个人都不再说话。

在这样安静的环境里，我隐约听到了“咻咻”的声音，起初

我有些奇怪那是什么声音，后来随着“咻”的一声，又一颗流星划过头顶，那时候我才发现，原来是流星划过天空的声音。

在那之前，我从来不知道流星也会有声音，城市里太嘈杂，人人都很忙，没时间听流星说话。

因为那场流星雨，我对横店至今都有着很美好的印象。30年前，当时的我还在卖家用电器，生活无风无浪。那时候我对未来唯一的设想就是，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大概会最终升职到销售经理吧。

这样其实也没什么不好，但偶尔会觉得，这似乎不是我想要的生活，至于我到底要什么，那时候的我并不知道。

多亏一位老友，那段时间一直给我洗脑，每天给我画各种光怪陆离的蓝图，劝我放弃工作和他一起去考艺员训练班。我最后被他说服，于是迈出了那一步。我很感谢那位老友，但我妈当时很生气，因为她觉得这个叫周星驰的家伙害她儿子辞掉了稳定的工作，去上什么前途未卜的培训班，我至今都记得她当时对我说的话：“衰仔！一块钱我都不会给你！”

她真的是讲得出，就做得得到。在艺员训练班的那一年，我是靠自己之前的积蓄撑下来的。那一年，我每天出门只带10块钱，走路去上课。如果不小心起晚了，10块钱就要交给的士司机，那天便只能挨饿。

我很怀疑我有没有对尔冬升讲过那段经历，因为，电影里那个叫万国鹏的男孩，和当年的我的境遇，真的是一模一样。不单是他，戏里的每一个路人甲，从初入行时的不知所措，到每一次演戏时的用力过猛，都会让我忍不住笑出声，就好像看到30年前的自己。

唯一的区别是，他们带着明





最喜欢的生存状态是两个极端：一是沉静，一是狂喜。

只有出世，才能得到真正的沉静。人潜入自己的内心世界，不问世事。当人脱离了当下的时间和空间，与所有已经逝去的人、书和思想在一起时，才能得到真正的沉静。

狂喜是当人发现了美的时候。世间美好的事物并不多见，当人见到了一道美丽

沉静与狂喜

◎李银河

的风景，心中会有狂喜的感觉；当人看到一件美好的艺术品（一张画、一本书、一首诗），心中会有狂喜的感觉；当人见到一个自己所爱的人，心中会有狂喜的感觉；当人创造出一点点美，心中会有狂喜的感觉。

唯愿此生沉浸于沉静与狂喜之中。

（夏 眠摘自新浪网作者的博客）

确的目标去了横店，而我是在进入训练班之后，才发现这是我想要的人生——我想要成为一名演员，不是明星，不是影帝，就只是演员。

“演员”这个词对我而言分量很重。2013年，我在洛杉矶工作的时候接触到一些群众演员，他们平时都从事着各种各样的职业，有的是侍应，有的是清洁工，但当你问他们是做什么的时候，他们还是会说：“我是个演员。”

我相信，能说出“我是演员”这句话的人，对演戏一定是有热情的。对我来说，演员的工作就是无条件地把戏演好，无关其他。

这些年来，经常有人问我，如果不做演员会做什么？我至今都想不出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不会做别的，从我入行那天起，就有一个强烈的执念伴随我，就是：不管我的角色是什么、戏份有多少，哪怕只给我一秒钟的镜头，我也要想办法让你在这一秒钟内记住我。

为了实现这个执念，我努力练习了很久，很难说这个执念就是我最初的梦想，但如果我要对得住“演员”这两个字，就必须做到这一点。

在片场的时候，我会常常忘记我是梁朝伟，因为我只记得这个执念，到今天也是这样。

回到眼前。我最近在家里看了很多日本电影，我很喜欢染谷将太主演的几部电影。看《我是路人甲》的时候，也有好几次产生错觉，觉得那个叫万国鹏的男孩和染谷将太有些相似，懵懂的样子在无形中化解了故事本身的压力，令观影过程也变得轻松愉悦起来。

《我是路人甲》的故事本身并不轻松，主演亦

都是陌生稚嫩的面孔，但尔冬升很聪明，他很清楚，要完成这个题材，唯一的办法，就是找真正的路人甲来演。对演员保持着清楚的认知和无比信任的态度，是他自《癫佬正传》开始树立起来的风格，我一直记得他看演员的眼神，那眼神分明就是在说：“对，我没看错，你就是这样的人。”

这感觉有时候很讨厌，但他偏偏总是对的。戏里，年轻的路人甲们在探讨何为成功，我看的时候也在思考。我理解的成功，不是衣食无忧，不是获奖无数，而是你能否真正享受每一次努力的过程。有梦想、有目标是好事，但如果只看到目标，就很容易忽略过程，就像跑步一样，你一心想跑到终点，就会忘记欣赏沿途的风景。

我们有时不懂珍惜，有时自视甚高，有时怨天尤人，其实说到底，都是放不下自我。很多心中的不平都是因为放不下，当我们学会放下，往往会获得更多。

梦想，不仅仅是有梦、敢想，还有做梦和思考的过程。因为有了这个过程，所以，结果是什么，就没那么重要了。

在大多数人看来，路人甲只是路人甲，就像偶尔划过夜空的流星，不会一直停留在你的生命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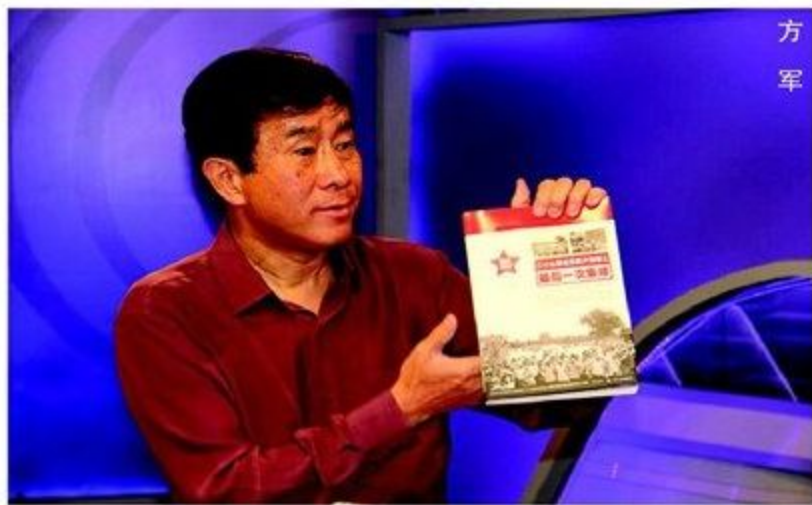
但是，即使微弱如流星，也会有它的轨迹，也会在夜深人静时，借着划过夜空的那一秒钟，发出属于它自己的声音，希望被有心的人听到。我想，路人甲也是一样，在默默坚持了那么久之后，终于遇到了那个叫尔冬升的人。

这一次，希望有更多人听见流星的声音，哪怕只有一秒。

（江一涵摘自新浪网，东方IC供图）



周星驰与梁朝伟



方军

记录抗战历史的苦行僧

◎卓成华

20余年间，他苦心孤诣，采访与抗战有关的老人，抢救那段正慢慢被国人遗忘的历史。

鬼子兵下跪谢罪

1984年，当了6年铁道兵的方军从部队转业，自学过日语的他被分在日本《读卖新闻》北京分社做助理翻译。一天，一个日本驻京记者的父亲外出走失，方军帮着去找。老头儿被找到时，正孤身伫立在夕阳下，愣愣地望着前门楼子，喃喃自语：“几十年前列队经过这里就被惊住了，几十年后再来看，仍然是那样雄伟。”原来，老人曾服役于侵华日军第59师团。方军试探着问：“对当年的侵略战争，你有什么感想？”老头儿沉默半晌，长叹一声：“噩梦啊，心里一直在忏悔。”

其他侵华老鬼子兵也这样想吗？在战后漫长的岁月里，他们的内心深处究竟处于怎样一种状态？

1991年，方军赴日留学。在一家工厂打工期间，他认识了一个叫小林勇的老鬼子兵。在小

林勇的介绍下，方军又认识了一些侵华日军老兵。经历6年的艰难曲折，他先后采访了20多个侵华日军老兵。

1997年12月，方军的《我认识的鬼子兵》出版，成为当年十大畅销书之一，在中国和日本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采访这些家国仇人，方军说自己没有想象中那么满腔仇恨。在他眼里，这些老鬼子兵只是普通的日本老人，完全看不出当年的凶残，有的现在竟以乞讨为生，还让方军生出些许怜悯。

有人看了这本书后，说方军是为鬼子兵说话，把他们写得太好了。方军却不这样认为，他说：“我不是来给鬼子兵定罪、判罪的，我是要借他们的言谈、日记、战争期间的照片、从中国劫掠去的文物等，向世人揭示他们今天的内心世界。若这些侵华日军士兵将过去的罪行带进坟墓而不忏悔的话，他们的子女、他们的国家就不会认识到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恶以及他们给中国人民带来的伤害。”

《我认识的鬼子兵》出版

后，不少侵华日军老兵给方军写信，表示忏悔之意。“战后回国，我的眼前总是浮现出中国老百姓被我们杀害的影像，好几次我从噩梦中惊醒。几十年来，我一直生活在罪恶感中。有生之年，我希望能重新踏上中国国土，向中国人民忏悔、认罪……”在众多的老鬼子兵中，本多立太郎和方军通信时间长达8年，信件达200多封。

在方军的协助下，本多立太郎于2005年5月19日重新踏上了中国卢沟桥，他神情凝重，默默地望了一下四周，而后缓缓屈膝，跪在冰冷而坚硬的桥面上，深深地低下头，真诚地向中国人民忏悔……当日，本多立太郎忏悔的照片通过新华社传遍了全国各大媒体。当时，正值日本右翼势力无视历史和中国人民的感受，一而再、再而三地参拜靖国神社，日本侵华老兵在中国下跪认罪，无疑给了日本右翼势力一记响亮的耳光。

含泪掩埋被遗忘的英雄

“抗战开始时，日本人狂妄

地说要在3个月内灭亡中国，结果光是淞沪会战就打了3个月。”方军开始搜集这方面的资料。

方军了解到，抗战期间，中国军队与日军展开了22次大型会战、1117次中型战役、38931次小型战斗。随着材料越积越多，方军感慨道：“国军打的那些大仗、恶仗，一打就是几个月，一死就是几万人、几十万人。当时国民党陆军伤亡3211419人、空军阵亡4321人，其中上将21名、中将73名、少将167名。无论八路军、新四军还是国军将士，都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作战，他们都是我们民族的英雄。”

方军萌发了为抗战英雄树碑立传，以填补那段历史空白的想法。1998年，方军收到一封来自陕西的信件，信中说：“方作家，我叫仵德厚，是一个经历过卢沟桥事变、台儿庄战役、武汉战役的国民党少将师长。在台儿庄战役中，我是敢死队的队长。读了你写的《我认识的鬼子兵》，想邀请你来我家聊聊抗战的事。”

方军欣然接受邀请，来到陕西泾阳仵德厚家，与他同吃同住两个星期。他跟仵德厚一起下地

锄草，一起种菜，一起放羊，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老人直言不讳地告诉方军：“抗战胜利后，我给蒋介石卖命，最后当了俘虏被改造。这么多年来，从来没有作家和记者采访过我，我也不敢说以前的经历，就这样悄悄地活着。几十年过去了，难道我要把那些出生入死的经历带进黄土吗？我真的很不甘心。”方军临走时，老人站在村头一直流着泪水，目送他消失在尽头……至今，方军还记得：那些天刚好是陕西的雨季，仵德厚睡的床左边放了一个盆，右边也放了一个盆。他儿子上房顶给漏水的地方铺上一些泥，漏在盆里的雨水就成了泥水。老人过得这样孤独和艰难，让人心酸。

回到北京，方军发表了自己的采访稿。很快，当地政府给仵德厚免费安装了一部电话，社会各界人士纷纷与老人取得联系。有采访的、有捐款的、有建碑的……老人多次打来电话感谢方军：“我忘不了你的恩情。”他说的“恩情”不是有了新房，不是有了电话，而是终于有人能记录那段已被人遗忘的历史。

去四川安岳县高升乡云光村采访94岁的老兵王振庸，对方军的触动最大。抗战前，王振庸家是大地主。1937年，全民抗战的布告贴到王振庸家门口，这位四川大学中文系毕业的高才生毅然参军上了前线。

2010年，方军去采访

时，王振庸住在一间破旧的小房子里，衣衫褴褛，却高兴地拿出一枚民间自制的抗战纪念章给方军看，还别在身上让方军拍照。不到两个星期，方军将发表的文章寄给王振庸。老人的家人后来告诉方军，王振庸拿着报纸满村走，说北京的作家写他了。

说起后来发生的事，方军满眼全是泪花。他说：“这可能是王振庸参加抗战后头一次有人在媒体上说他的事迹。没过几天，他就拿着我采写的那篇文章谢世了，脸上还带着微笑。”

后来，方军到卢沟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工作，接触抗战老兵的机会就更多了。

一天，纪念馆外闹嚷嚷的，原来大家在围观一位衣衫褴褛的老人。“我叫杨云峰，是29军大刀队的，我1933年在喜峰口、1937年在卢沟桥和日本鬼子拼杀过……”老人见大家不信他的话，便以手中的打狗棍充大刀，当场拉开架势，将一套29军大刀实战操练得虎虎生风，引来阵阵叫好声。

方军将老人带到附近一个餐馆，点了菜，要了酒。几杯酒下肚，老人有了醉意，恍惚回到夕阳残照、烽烟滚滚的战场。“当年，就在卢沟桥，我们29军的兄弟抡起大刀冲进鬼子的队伍，一刀一个，杀得鬼子哭爹叫娘，痛快啊！可我们人太少，鬼子人多，后来，我的兄弟们一个个倒下了，有的肚子被扎了好几个窟窿，有的满脸是血，死不瞑目，惨啊……”老人眼圈红红的，一抹眼泪，端起酒杯一饮而尽，“十几年前，抗战纪念馆成立，我把当年在卢沟桥杀过鬼子的一把大刀捐出去了。我就是想告诉



本多立太郎在卢沟桥下跪，为他当年的行为谢罪

后人，我和那些死去的兄弟曾在卢沟桥上杀过鬼子！”

杨云峰老人的一席话，让曾是军人的方军热血沸腾、感佩不已。为此，他专程前往老人的家乡河南舞阳采访，这才知道老人如今孤身一人，没有亲人，也没有经济来源，竟然靠乞讨为生。从那以后，方军每年都要去看望老人几次，去的时候带上一些吃的和穿的，离开时塞给老人一些钱。

2005年，在孤苦穷困之中，老人的生命走到了尽头。方军闻讯赶去，老人留着最后一口气，似乎在等他：“方作家，能不能帮我一个忙？我死后，希望能埋在卢沟桥……”方军噙着泪，使劲点了点头。

回到北京，方军遵从老人的遗愿，在一个阴云密布的夜晚，拿着铁锹和纸钱，抱着装有老人骨灰的黑色陶罐，悄悄地把这个29军老兵、被遗忘的抗日英雄的骨灰，埋在了他魂牵梦萦的卢沟桥畔。

记录抗战历史的苦行僧

老八路、新四军、国民党抗战将士、侵华日本老兵、被强掳的劳工……方军将这些与抗战有关的人称作亲历抗战的“最后一批人”。十几年来，方军的足迹遍布国内和周边国家，自费采访了500多位抗战老兵：“那些战争亲历者如今都垂垂老矣。我要做的，就是只争朝夕，尽快采访他们，把他们的经历记录下来，让大家了解抗战老兵当年的真实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

2005年，为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方军出版了抗战纪实

文学《最后一批人》。他在此书的编后记中这样写道：“《最后一批人》不属于作者，而是属于所有亲历日本侵华战争的人和所有铭记这段历史的中国人。”方军告诉记者：“采访老兵的意义不仅在于留下口述史，为历史留下证言，更在于汲取经验教训。我统计过，国军抗战将士的直系、旁系亲属有2000万人，像导演张艺谋、陈凯歌，地产商潘石屹等人，都是国军抗战将士的



1996年，方军在日本采访侵华日本老兵

后代。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社会民众认识到，只有善待这些老兵，才能在未来的反侵略战争中鼓舞军队的士气。”

至今，方军已出版了9本与抗战有关的书，除了《我认识的鬼子兵》，其他几本书，他不要一分钱稿费。每当新书出版，他就让出版社将稿费折算成书给他，然后他再一本一本寄给他采访过的老兵。

十几年来，方军一直住在从朋友那儿借来的房子里。2002年，为了能安心采访写作，他从单位办理了“内退”。所幸，他之前曾用在日本打工的钱和《我认识的鬼子兵》一书的稿费，在北京买了一套130平方米的房子，每月能收几千元的房租。为

节省开支，他自己做饭，把有限的钱省下来用于采访。老鬼子兵来忏悔，就住在他家里，早上他还得下楼给他们买包子吃。采访国内那些贫困的抗战老兵时，他常常忍不住塞一些钱给他们。

其实，方军的努力是起了作用的。近些年来，抗战老兵开始受到关注，“关爱抗战老兵”“我们爱老兵”和“无冕爱心网”等民间组织相继出现，一群群志愿者走近这些抗战老兵，和他们一起回忆当年困苦与激扬的岁月。

2007年7月7日，“七七事变”70周年时，方军把全国能找到的29军9名老兵一一请到北京，在70年前抗击日寇的卢沟桥上，完成了人生最后一次集结。如血的残阳中，当这些浑身布满伤疤的老兵列队报数，用颤巍巍的手敬出最后的军礼，以此缅怀阵亡的战友时，方军却背转身，偷偷地哭了。

让方军倍感欣慰的是，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决定：将每年的9月3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12月13日确定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2014年12月13日，方军虽未能前往南京参加首个国家公祭日仪式，但他一直守候在电视机前。听到习近平总书记给予日本右翼势力铿锵有力的回击时，方军心潮澎湃、热泪盈眶，他知道，那段任由列强欺凌的屈辱历史将一去不复返了。

（水云间摘自《家庭》2015年第14期）



今天清晨起来，阳光柔和，微风拂面。你顺着人行道，往学校或公司的方向走，忽然看见前面一位老太太摔倒。这时你毫不犹豫地趋前扶她起来，还问她受伤没有。

你为什么这么做？这个问题值得想一想，不要轻易回答“因为我觉得应该”，或者“因为我高兴”。

前几天的一个清晨，天色昏暗，风强雨骤，你在同一条人行道上也瞥见有人摔倒，却自顾撑着伞走过去了。为什么同样是你，却有这两种相反的待人态度？

难道是天气影响你的心情，心情在决定你的行为？仔细反省一下，似乎不是如此单纯。人的任何行为，背后都有一个信念作为预设。譬如，当我帮助别人时，我相信：人与人之间应该互相扶持，人们形成一个大家庭，人生是有意义的，我帮人，别人也会在我需要帮助时伸出援手；反之，当我拒绝帮助别人时，我心中相信：人与人各自孤立，人类并无相互关怀，人生难免一死，我也无法逃避命运的摆布，还是少管些闲事儿吧。

问题是，你有时乐于助人，有时又拒绝助人，难道是在心中同时存在两套相反的信念？如果是的话，你又如何认定自己是“一个人”呢？你怎能期望别人了解你？

甚至，你了解自己吗？

如果你对这些问题觉得好奇，想要进一步探索答案，那么你就走上哲学之途了。哲学是用比较系统的方式去思考人生的现象，然后为人生的种种抉择提供指引。找到自己心中究竟潜藏着哪些互不兼容的信念，进而予以

生活就是哲学

●傅佩荣

疏导、整理、融合，使其显示同一立场，这种“化隐为显”的工作，是哲学上关键的一步。哲学之有益于人生，也由此开始。这是任何人都可以做得到的。

确立自己心中的基本信念之后，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就可以免除许多不必要的困惑、彷徨、挣扎、挫折。天气不能再影响我们，因为我们心中自有温暖的阳光；环境不能再干扰我们，因为我们心中自有坚定的主张。我们可以开始活出真正的自我，不仅

内外如一、表里一致，而且始终清楚自己正在做什么，以及为什么这么做。

由此看来，思想的功用真是伟大。人可以凭借思想，突破有限的时间与空间，掌握自己内心的真我，亦不受气候、环境、人群所拘束的自我。这个自我，既有清楚的信念，又有明确的方向，因此一颦一笑、一举手一投足、一言一行，都是非常真诚、非常踏实的。不仅如此，思想还能引领我们树立风范，见贤思齐，使我们在面临重大抉择时，会去想一想：若换了是孔子，是耶稣，是苏格拉底，是佛陀，或是其他圣贤，处在我的情况时，又将如何决定行止？

如此念头一转，平平凡凡的人生就可能展现壮阔的波澜，高潮迭起。人生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值得珍惜，因为其中充满了新的挑战，等着你以新的精神去响应，从而开拓新的人生境界。

有人说：“生活就是文化，生活就是教育。”我们也可以说：“生活就是哲学——不过还须加上一个小小的习惯，即思考。”孟子肯定人的尊严，声称“人人有贵于己者，弗思耳矣”。只要养成思考

的习惯，生活的质量自然会随之提高，生命的内涵也将更为充实。哲学的确是我们品味人生的开始。

（郭旺启摘自《新华日报》，喻梁图）



维 修

电脑坏了，我拿去维修。维修师傅检查后说：“主板有问题。”我说：“这我知道，难道创业板就没有问题？”师傅紧紧地握住我的手：“同志，可把你等来了，你是哪部分的？”我噙着泪花告诉他：“4500 山腰部队，你呢？”师傅绝望地说：“5100 山头先遣队……”

差 别

我过生日，老婆给我买了一瓶女士香水，当然，香水被她自己拿去享用了。老婆过生日，我给她买了个我心仪已久的剃须刀。两天后，岳父多了个新剃须刀。

结婚是什么感受

儿子问父亲：“结婚是什么感受？”父亲说：“就是把你手机里所有的歌曲都删掉，只留下最喜欢的一首，然后无限循环，由喜欢到厌倦，再到习惯。”

蜜月旅行

丈夫开车和妻子去蜜月旅行，结果半路上车子突然熄火，丈夫修了半天，车子还是不动。

看丈夫满头大汗，妻子安慰他说：“前面不远的地方有家汽车旅馆，我们先去那里住一晚，明天早上起来，车子就会自己好的，不用担心。”

丈夫说：“那是结婚之前的事，这一次车子是真坏掉了！”

换 位

老婆不在家，我躺在老婆平时睡觉的位置上，终于明白她死活不肯跟我换位置睡的原因了



——Wi-Fi 信号比我那边好太多了！

放过我吧

在外地工作特别想家，有天晚上我喝多了，感觉特别想老妈，就打电话过去：“妈，下辈子我还做你的儿子！”电话那头老妈静了好久，估计也是感动得不行。好一会儿，听老妈幽幽地说了一句：“下辈子，你就放过我吧！”

妈妈的直觉

弟弟带了一群朋友回家吃饭，吃到一半，他到厨房神秘地对正在做饭的妈妈说道：“这里面有一个是你未来的儿媳妇。”妈妈头都没抬，说：“是穿白色裙子的那个吧。”弟弟惊讶地说：“妈，您真神了，怎么看出来的？”妈妈淡淡地说：“因为这些人里面我最烦的就是她。”

叮 咚

新到一家公司工作，我总听到同事笑着叫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叮咚”“叮咚”，觉得很有意思，今天看见她，我也叫了两声“叮咚，叮咚”，而且声音很欢

快。她愣了一下，然后笑着离开了。旁边的同事都傻眼了，然后告诉我：“这是公司的董事长，姓丁。”

相 亲

在妈妈的逼迫下和她同学的儿子相亲。到饭店一看，感觉显老又不帅，于是我立马点了根烟：“我这个人什么都好，就一点不好，喜欢和各种男的出去约。”然后抽着烟看着他，说“我们年轻人的事你别和我妈说，我当你是朋友。”这时一个帅气的小伙子从洗手间走过来，惊愕地问：“爸，这就是和我相亲的？”

散 步

昨天晚饭后陪老妈散步，看到另一对母子。老妈凑过来说：“你看那个妈妈，好像也在遛她们家的单身狗。”

叹 气

今天吃完饭，老妈看了我和我弟很久，突然叹气说：“唉，二十多年前，我千辛万苦地为国家解决了一个光棍，没想到现在又制造出来两个。”

晕 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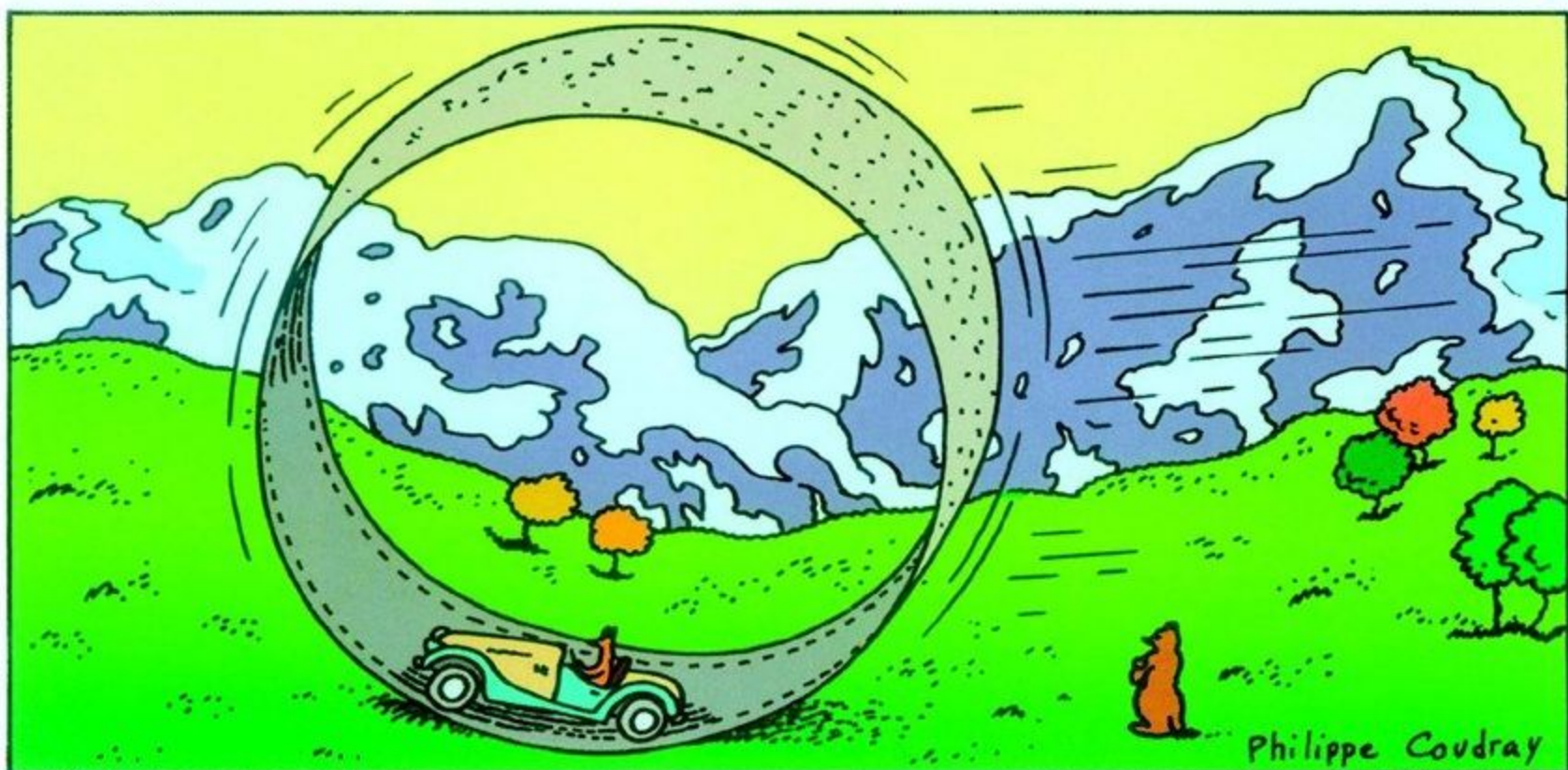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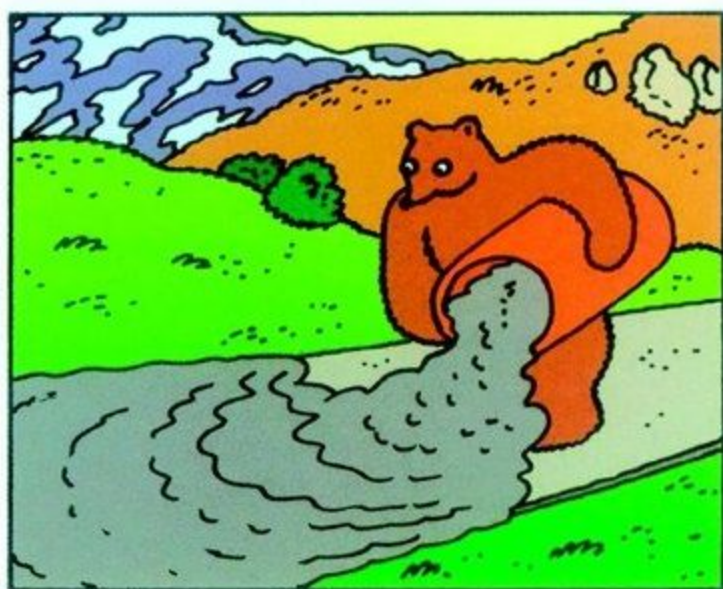
今天陪女友坐公交车，女朋友晕车趴在我怀里。我看到旁边有一个老头没多大岁数，就壮着胆子说了句：“大叔，我老婆怀孕了，您能站一会儿吗？我们马上就下车了。”大叔很爽快地答应了，这时，我女友突然喊了句：“爸……”大叔当时脸都绿了！

（汪杰、张建中、黄玉、周继红等摘）



山路乾坤

● [法] 菲利普·柯德雷



Philippe Coudray

(摘自新世纪出版社《大笨熊巴纳比——还要加把劲》一书)



台湾老兵的 两个故乡

● 蒋一谈

那个冬夜，我观看了赖声川导演的话剧《宝岛一村》。在观看的过程中，我流了5次泪。之所以深有感触，是因为这部话剧讲述了台湾老兵的故事，而我的爷爷在1949年去了台湾，1999年在台湾去世。他在台湾生活了50年，期间没有回过一次大陆。他本来是有机会回来看看的，后来他放弃了，给我们寄来了一封信说明原因。这封信是我们家里的宝贝，父亲把它放在柜子的最底层。从剧院回到家，已是深夜，但我没有丝毫睡意。我取出这封信，在心里默念着：



那一年的夏天，我离开大陆，坐船来到台湾。我心里并不知道，那一次的离开，竟带来这么多的辛苦。早知道是这样，我有可能做个逃兵，或者找个地方躲起来。事情已经发生，一切已经成为过去，说一些假设的话无非为了寻求安慰。身为军人，我几乎没有选择的机会，国家在打仗，百姓颠沛流离，国运决定着家运。

来到台湾后，我们这些老兵，心里曾有幻想，以为过不了多久，我们会重新踏上故乡的土地。我们连队的厨师，是无锡人，背着二胡来到台湾，时常坐在那儿拉曲子，曲调好像从没有变过。他告诉我们，这首曲子是《二泉映月》，是他的同乡瞎子阿炳创作的，他见过阿炳，还给他买过一瓶酒。

《二泉映月》是思乡曲，曲子里有我们思念的人。这首曲子，听得人泪眼婆娑。我们看着月亮，想象着我们的亲人也在看着月亮，这样的时刻和氛围，让我们感觉到台湾距离家乡只隔着一个海峡，并不太遥远——但这是一一次又一次的幻觉，清醒之后人会更加颓废，也不会再轻易幻想什么了。

后来，二胡的琴弦，开始变得嘶嘶啦啦。一天深夜，这位无锡老兵喝醉后把二胡摔断扔进了丛林，他说他对这首曲子麻木了，这首曲子已经不能让他心怀乡情了。我其实也麻木了，甚至绝望了，我们心照不宣，知道此生很可能回不去了。

再后来，我们各自在台湾结了婚，有了新的家庭、新的子孙，我让自己尽可能忘掉自己——是忘掉我自己，而不是你们

◎何慧慧

胡雪岩的考题



晚清著名商人胡雪岩不仅善于经商，在识人方面也独有一套。早年，胡雪岩打算派人去湖州做主管，看中一个名叫陈世龙的伙计。但有人推荐一个名叫李郁的主管，说他做过多笔买卖，从未失手。胡雪岩拿不定主意，便决定出题考查。

一天，胡雪岩把两个锁上的柜子分别放在两间房内，然后吩咐陈世龙和李郁各自打开一个，先打开者获胜。他俩立刻开始绞尽脑汁想办法。李郁很快打开了柜子，陈世龙则花了很长时间。其他人都认定李郁获胜，胡雪岩想了想却问：“柜子里有什么东西？”李郁抢先答道：“里面全是铜钱。”胡雪岩又看向陈世龙。陈世龙尴

尬地摸着头，回答：“我只顾埋头开锁，没有看到柜子里装着什么。”胡雪岩笑了，拍拍陈世龙的肩说：“你才是我真正需要的人，我放心把湖州的生意交给你了。”

面对众人的疑惑，胡雪岩解释道：“我只叫他俩去开锁，没让他俩看里面。陈世龙照此去做，没有逾越界线，这便是我选定他的理由。”胡雪岩没有选错人，陈世龙果然把湖州的生意打理得井井有条。

在胡雪岩看来，做人要懂得守规矩、讲分寸，特别是对他人所托之事要毫无差错地完成，如此才值得信任。

（梅之傲摘自《环球人物》2015年第18期）

——设法去爱他们，爱上新的生活。我觉得我尽力做到了，过去的那个我并没有越来越远，只是变了模样。这几年，我的那些战友都老了，他们中的很多人去过大陆，有的人亲口对我说过，希望死后能叶落归根。可是我没有这样的想法。

我现在80多岁了，身体看上去还行，但随时都有可能被老天爷带走。我在战场上杀过人，却没有在战争中死去，所以也没有为多活这么多年而感到了不起。我曾想过回大陆看看你们，但我非常担心，回到家乡，见到你们，老天爷会让我一病不起，会让我死在大陆，而我将再也无法回到台湾，再也见不到我在台湾的子孙了。我也想过，如果有一天我回到大陆，会不会想听《二泉映月》呢？可能会吧，或许到那个时候，《二泉映月》

里的泉水和月亮，会在我心里变成台湾的泉水和月亮，我会深深思念那座岛屿——我的第二故乡。我已经饱受过一次别离的滋味，那次别离，让我整整唏嘘哀叹了50年，所以我不想再经历一次别离，一次已经足够。我非常害怕老天爷惩罚我。

人活一世，贵在有自知之明。我不想再经历一次别离，而台湾是我的叶落归根处，这是我的遗愿，我也请求你们别来台湾看我，再次见面意味着再次别离，何必呢？但愿我死后，灵魂还有力气漂过不算宽阔的台湾海峡。我知道，《二泉映月》里的二泉，是人的双眼，泪眼映照月光，月亮垂怜着中国人，默默留下无奈的眼泪。请原谅我。

我的眼泪默默流了下来。我的奶奶，在我爷爷去世两年后，离开了我们，她“守寡”几十

年，此生非常辛苦。每次从电视上看见台湾老兵回大陆探亲，她都会激动得睡不着觉，她至死都不知道爷爷寄来的这封信。我父亲这样安慰她：“我们托人去台湾找了，如果爸爸活着，他一定会回来看我们的。”我父亲原谅了我的爷爷，他没有办法不原谅，他只是深感遗憾，而这份遗憾又会伴随他终老。

我没见过我的爷爷，在我的生命里，他是缺席的，其实在他的生命里，我也是缺席的。“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一曲《二泉映月》又能慰藉多少人的情感？我不知道……我把信放在桌上，走到窗前，窗外有月，可是灰蒙蒙的，一阵寒风在胡同里卷起大片尘烟，月亮在瞬间完全消失了。

（余娟摘自作家出版社《庐山隐士》一书，李晨图）



别人“家”的阅兵

●韩旭阳

阅兵是一项极其隆重的军事仪式，展示军威，鼓舞士气。与我们印象中大规模、大场面的观感不同，在不少国家的阅兵式上，我们常常能看到有趣、温情的一幕，别具特色。

印度：摩托车上叠罗汉是国粹特技

在2015年年初，印度举行了盛大的“共和国日”阅兵庆典，其“保留节目”——印度边防部队表演的摩托车叠罗汉特技引发网友吐槽。实际上，每年印度的阅兵仪式都会融入传统音乐、部落舞蹈、摩托车特技表演等内容，阅兵场面轻松欢快。

同时，印度阅兵式参与兵种之杂令人惊叹。除海陆空三军、导弹部队、装甲部队，还有边防部队、新德里警察部队、铁路警察部队、男女童子军等方队，甚至国防工程技术人员也有一个方队。每一个兵种都有自己的军乐队开道，吹吹打打，着实热闹。

在印度人看来，摩托车特技不是“杂技”，而是从印度教苦

行修道的动作演化出来的一种特技表演，与瑜伽一样同为印度国粹。作为文化传统，在阅兵式上如果没有摩托车特技，就像缺了点儿什么。

据印度媒体报道，在2015年“共和国日”阅兵式上，车队表演了“和谐”“孔雀开屏”“杂耍”“并行”“莲花”“美洲虎”“BSF（印度边防部队）之树”“边境之花”等极具想象力的组合项目，相较于2014年公布的表演项目有不少创新。

车队表演所使用的摩托车为印度产的皇家恩菲尔德，排量500CC的恩菲尔德摩托车曾创下了一车承载54人的纪录。

美国：欢乐轻松范儿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开始在全球进行战略扩张，大量军队被派驻到世界各地，本土驻防的兵力越来越少，导致无法组织起足够的阅兵单位。于是，70年代之后，美国基本上没有举行过大型阅兵式。

美式阅兵秀的特点是欢乐轻松，表演性十足。走在整个阅兵队伍最前列的军乐团领队，手中拿着一根长得夸张的指挥棒。后面的徒步步兵方队虽然也整齐划一、军姿威武，但通过观礼台时只是普通的行军步伐，不走正步。

美国的爱好之一是显摆自己的高新技术。“蛇鲨”大型地对地洲际巡航导弹、“红石”地对地导弹等能载着核弹头的决战兵器，都曾经列队出现在美国民众面前。不过，杀人武器被打扮得花花绿绿，甚至运载车上还用醒目的字体标示出制造公司——根本就是军火公司的商业大秀场。

英国：延续华丽传统

英国没有法定的国庆日，但会在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女王官方诞辰日”举行华丽的阅兵仪式。

也许是对“日不落帝国”的怀念，英国阅兵的环节安排基本上还延续着维多利亚时代的华丽



印度



美国



传统。走在最前面的往往是敲打着激昂鼓点的军乐队，随后是身穿赤红色双排扣制服、戴着高高的熊皮黑帽、肩扛长枪的皇家卫队，接着是骑着高头大马、身穿锃亮胸铠的骑兵，后面紧跟着各军种单位。

最让英国人牵肠挂肚的竟然是“二战”时期的那些英雄战机。“鹞式”“飓风”“喷火”等在抵抗纳粹时立下赫赫战功的“老爷机”都被装饰一新，重新飞翔在伦敦的天空中。

俄罗斯：不忘老兵

为纪念卫国战争的胜利，过去的苏联和现今的俄罗斯每年5月9日都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盛大的阅兵式。当数目庞大的三军士兵迈着整齐的正步从广场走过，当铁甲洪流从广场缓缓驶过，当最先进的战机以遮天蔽日之势从上空呼啸而过时，那种磅礴的威严气势简直让人透不过气来。

冷战时期，西方国家总希望从阅兵式窥探苏联的军事力量，而苏联军情单位往往会借阅兵制造“烟幕弹”。1965年，苏联故意在阅兵中展示出一枚假“萨

姆-5”型导弹，美国情报人员信以为真，一时间苏联大幅提高远程核打击能力的说法传遍西方军界。实际上，苏联当时根本不具备这样的实力。

值得一提的是，每年俄罗斯都会邀请参加过卫国战争的老兵加入阅兵或者观摩队伍。这些当年在战场浴血杀敌的英雄，如今都已到垂暮之年，纵然再也无法像年轻时那样踢出标准的正步，但依然能行最标准的军礼。

法国：外交大秀场

在欧美，法国是最钟情于阅



兵的国家，路易十四时代和拿破仑当政期间就有规模宏大的阅兵式。为纪念法国大革命攻克巴士底狱，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将7月14日定为国庆节。此后，每逢国庆节，法国都要举行阅兵式，仅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中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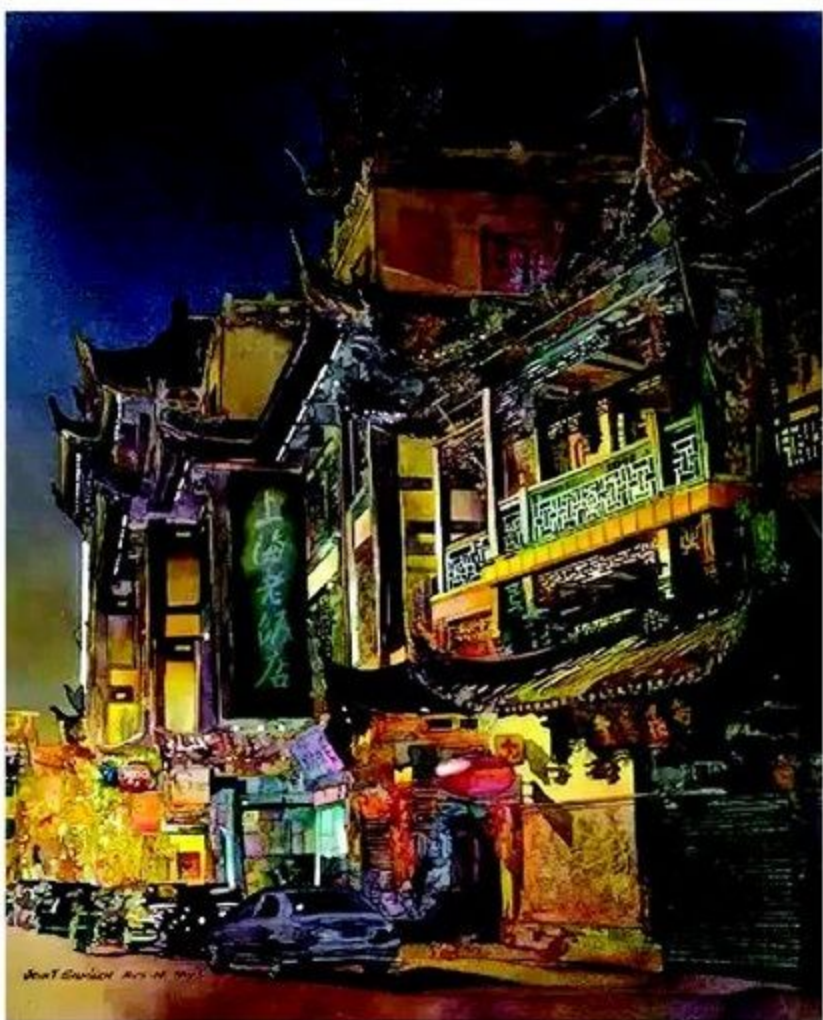
从20世纪90年代起，法国国庆阅兵开始融入外国元素，邀请国外军队参加逐渐成为惯例。

1994年，法国总统密特朗邀请德国军队参加阅兵，外界将此看成欧洲一体化和法德百年世仇实现真正和解的表现。2009年，印度最古老的马哈拉施特拉邦步兵团获邀出席法国阅兵式，体现法印两国发展战略关系的愿望。

法媒评论称，萨科齐邀请时任印度总理的辛格和印度军队参加国庆活动，就是希望向印度出口市值120亿美元的战机，同时法方正就向印度出口民用核技术进行磋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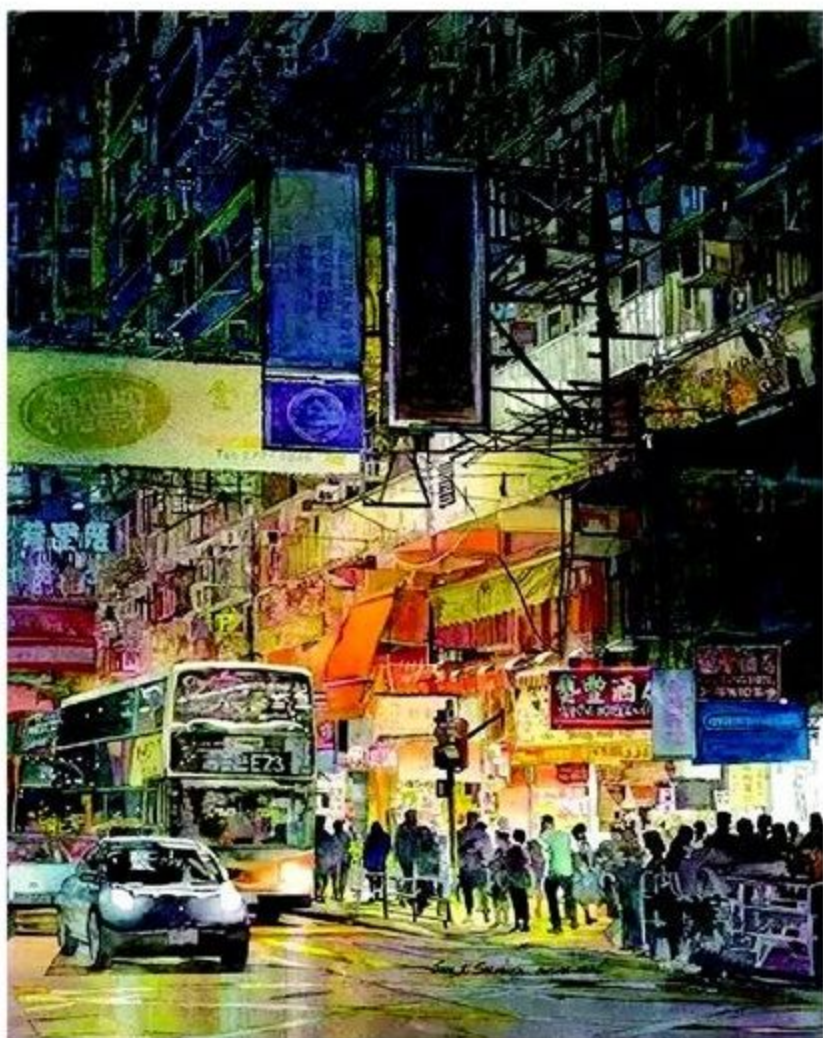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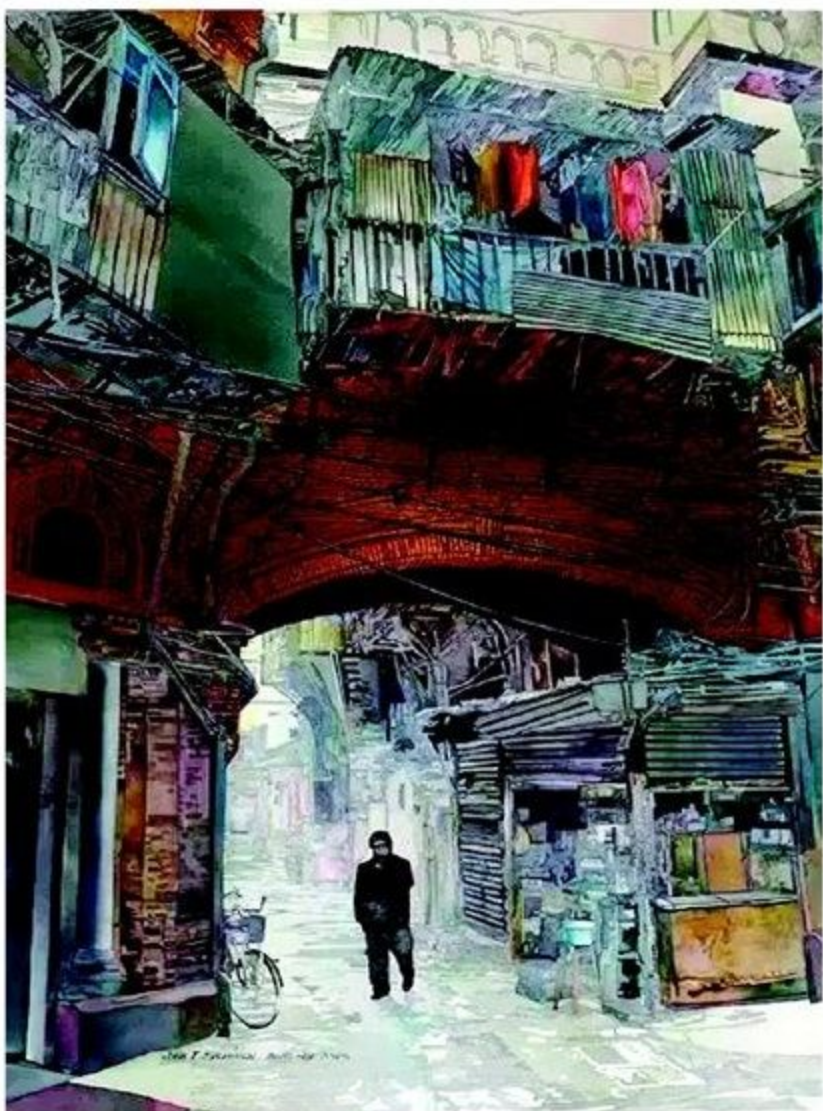
法国阅兵不以展示武器为主，主要是为增加民族自豪感，又由于加入历史与现实因素，使其成为“国际品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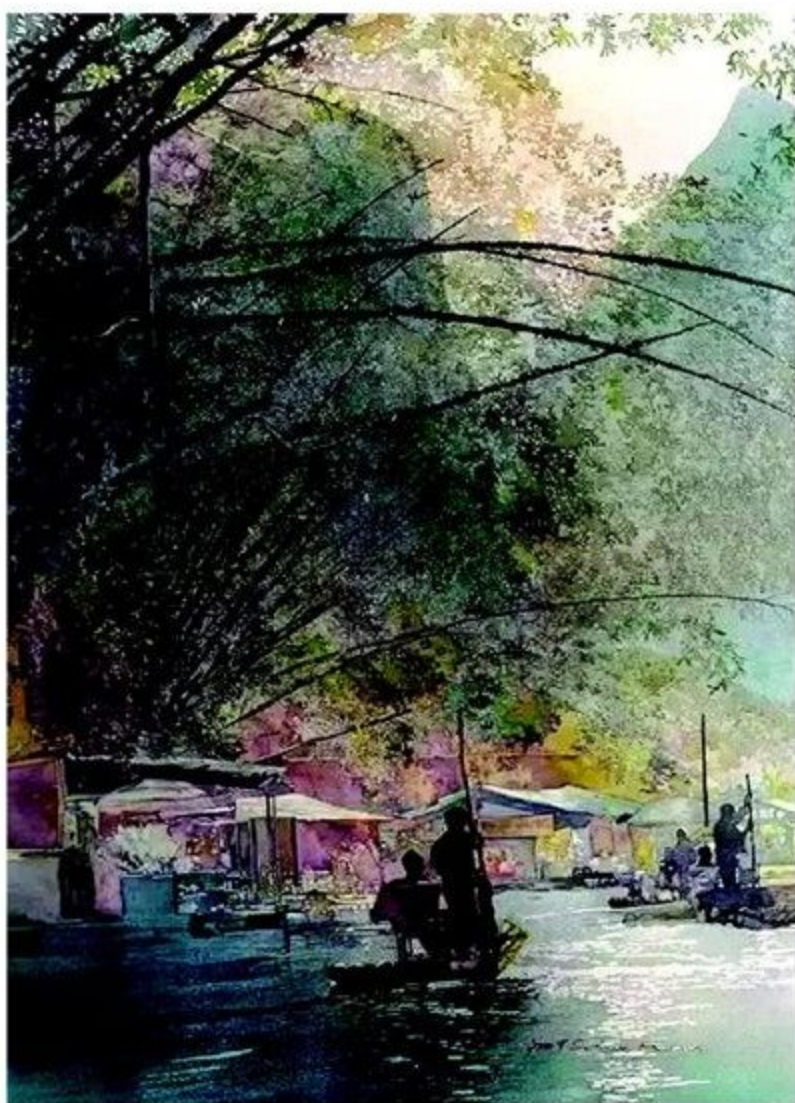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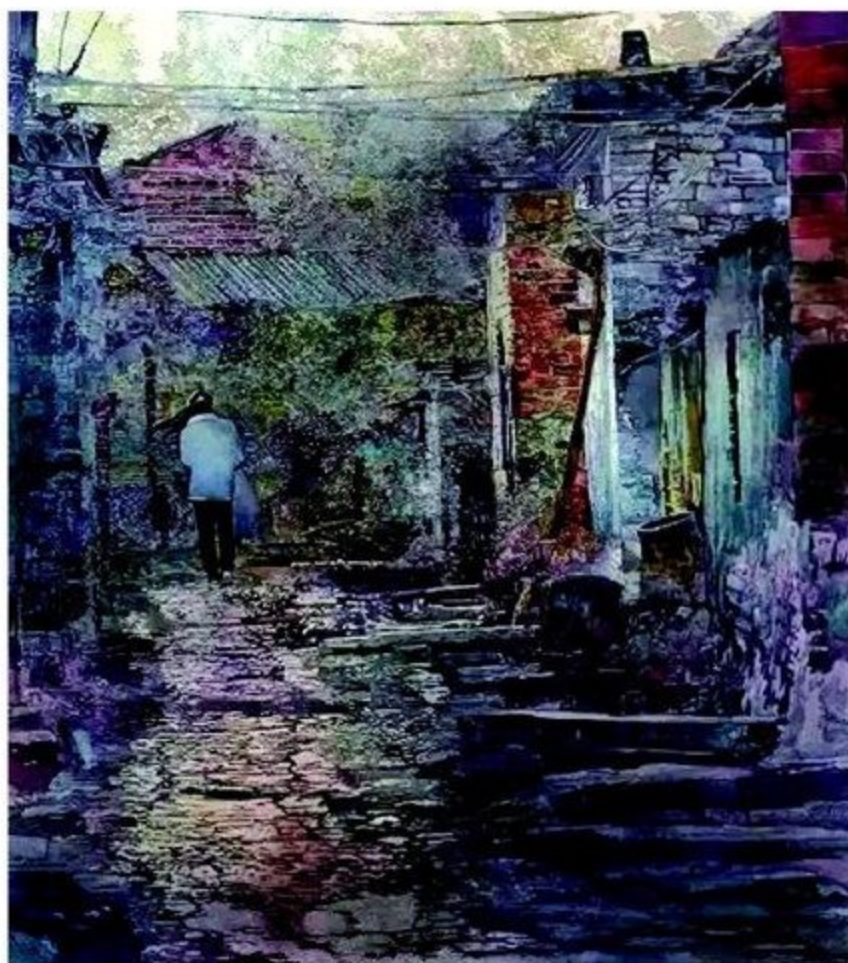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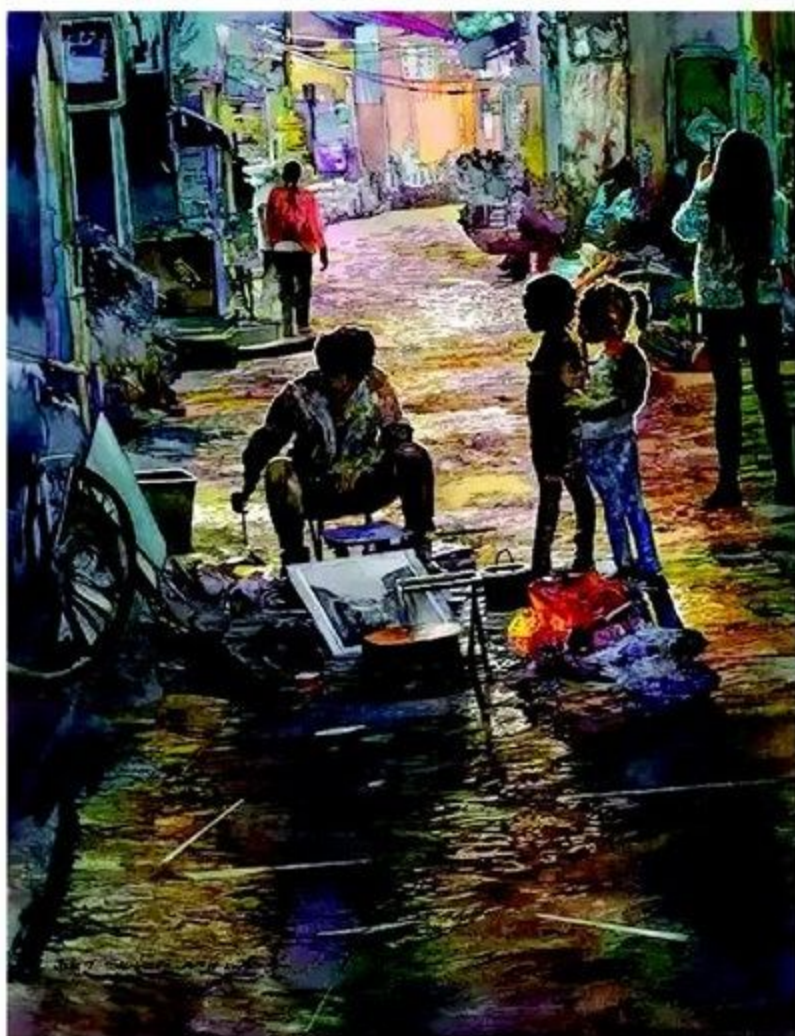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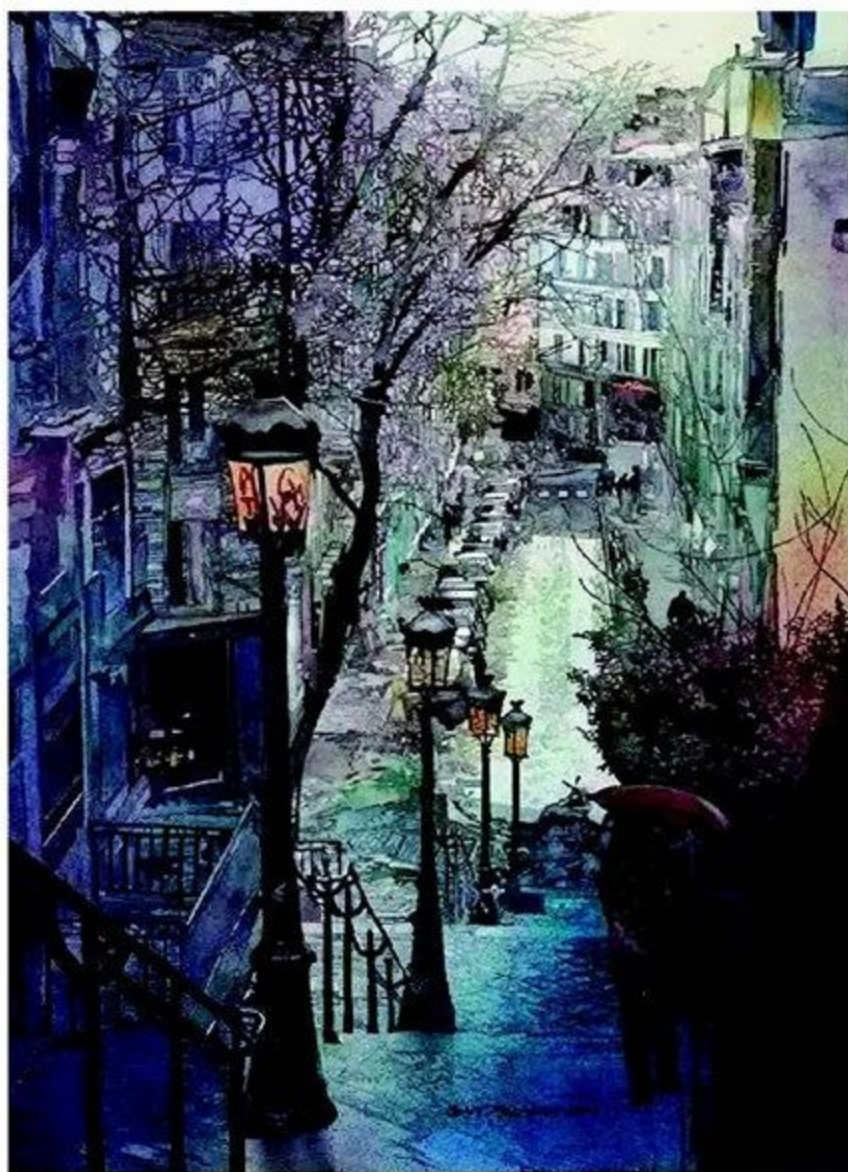
（郭旭摘自《畅谈》）



老街·小店·旧时光

来自美国明尼苏达州的 John Salminen，凭借视角独到的水彩画誉满全球艺术界。他看过许多美景，画过许多水彩画，但当他来到中国，把最普通的场景勾勒到画布上时，连他自己都被惊呆了。不是所有画家都只对高楼大厦、香车宝马的中国感兴趣。John Salminen 想表现的，是心目中那个古老、传统、深邃、神秘的中国。







我进入股市的时间是2006年7月，也就是我研究生毕业的时候。因为几个月前中国股市大盘指数跌破了1000点，我认为最佳入市时机已到，就找人借了10万块钱去炒股。

那个时候钱真好挣啊，不管买什么股票都在涨，每隔几天就能撞见一次涨停。但是我并不满足于跟着大盘涨，还想赚得更多。我开始买书来看，把什么《股票大作手回忆录》《波浪理论》《巴菲特致股东的信》等有关股票投资的“名著”都找来看了一遍。

那时有一种幻想，觉得靠炒股票赚钱很容易，以后就可以靠这个吃饭了，也就懒得去找工作。此前还打算跟几个朋友一起创业，那10万块钱既然被我用来炒股，创业的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

2007年股市到6000点的时候，我大概赚了有20万。大概在4000点的时候，我就把借来的10万块钱还给人家了，所以剩下的钱就都是纯利润。这一年的生活花费也都是从股市里出的。如果从这个时间点来看，我用了一年零三个月挣了20多万，这对一个硕士毕业才一年的人来说已经很不错了。

但是当大盘指数从6000点开始下跌的时候，我在过去一年

多挣的钱就开始一点一点往回吐了。这时候我发现，自己曾经非常得意的那些“炒股技术”，没有一种是真正有用的，买什么股票都会跌。一直回吐到3600点，亏得还剩不到10万块钱了，我终于受不了了，斩仓出

因为同一届毕业的同学，都已经工作了快两年了。一般比较好的大公司大企业会给应届毕业生提供一些很好的岗位，一旦不是应届生，就会对工作经验有要求。我既不是应届毕业生，又没有足够的工作经验。我连续给一些大企业投了简历，却没有收到一个回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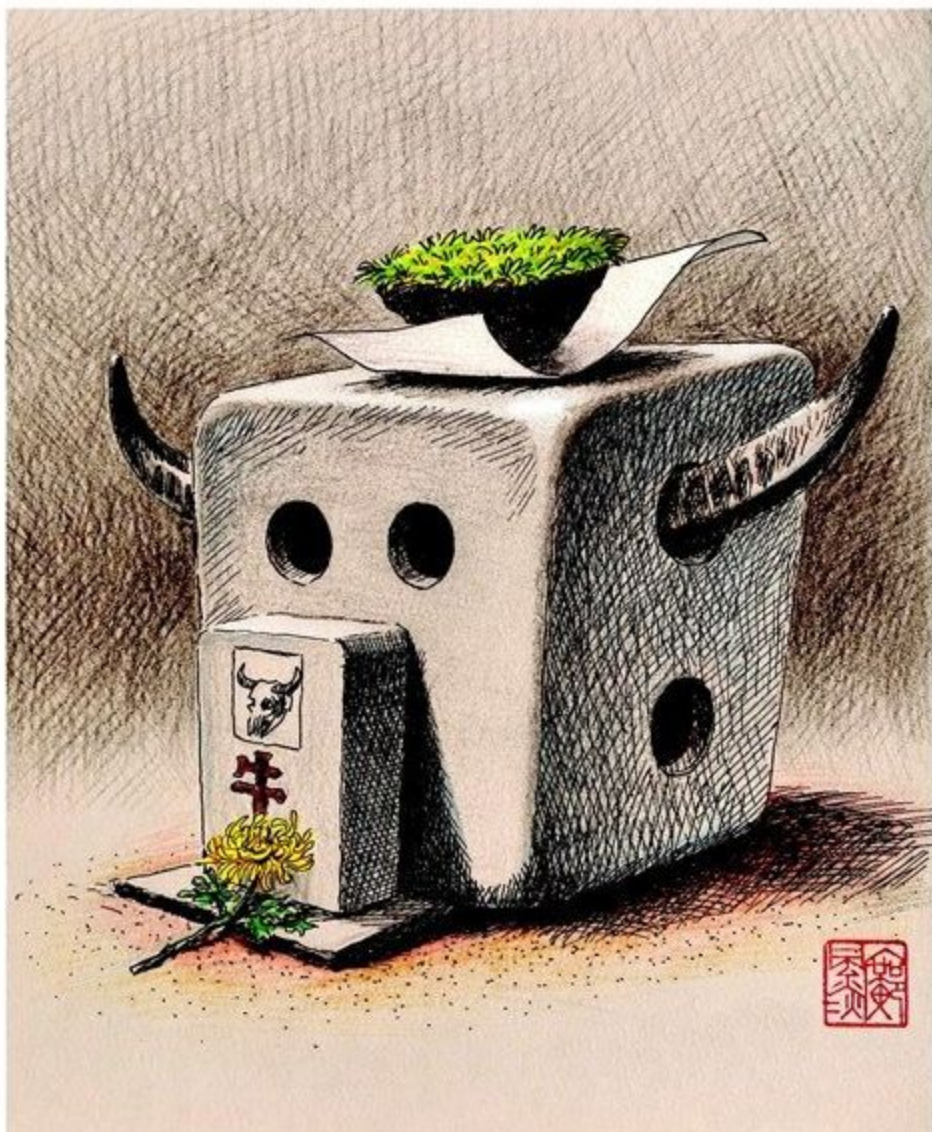
没有办法的时候，我才想起来重新回学校去读书。还好我考试的功力还是有的，经过几个月的准备，我终于考上了博士。后来就一帆风顺起来了，我去了剑桥、哈佛、麦肯锡，出版了《中国崛起的经济学分析》……

那一段炒股经历，让我刻骨铭心。我知道了什么叫作“珍惜生命，远离股市”。

人的一生，从20岁到30岁这一段时光——如果你不是“富二代”或者“官二代”，是比较艰难的。包括像任正非、柳传志、马云、刘强东这些白手起家的大牛人，他们在这个年龄的生活也是比较

黯淡的。因为这一段时期，从学校走进了社会，要自食其力，但是资历、经验、关系网络等资本都不具备，付出和收获不成正比。

这段时期应该是一个半工作、半学习的时期。即使去机关、企业工作，也带有学习的性



珍惜生命，远离股市

● 李晓鹏

局，把剩下的钱全部转回到银行卡上，从此退出股市。这个时候算下来，在接近两年的时间里，我实际上只挣了大约10万块钱。即使纯粹算一个收入账，也变得非常不划算了。

更要命的是，这个时候我再去找工作，已经变得非常困难。



质。所以机关或企业并不会按照你的付出程度支付“足够”的报酬，因为你的工作能力和其他各方面还很不成熟，他们同时也在为你提供一一个学习进步的环境。

如果不考虑家庭因素，同龄人之间在20岁到30岁这段时期并不会拉开很大的差距。没有飞来横财的话，大家都过着一样平凡的日子，默默地为自己的理想奋斗着、努力着。但是过了30岁以后，差距就会拉大了，成功的人可能非常成功，变身为社会名流；而没有成功的人可能会原地踏步，还是原来那样的地位或收入。

正因为如此，年轻人如果把时间放到炒股上，每天被行情的波动折腾得对本职工作心不在焉，最大的损失不是钱，而是耽误自己能力素质的提升。

股市上挣的钱能够立竿见影地看到：行情最火爆的时候，一两个月就能翻一倍，是很刺激的。但是时间长了你会发现，炒股根本不挣钱，挣到的还会赔回去，得不偿失。在工作学习上所花的时间，短期内很难挣到什么钱，你工作努力一点还是敷衍一点，上班时间是有一有空就看看与本职工作相关的书籍，还是偷偷摸摸地打开电脑看股票，每个月都是那么一点工资收入，并不会增加。但是，从长远来看，平时一点一滴的积累，最终会在关键时刻让你脱颖而出，并因此而受益终身。这种回报，比股票市场上能够挣到的钱，不知道要高出多少倍，可靠多少倍。

股票市场制度的设计，本来就不是让普通人赚钱的。一个人要想稳定地获得某种形式的收入，都要对应一种这个人所掌握

的资源。他要么掌握生产性要素进行创造获利，要么掌握破坏性要素进行破坏获利。

比如，你精通计算机软件，那么你就可以通过编程赚到工资；如果你精通企业管理和市场营销，你就可能成为一位成功的企业家。

还有一种相反的情况，就是从别人手里掠夺财富来获得收入，这叫“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

不管是生产性还是破坏性要素，你总得占有一样。如果你一样都不占有，纯粹就是去赌钱玩，那么最后一定会得到一个平局：一会儿输钱，一会儿赢钱，最后不输不赢。

但是在真正的赌场里，输钱的总是赌徒，赚钱的总是庄家。这是因为庄家掌握了“破坏性要素”，就是可以通过操纵规则和作弊来掠夺赌徒的钱。

那么到了股市——这个不停波动的市场里，我们可以问问自己，我们掌握了什么资源可以参与股票市场的财富分配？有生产性要素吗？没有。那些能够经营企业上市的企业家才有。有破坏性要素吗？还是没有。那些操纵股市的庄家才有。那我们这些普通的年轻人，凭什么能赚到比钱存在银行吃利息更多的钱呢？相信什么波浪理论、什么趋势线，你能玩得过那些金融、数学专业毕业的研究团队吗？

把这个道理想清楚，我们就不难发现，我们去股市赚钱，最好的结果，就是不亏本，能够不被别人掠夺，挣点跟银行利息加社会最低工资标准差不多的收入就到头了。

不管是哪一种结果，我们的

时间都耽误不起。有人会听信关于“价值投资”的谎言，说我就长期投资，学习巴菲特，放在那里不动，又能挣钱又不耽误本职工作。这种想法同样是行不通的：如果你只用很少的一点钱去炒股，比如收入的10%，这点长期“价值投资”的收益其实对于你的生活没有任何影响；如果你投入大钱去炒股，股市的波动会影响你的生活，那么虽然你心里想着价值投资，但还是会变成一个赌徒，每天除了关注股市行情以外，什么事情也做不好。

在我们年轻的时候，能够掌握的那一点点资金，根本不值得我们去浪费时间“理财”。最需要“理”的“财”，是自己的知识和能力。

如果我们真的要玩股票，学习巴菲特、索罗斯，那应该做的不是拿着自己的钱去玩，而是像他们一样，学一个金融或者数学的学位，然后进入金融行业工作，争取成为基金经理，拿着别人的钱去玩，赚了拿提成，亏了也不管。

如果你不打算这么干，那么，请远离股市，最好是碰都不要去碰；如果你已经进入了股市，最好马上清仓，把所有的钱转回到银行卡里，然后专注于自己的梦想，把它一点一点变成现实。

如果你还是对股市恋恋不舍，还做着一夜暴富的美梦，那么，你生活的价值，无非就是花一些时间在电脑屏幕上观察布朗运动罢了。

（小菲摘自新浪网作者的博文，邱鹰图）



扫描二维码，分享文章



离别

◎于建嵘

每一次离开母亲，我都是难过的。这一次更是如此，甚至有些悲伤。

临行前，大姐试图与我讨论母亲百年后的一些安排。我非常不高兴，很生气地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愿意理睬她。

事实上，我知道大姐是对的。母亲已经85岁了，自3年前生了一场大病后，身体状况一直欠佳。最近一段时间，她经常大小便失禁，时常处于意识混乱的状态，甚至已经不认识身边的至亲近友。许多亲朋好友都认为是时候该考虑母亲的后事了，但我无论如何也不愿意承认这一点。我反驳的最重要的证据就是，无论我什么时候出现，她都能清晰地说：“你是我的满崽（湖南方言，指家里最小的儿子）。”

我是母亲的满崽，这是千真万确的。母亲共生育了4个孩子，除我哥哥已经病逝之外，我还有两个姐姐。在我们姐弟中

间，我与母亲一起生活的时间最长，应该有50年。

“文革”期间，我父亲被打成了土匪加当权派。母亲带着我们几个孩子被强制下放农村，又被恶人欺负而流落街头。在成为“黑人”在街头讨生活的岁月里，我与母亲从来没有分开过。“文革”后，父亲虽被平反，但已被迫害致死，因此母亲再没有被安排正式工作。她在城里打零工，供我读高中。1979年，我16岁，参加了高考。记得在得知高考分数达到了大学本科录取分数线那一天，我对母亲说过这样的话：“从今天开始，您就不要怕了。4年以后，我一定要让您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我绝对不让您在街头流浪。”应该说，我履行了自己的承诺。我大学毕业后，母亲就再没有外出打工，一直同我生活在一起。我们最初在衡阳，然后到了北京。2012年母亲突发脑溢血，生活不能自

理，先是大姐赶过来照顾她，后来她说想回老家看看，就回到了湖南永州大姐家，便再也不愿意回北京长住了。大姐说，母亲是想叶落归根了。

我知道，我一直是母亲的骄傲。当年，在我们那个小城，考上大学本科的没有几个人，左右街坊经常以我为榜样，教育自己的孩子：“瞧，你看人家的孩子，没有父亲，母亲没有文化，打零工为生，自己流浪多年，也没有正经读过小学和初中，竟然考上了大学，还是本科啊。”每当这时，母亲就会感到幸福，但她一定会谦和地说：“话不能这样说，会读书有什么用呢？”后来，我大学毕业了，母亲跟着我走南闯北，总的来说，她对生活还是满意的。如果有人在母亲面前显摆某某当了多大的官、某某发了多大的财，她就会说：“我儿子没有当官，但他会写文章，还出了好多书呢；我儿子没有发财，但我们也从来没有饿着和冻着啊。”

我也知道，我亦是母亲担忧之所在。在她平静的生活中，实际上有着深深的忧虑。她最担心我受到他人的伤害，但她从不轻易表达出来。在我的记忆中，只有少数几次，当我因坚持不加入任何党派而被告知不适合在政府机关重要岗位工作、必须调离时，母亲说：“当教师也是很好的，只是……”只是什么？母亲并没有说，但我是知道的；当我做律师办了几起为民申冤的案件，有人跪在我家门口感谢，也有人来家里闹事时，母亲说：“为老百姓打抱不平是应该的，只是……”只是什么？母亲也没有说，我也是知道的；当我写文

有一阵子，我的一位朋友忽然消失了，原来是他父亲生病了。后来他父亲的身体状况似乎有了一些好转，于是他又出现了，跟我们说了以下这个故事。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是个严肃的人，他像山一样强壮、高大，也永远和我们有一段难以跨越的距离。不过这个情况在他刚中风时，有了一些转变。

那时候我们轮流照顾他。帮他梳洗时，我开始亲密地拍拍他的额头，捏捏他的脸，偶尔也抱抱他，虽然他的目光有一点呆滞，可是你可以感觉到他很高兴，露出舒服、满足的表情。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我请他吃冰淇淋，他快乐地舔着冰淇淋，舔到一半时，竟然像小孩一样，把冰淇淋挪到我的眼

前，问我要不要吃一口。

我吃了一口冰淇淋。说真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那冰淇淋的滋味。那是我有记忆以来，不曾有过的体验。

转 变

●侯文咏



父亲的身体康复得很快。一个多月之后的一天，我仍然像往常一样地对他拍拍、捏捏、揉揉，正当我要抱他时，他突然防卫性地退缩了一下。他的眼神似乎完全从呆滞中恢复过来了，然后用我所熟悉的那种严父的口吻问我：“你在干什么？”

被他这么一问，我当场愣在那里。我记得很清楚，他是从那一刻开始恢复成原来那个严肃的父亲的。

从某个角度来说，我告诉自己，我应该很开心。可是我常常也会有种说不上来的失落感，看着他渐渐康复，竟然不知道应该高兴还是难过。

（六月的雨摘自新星出版社《明天再烦恼吧》一书，童玲图）

章批评政府，还掀翻官员的饭桌，引起社会争议时，母亲说：“做人就得明是非，就得有骨气，只是……”只是什么？母亲还是没有说，我当然更是知道的。因为知道，我对母亲也就有着深深的愧疚。有时，为消除母亲的恐惧，我也想变得中庸一些。可每当此时，我就会想起我和母亲成为“黑人”时遭受的耻辱，我就想坚持下去。只有坚持，才能有所改变，天下的母亲和孩子才不会成为“黑人”。对此，母亲应该是理解的。因为她多次说：“你受了那么多苦，又读了那么多书，比妈懂道理。只要你坚持清廉和善良，妈都支持你。”

自母亲回湖南老家休养后，我一有时间就往永州跑，差不多每一两个月就要回去一次。起初，母亲看到我来了，会很心疼

地说：“没事跑来跑去干什么？赚点钱都买机票了不说，跑一次要三四天，累不累啊？”我总会说：“妈妈在哪里，家就在哪里。我有时间不回家，您让我到什么地方去啊？”她听后，会很高兴地哈哈大笑。后来，随着病情加重，她的记忆出现了问题，明明我刚离开她回到北京，她却在电话里说：“你什么时候回来看我？我好久没有看到你了。”每听到此，我的心就会颤抖，我会自责，会恨自己分身乏术，责怪自己无力医治母亲的病痛。再后来，就是现在，她已不记得谁来看过她了。但我知道，她的内心深处一定记得我，一定在盼望我的守护。

母亲一天天老去，我的心也一天天沉重起来。我现在经常不由自主地回想同她一起经历过的苦难和欢乐。有一种观念，越来越

清晰了，那就是，母亲才是我的精神家园。这几十年的奋斗，无论多么艰辛，只要想着她，我就有了力量，有了奋斗的勇气，有了克服困难的智慧。我甚至想，如果没有她对我努力成果的分享，我的成功还有任何意义吗？这也许正是我害怕讨论与母亲离别的话题的原因吧。

自然法则是不可改变的。母亲终究要老去，无论我如何不愿意，无论我如何努力，与母亲最终离别的那一天，正在一天天逼近。我必须痛苦地面对，但我不能因此沉沦。因为，母亲曾多次教育我，天下还有许多同我们有一样经历的“黑人”，努力改变这个社会，就是为了母亲。如果我放弃了努力，下辈子还有什么资格再成为母亲的满崽？

（如夏摘自新浪网作者的微博，杜凤宝图）



一位中国妈妈因9岁儿子的英语学习问题来找我帮忙，我回答了问题，还和小孩聊了几句。后来妈妈让孩子给我写了一封感谢信，说通过这封信，让孩子向我保证要好好学英语。信是这样写的：

蔻蔻阿姨：

谢谢您在百忙之中和我谈话。您的这些话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让我受益匪浅。我一定会好好学英语，将来长大出国留学，像您一样读博士，做祖国的栋梁，为国争光。

这个孩子在和我聊天时，可以很正常地说话，很开心地笑。他说自己并不喜欢英语，爱看漫画，还和同学一起画漫画。比起感谢信，我更珍惜孩子边笑边对我说：“我那天画了个叫‘囧’的调皮鬼，它只要飞到你的裤子里，你就会放又响又臭的屁。我和同桌都笑死了。”

可孩子只要和我说到漫画，就会被他妈妈打断：“你都那么大了，看什么漫画！快把英语方面的问题问一下，学英语比看漫画有用！”

可能就是从这些不被珍视、尊重的爱好和心声开始的吧，孩子在父母面前一点点隐藏自己，不再说真实的“孩子话”，而说出让大人喜欢听的话。

上次去巴黎，在圣母院前看到很多游客在抢占最佳位置拍照留念，包括一队中国游客。一个八九岁的女孩站在这座美轮美奂的建筑前，抬头向上专注地看着什么。突然传来一个焦急的女声：“你在干吗？快过来拍照，快点！”

“妈妈，我在看顶上的雕花，那个纹路……”“看什么看，快来拍照。你要看雕花，让爸爸拍下来，你回家在电脑上想放多大看就放多大看，想看多久就看多久！”

小女孩跑过去了，她妈一把拉过她，面对着她汗淋漓举着相机的孩子爸说：“看爸爸，笑！多拍几张！”本来还是一脸不耐烦的孩子妈刹那间对着镜头笑靥如花。拍完后，她似乎忘了让孩子再去看看顶上的雕花，更别说让孩子爸拍一张建筑照片了。

之后，妈妈搂着女儿边走边不断启发她：“巴黎圣母院，咱们亲眼见了哦，可以好好写篇作文了吧？巴黎圣母院是哥特式建筑，你以后若不记得什么是哥特式建筑，就想想巴黎圣母院的样子。它还是一本名著的书名，对不对啊？这本书是谁写的啊……作文开头你怎么写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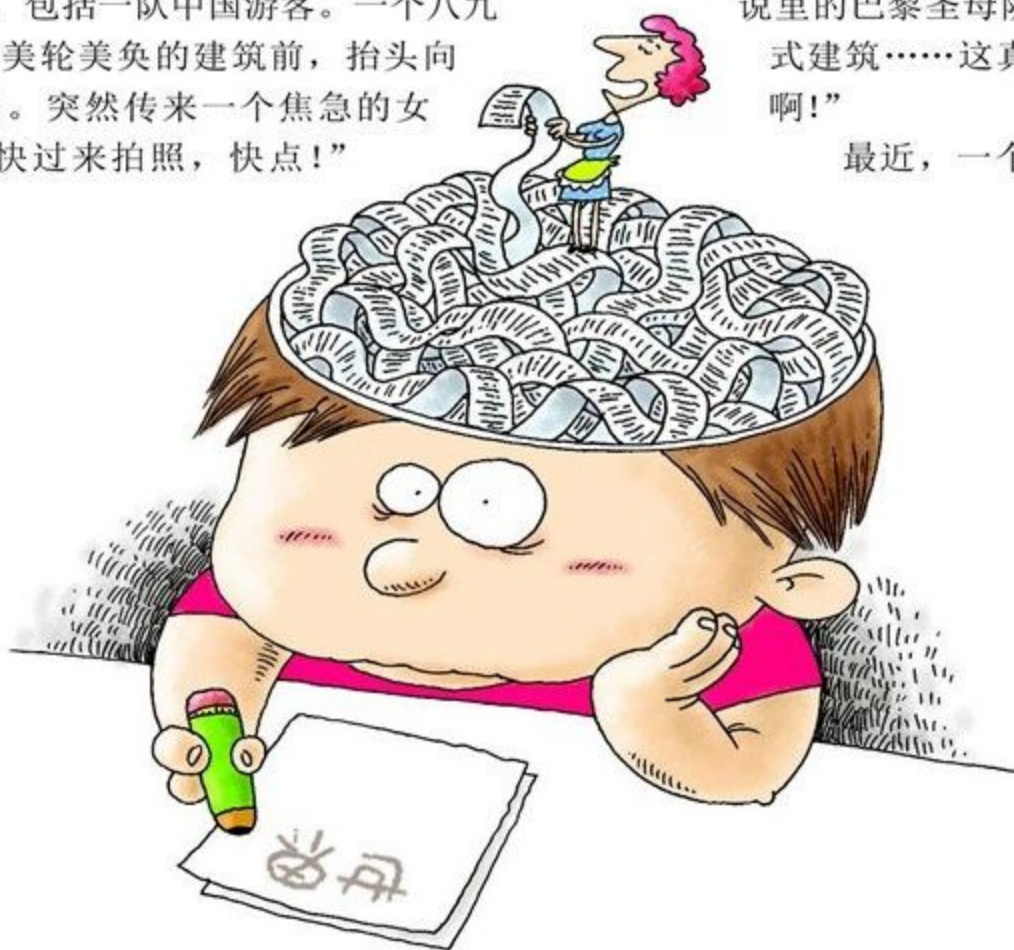
随着他们走远，声音变得断断续续，和孩子妈滔滔不绝的兴奋相比，孩子恹恹地沉默着。

本来是那么费心想教育好孩子的母亲，为什么就不能多给孩子一点空间和时间，让她用自己的眼睛看巴黎，用自己的语言描述巴黎呢？难道非要千篇一律地写：“爸爸妈妈带我去巴黎看到了雨果小说里的巴黎圣母院，它很美丽，是哥特式建筑……这真是一个有意义的暑假啊！”

最近，一个熟人在微信朋友圈里

说“孩子话”

●魏蔻蔻





人之调和 ●何鑫业

阳坡的虫啊、草啊、树啊，入药的话，不仅不是阳性，是极寒的寒性，原因是几百万年来，这阳坡的虫啊、草啊、树啊就是靠着内在的寒，与外在的热和阳抗衡调和的；反之，阴坡的虫啊、草啊、树啊一律为热性，以与外在的寒和阴调和。前者如黄连（别名鸡爪连），长于南坡，却性寒，治热病。后者如附子（别名鹅儿花），生于北坡，尤其是洼地，却性热，治寒症、湿症。

第二句，“万物调和为世界”说，中国的长江以北适宜种麦子，麦子较水稻寒，所以北方的饮食中多伴以葱、姜、蒜驱寒；由于麦子性寒，主泄，肠子里留不住，故北方人较南方人直爽，说话做事直肠子进直肠子出，酣畅淋漓，快意春秋。

第三句，“人之调和为学识”说的是，什么是上天，什么是菩萨。上天，管的就是大地调和；菩萨，管的就是万物调和；什么是中医呢？中医，就是管人之调和。用什么调和呢？就是用知识、学问来调和。

最后，什么是人呢？人，千万不要自作多情，亦不可妄自尊大，因为，人，就是万物之一，就是和虫啊、草啊、树啊一样的东西——你住北方，光照太少，你就必须阳一点、刚一点，以便与寒冷调和；你家在南方，光照和雨水太充沛，你就必须绵一点、柔一点。

（余娟摘自《经典美文》2015年第7期，任焕斌图）

20世纪80年代，我疯狂读书，到了90年代就很少读书，现在又开始零零星星地读，但读的不再是文学、哲学，而是中医学。这个中医学也不是治病的中医学，而是跟认知有关的中国古代的知识学问。确切地说，我读它，是因为我越来越想弄清楚，人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正在读的这本书，叫《本草问答》，谁问的、谁答的不重要，关键是它把我吓住了。

它吓住我的有三句话：一句是“大地调和为宇宙”，一句是“万物调和为世界”，最后一句是“人之调和为学识”。

“大地调和为宇宙”是说，山有阳坡和阴坡，

晒她8岁女儿写给她的生日卡：“妈妈，生日快乐！您辛苦了，我长大后要好好孝顺您，让您开豪车、住豪宅，凡是爸爸不能为您做到的，我都会为您做到！”的确是个有孝心的孩子，可看到一个8岁的孩子，用这种语言和价值观来表达祝福，我还是不禁感慨。

比起中国孩子，荷兰孩子则显得笨拙和幼稚得多。

先生的表妹过生日，她7岁的儿子给她写祝福卡片：“妈妈，我爱你，最最爱你。你的腿很长，很漂亮。爸爸和我祝你生日快乐！”他还做了12张叫作“帮妈妈礼券”的字条，她要是累了、闷了可以撕下一张，让儿子或老公做字条上的事。比如：

“帮妈妈洗车”“和爸爸一起逗妈妈开心，要让妈妈笑一个小时”“给妈妈采一束花，插在妈妈床头”……他有很多字不会写，是用画表达的，那么孩子气，可是又那么有爱。

能不能就让孩子自由放松地说“孩子话”呢？不大、不空、不长、不远，但它会让你笑，让你暖，让你思考，让你通向那个小小的内心，看到里面最真实的喜怒哀乐。他可以慢一点，也可以笨一点，但他可以按他的节奏和方式成为独一无二的自己。

（孤山夜雨摘自《新闻晨报》2015年7月2日，小黑孩图）



“有话”和“没话”

●林 希

老朋友相聚，大家说到我的“出去”“回来”，说起我每年在中国、美国之间来回跑，自然同情的多，说我辛苦的更多，其中一位老朋友突然问：“每次跑来跑去有什么感觉？”我不假思索地回答：“就是一出去就‘没话’，一回来就‘话多’。”

先说出去“没话”，还不是到了美国没话，而是一出境，一过海关，就立即不说话了。从北京出关，候机处还是中国人多，彼此也不说话，身旁坐着外国人，就算会外语，也不说话。没人相互询问，去什么地方，在国

外做什么事以及挣多少钱。外国人忌讳这种询问，在国外工作的中国人，也绝对不会告诉你他一年挣多少钱。除了这些，还有什么话好说呢？结婚了没有？坐在你旁边的这位年轻女子是你的女儿吗？每句话都可能遭一顿臭骂，客气的冲你翻翻白眼儿，提起箱包远远地躲开；多事的，到了美国找律师和你打官司，说你打听他人隐私。

这犯得着吗？不过，还是少说为妙。

上了飞机，无论身边坐着什么人，也不会交谈。有什么话好

说呢，同一班飞机，去的都是一个地方，飞机着陆，各人走各人的，绝对不会有人顺路带你。谁知道你是什么人啊？而且机场明文规定，任何人不得照看他人行李。一次在洛杉矶候机，一位女士，从相貌看绝对善良，好像有什么事情，走到我们面前，非常礼貌地对我说：“叔叔，帮个忙，我去办一件小事，请您照看一下我的行李好吗。”

我正要表示可以帮忙的时候，不料儿子却抢先说：“对不起，您还是自己拉着箱子办事去吧。”

何以如此无情无义？待那位女士怏怏地走开之后，儿子小声地对我说：“照看他人物品，是要负责的。”

“咱能把它看丢了吗？”我不解地问着。

“不是没出过问题，恐怖行为、贩毒事件，许多都是在委托行李里发现的。”

“你看她像个坏人吗？”我还是坚持自己的看法。

“分辨好人坏人是法律的事。”

真是的，有了法律，人情也就派不上用场了。

这就是走出国门没话说的原因。是啊，面对任何人都不敢相信的现实，还有什么话好说呢？

回来就绝对不一样了，只要一进海关，看见谁都想说话，在国外住在哪里？现在要去哪里？有人来接吗？原来做什么工作？每月挣多少钱？去国外找什么人？家里还有谁？孙子多大了？在哪个学校读书？功课怎么样……比查户口的问得还仔细。

如果遇到同乡，那就更热闹了。单位的大门朝哪边开？多少

安静

◎龙应台

信箱里突然出现一张素雅的讣闻：何年何月何日葬礼在何处举行，地址与我的一样——显然是同一栋楼里的人，整栋楼也不过十户人家。可是死者是谁？我不认识。发讣闻给我的人，也不知道我是谁。在这美丽的公寓住了一年，邻居之间唯一的沟通是楼梯间一声仓促的“你好”，面容还没看清楚，人已经消失在门的后面。哪一家住了多少人？不知道，因为从来不曾听过吵架、欢笑、电视、音乐、儿童的追逐声、厨房的炒菜声。整栋楼有着侯门深似海的安静。

在和气、礼貌、优雅的“你好”后面，总是透着一丝凉气，人与人之间隔着冰冷的距

离。耶路撒冷那个为“孩子的面包”而热切地奋斗的店主、菜市场里裸着流汗的胸膛击节歌唱的摊贩、指手画脚脸红脖子粗吵架的工人……人的声音、人的愤怒、人的汗水、人的眼泪、人的味道，真好！

黄昏，来到湖边。向湖心游去，野鸭子游过的水纹与我拨出的涟漪轻轻吻合。水草将湖水浸得碧绿，水覆在肌肤上的感觉，像柔软洁净的丝缎。五百个人所在的湖畔营区，寂静无声，瑞士人在静默中低声细语，小心翼翼地不去打扰别人欣赏夕阳湖光的心情。

走过住宅间的小巷，听不见任何电视的噪音。清晨，吵醒我的是浓密的树叶里嘹亮的鸟鸣声。到公园里漫步，花径草坪上不会有垃圾、狗屎、玻璃碎片。公车的座椅上，不会有嚼过的口香糖、泥鞋印。在

人行道上走着，不会有脚踏车从你身后赶来。骑着脚踏车，不会有行人在前面阻碍。开车的时候，不会有老兄慢条斯理地点烟，挡住你的去路。

美丽、安静的环境，真好。

可是为什么美丽的环境里总是住着冰冷的人？为什么热情可爱的人总是制造出杂乱、吵闹的环境？似乎个性中一定要有那么一股令人冻结的凉气，才培养得出文明、幽雅的环境，可爱的人与可爱的环境，竟是不可兼得了。

（烈子摘自汕头文学出版社《这个动荡的世界》一书，董克诚图）



路公共汽车经过那里，你们那里曾出过一件大事，你知道吗？聊得再投机，有个人你认识吗？他现在怎么样？他后来的事搞清楚了吗，从过了海关，一路走一路说，越说越近乎。分手的时候留个电话，好了，打招呼喝酒的日子不远了。

一点也不夸张，我去年回来，从天津进关，一位中年女子追上我和老伴说：“哎呀，在飞机上我就注意到你们老两口，是转机的吧？我也是从洛杉矶上的飞机。”

好了，拉起家常来了，在美国住在什么地方，听说洛杉矶有一个什么地方，那地方的中国人可有钱了，都是路子不正。于是道听途说，故事就说起来了。

咱们都是规矩家庭，孩子都是出去求学的，读博士吧，几个？工作称心吗？美国人的钱可不好挣，累死了……没完没了，一直走到大门口，看着接人的汽车来了，还真留下了电话。

进了国门，见了谁都想说话，没忌讳。问工作、问年龄、问家庭成员，没人会去法院告你；拉着行李，请身边的人去小店代买一包方便面，都不怕他回来交给你一包毒品。在中国，分辨好人坏人，是自己的事。看着不像坏人，你就尽管相信这个人；看着这个人不像好人，你就躲他远点；看错了，谁让你相信他的？还是你的责任。

这就是亲情，就是热土，就是家园，这种情感不是装出来的，更不是强迫出来的。人尽此理，物尽此格，信哉，斯言也。

（若子摘自《今晚报》2015年7月11日，黎青图）

国外演讲与名牌内裤

●莫 言

中国作家在国外的所谓演讲，其实多半是自欺欺人。一是外国人对中国文学根本就没有那么大的兴趣，能来三五十人听讲（其中多半还是自己的同胞），已经很不错了，有时候来上三五个人，如果你还想拿出事先写好的讲稿读一遍，那离精神病就不远了。最好的办法就是赶快进饭馆，吃着喝着，该说点什么就说点什么。二是中国作家中，就我所熟悉的范围内，给他一个题目立即就能出口成章、言之成理的很少，多半是满嘴拌蒜，把那些说了多少遍的陈词滥调再重复一遍而已。真正的演讲，绝对不能捧着稿子念，应该像列宁那样，把双手解放出来，把头抬起来，用眼睛和丰富的表情与听众进行交流。要挥手，叉腰，身体往前探出去，然后再仰起来；要不时地在台上走动，仿佛在表演，但又没有半点表演的痕迹；要让你的语言像水一样流出来，像火焰一样喷出来，而不是像牙膏一样被挤出来。不能有病句，不能啰唆，更不能为了哗众取宠而胡言乱语。要让你语言的内在逻辑的力量像万能的触角把听众牢牢地钳住，又不陷入空洞的形式。但世界上只有一个列宁，他

生了一个硕大的脑袋，脑浆也比常人重几十克。他有钢铁般的意志、惊人的记忆力、渊博的学识和严密的逻辑。他往台子上一站，听众（也是观众）立即就被催眠。列宁，请想想他副那模样吧，那是真正的奇人异相，是真正的人才。想学他？怎么可能？公鸡想学老鹰，尽管也能勉强飞起来，但翅膀单薄，屁股下沉，那个狼狈劲儿，还不如说是挣

扎。我辈在国外的所谓演讲，就像公鸡学飞，飞起来也是一景，但实在是惨不忍睹。通过这事我想到，许多事情是学不会也不能学的。风流不能学，“大才子自风流”，不是风流种子学风流，那是自取灭亡。贵族姿态不能学，袁世凯的二公子袁克定在败家之后，家中只余一个老家人侍候，每天早晨还是要胸挂洁白的餐巾，正襟危坐，左手执叉，右手执刀，切割着桌子上的窝头和咸菜，往嘴里填。暴发户爱镶金牙，土包子好炫名。一个作家外边穿了一条名牌裤子，里边穿了一条名牌裤衩，生怕人家看不到，心中难过，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将一块白布缝在屁股位置上，上边写着：内穿名牌裤衩一条，价值三百余元。使用金叉银杯，吃真正的西餐，桌子上摆着鲜花，但还是不像，还是一副小人得志的嘴脸。仅有几个钱，距离贵族还很遥远。要慢慢来，熬过三代之后，到了孙子辈上，贵族气大概就会有一点。那个往屁股上缝布条的老兄实在是笨，把名牌裤衩穿在名牌裤子外边不就行了吗？内衣外穿，才是真正的时髦，引领服装新潮流。要不就把裤腰截





短，前露肚脐，后露腓沟，显出名牌裤衩的蕾丝花边——我不知道什么叫蕾丝花边，从许多新潮作家的书里看到，觉得凡名牌裤衩必有蕾丝花边。

早年在农村，我的一个叔叔当生产队队长，早晨要早起敲钟、派活，晚上要给那么多社员定工分，鸡一口鸭一口，爹一份娘一份，稍有差池，立马就吵翻了天。但我的叔叔一言九鼎，无论多么难缠的角色都能摆平，真是不容易，真是不得了，我佩服得不行。当时我就立志：做事要做这样的事，做人要做这样的人。但当我把我的志向向他表明后，他用不屑的目光打量着我说：“就你？三脚踢不出一个屁来，还想当队长？知道不？当官首先要有好口才！反过来说就是‘好口才带着三分官’。”我叔叔一下子就把我的自信心给瓦解了。后来，为了有朝一日能当个官，我也曾站在树林子里练习演讲，姿态难看，声音难听，连树都羞惭得浑身发抖，叶子哗啦啦直响。

我叔叔是个土天才，经常在夏夜的打麦场上对着社员发表演讲。天南海北，驴头扯到马腩上，但听起来趣味盎然，不亚于单口相声。他的口才为什么那么好？他肚子里怎么会有那么多要说的话？他怎么能把话说得滔滔不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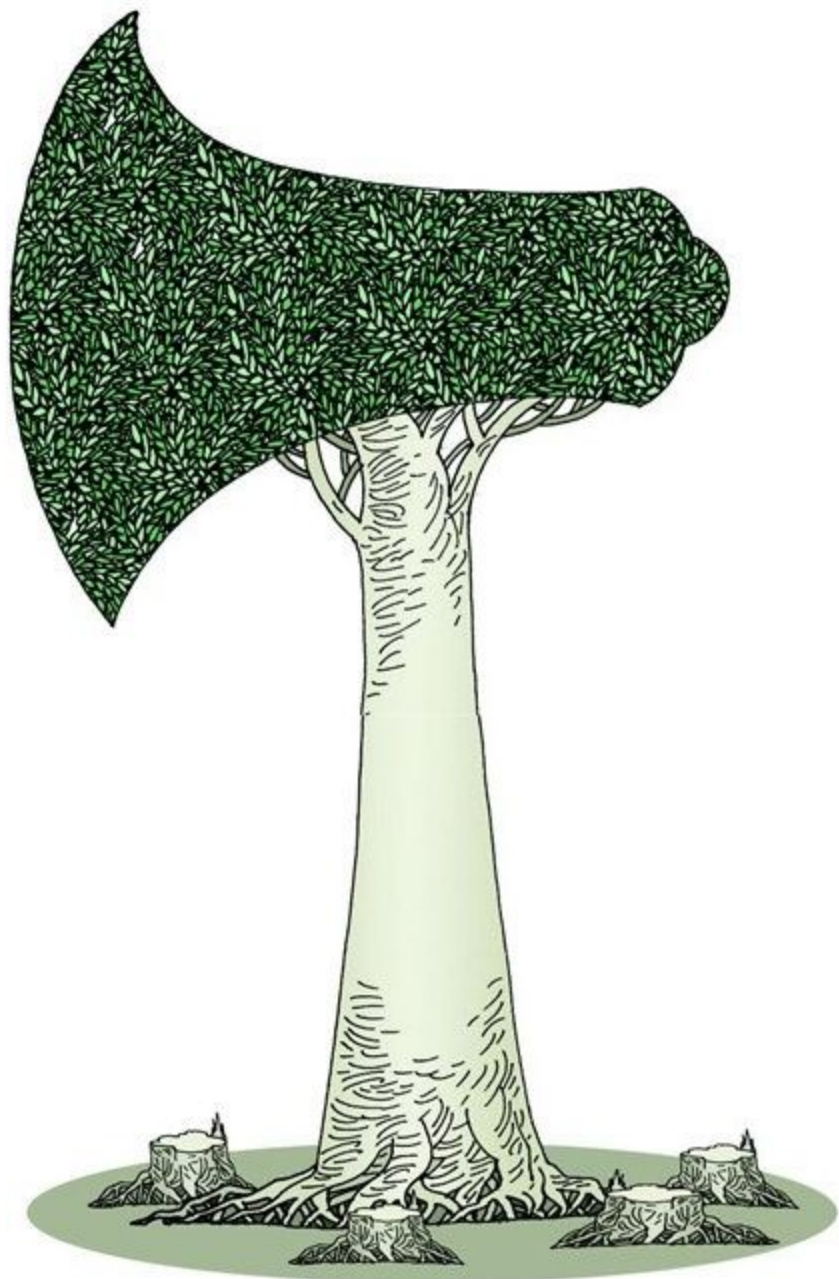
因为以叔叔为榜样，我从小就对口才好的人十分敬佩。我觉得，能够滔滔不绝地发表演讲的人都是大人物，或是未来的大人物。当年在农村无书可读，偶然得到了一本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在德国法西斯的法庭上为自己，也是为共产国际所做的陈

述和辩护的书，那犀利的语言、排山倒海般的气势，令我热血澎湃，心驰神往。他的演讲甚至影响了我的小说语言。《三国演义》里夸奖英才时经常使用“辩才无碍”这个词，譬如诸葛亮、秦宓、张松，无一不是雄辩之人。“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白马非马”。让一个口才好的人佩服另一个口才好的人不太容易，但像我这样一个笨嘴拙舌而又满心想练好口才当大官的人，见到“辩才无碍”的人没法不佩服。可惜在作家队伍里很少见到这样的人，这样的人到哪里去了呢？有人说是当官去了。可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些当官的口才也实在是一般，他们讲的话都是一个调调，毫无幽默感，更没有个人的语言风格。语言流畅不是我心目中的好口才，更不是演说家必备的素质。真正的演讲，每次都是创造，每次都不重复，每次都能说出自己的话，而不是背诵别人的话或是把别人的话改头换面。只能这样说：真正的演说家是天才，而天才不可多得，据说五百年才出一个。让我们等候着大演说家的诞生，也许等得到，多半是等不到。

还是回到“国外演说”这个话题上来，用自己宽容自己的态度。既然受邀出去，总是要说点什么。既然没有即兴演讲的才能，事先写好稿子，出去照着念念，也是可以被原谅的，总比装哑巴好。有人说作家出去是代表国家说话，那是瞎扯，那是不知道天高地厚，当然有人要这样想也不是不可以。十几年前，我的一个朋友，刚加入了省作家协会，心中兴奋，坐在火车上，将

作协会员证摆在小桌子上。夏天，他开着窗，一阵风来，把那东西刮出去了。他急了，想跳窗，被大家拉住。我的朋友“哇哇”地哭起来。“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引得众人前来观看，还以为他的钱包被刮出去了。后来有人说：“别哭了，回去补一个不就行了。”我的朋友说：“回去当然可以补一个，但这次人家怎么知道我是一个作家呢？”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撇着嘴说：“年轻人，别哭。当年托尔斯泰把作协会员证丢了，就在胸前写上‘我是作家’四个大字，你也可以照办。”我明显听出来老太太的讥讽之意，从此出门再也不带作协会员证。这个老太太给我上了一课，让我明白了许多道理。所以我知道了，有的作家出国可以代表祖国，但我只能代表自己，有时候连自己也代表不了。因为我的话需要被翻译给听众，翻译能否把我的话翻译得符合我的本意，只有天知道。既然是在国外说话，适度地自我吹嘘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国外的作家都有这嗜好。所以我“演讲”里的有些话，大家也不必当真。话是那样说的，但自己能吃几碗米饭还是知道的。一个写小说的，按说不应该写除了小说之外的其他文字，但迫于人情世故，我也不能免俗。将“演讲”“对谈”之类的文字结集出版，是不仅庸俗而且肉麻的事情，比内裤外穿好不到哪里去。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个在屁股上贴布条炫耀名牌内裤的作家虽然不是我，但也可以算是。

（张建中摘自作家出版社《会唱歌的墙》一书，勾犇图）



大树底下不长草

●李国文

夺城者将，夺国者帅。

诸葛亮在政治上，是帅才。正是他的三分天下、联吴抗曹的决策，才能让蜀以最弱的力量，跻身于吴、魏之间，而成鼎立之势。刘备能建国称帝，在三国中举足轻重，如果没有诸葛亮为刘备设计立足荆州、谋取益州之蓝图，樊城、江陵之败，按刘备的想法，南奔苍梧，投靠吴巨，充其量也就是流寇了。

但诸葛亮并不能说是一位非常成功的军事家，至少他没有像曹操那样指挥官渡之战，击溃袁绍六十万人马，统一了北方；也没有像周瑜那样指挥赤壁之战，消灭曹操三十万大军，巩固了江东。由于东吴在军事上的建树，才促使三国政治格局的形

成。诸葛亮作为一位政治家，也是想学曹操、周瑜，通过一次大规模的战争，扭转形势，实现其政治抱负，进而名垂青史。所以先南征孟获，而后北进汉中，是想在荡平后院之患后，能腾出手来进行战略反攻，出祁山，过秦岭，兵临渭水，直逼畿辅。

然而，诸葛亮的军事才能，只是在争城掠地的局部战争上，表现得游刃有余、得心应手。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是离不开政治家的高瞻远瞩、审时度势的，打军事仗，实质是打政治仗。在这方面，作为主帅的诸葛亮就有顾此失彼、未克全功之弊。既不了解曹魏的国力和统治的稳固性，六出祁山，盲目挑战，也不肯承认刘蜀更应该固守求存的弱势，连年征战，大动干戈。仅几座城池的地方部队，已使他煞费苦心，还要打力不从心的正面战争，即使赢得眼前的小胜，也难改变最终失败的命运。对一位政治家来讲，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是一种很可怕的性格悲剧。连续十年，六出祁山，兴师动众，无功而返。这么多年的仗打下来，国势日衰，兵将凋零，实力耗竭，百姓厌战，最后，他老人家一死，蜀国也就敲响了丧钟。

所以，国家成败，系于君臣；战争胜负，决定在将帅。什么样的君臣将帅，和用什么样的人，是至为关键的。吴将朱桓在守濡须口时，数千守军对数万曹仁重兵，诸将业业，各有惧心，桓喻之曰：“凡两军交对，胜负在将，不在众寡。”朱桓此人，勇而残忍，残暴苛虐，实不足取，但他这番话是极有见地的。

现在来看，蜀国的诸葛亮与魏国交战，吴国的陆逊也与魏国交战，蜀败而吴胜，不能不说与主帅的指挥紧密相关。诸葛亮相信的马谡丢了街亭，全军败绩；而陆逊相信的周鲂赢了曹休，大获全胜。领导的责任，就是用人，而准确地发现人才、衡量人才、使用人才、信任人才，则更是主帅的重要任务。诸葛亮撇开老将如赵云，猛将如魏延，青年将领如姜维等不用，独信马谡，结果街亭失守，逼得他只好唱空城计。一个人用之不当，则会影响一批人；同样，一个人用对了、用好了，也会带动一批人。吴国中期的朱桓、全琮、徐盛，比之早期的吕蒙、甘宁、凌统逊色多了，但陆逊指挥若定，左右协同，部将效力，主动杀敌。尤其周鲂比之当年黄盖，不弱半分，结果曹休大败，回到洛阳就发病死了。所以，第一，人才得有出头的机遇；第二，人



才得有施展的余地；第三，最重要的是，用人者要承认“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的现实状况，要善于用人，扬其所长，避其所短，不因噎废食，求全责备。人才得其所用，是制胜之道。能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则更是获胜的保障。

诸葛亮是个伟人，是个接近于完人的人，这也就使他产生了太多的自信。过于自信的人，便容易自视甚高，而不大把别人放在眼里，事必躬亲，不愿假手于人。诸葛亮治蜀，多用平实之才，守成有余，开拓不力，而恃才狂放、倚武倨傲者，往往被搁置摈弃。蜀中干部，青黄不接，他不是不知道，也不是不着急，他努力物色人才，确也是事实。但他的用人标准拘谨偏执，较之曹操的“唯才是举”，实在相去甚远。因而不可能有出色的人物出现，这也是大树底下不长青草的定律——大树把阳光都吸收了，小草自然就恹恹地无生气了。

诸葛亮的极度自信和事必躬亲，大大限制了部下的积极性，也养成了他们的依赖心理。所以司马懿对西蜀之一举一动，无不了如指掌，因为他只需要研究诸葛亮一个人就行了。但对东吴的真实意图，却未可尽知。甚至对周鲂的伪降，也疑信参半，因为他不可能全盘掌握东吴所有将领的变数，所以魏国在与吴国的战斗中，无所施展，也就很自然了。

由此看出击败关羽和刘备的陆逊，确实在战争艺术的把握上，不像诸葛亮这位前辈那样拘谨求稳，唯恐有失，举措犹豫，任用踌躇。例如吴之朱桓和蜀之魏延，同样是献计而不被采纳的勇将，但双方主帅的态度，却有很大的不同——魏延差点被诸葛亮杀了，由此便知道吴何以胜、蜀何以败了。

这就不能不为诸葛亮遗憾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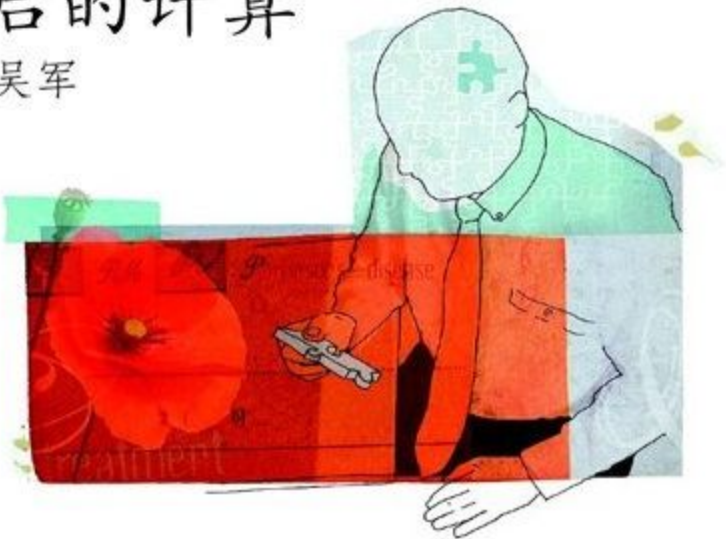
西蜀最后败亡时，户二十八万，官吏数为四万，而吴降晋时，户五十二万，但官吏只有三万二。这样一个头重脚轻的国家，怎能不失败呢？由此看，诸葛亮留下的臃肿的官僚机构，实在是蜀国的累赘。虽有如此数量的干部队伍，可诸葛亮直到临终前，也没有物色到一个好的接班人，眼高如此，挑剔如此，实在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在五丈原弥留之际，诸葛亮还在遗憾：“吾遍观诸将，无人可授。”也就只有姜维勉强够格，真是够他痛苦的了。

“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太精明的领导，光看到下属的缺点和不足了。所以，大树底下不长草，是很有道理的。诸葛亮最后弄到文臣武将难以为继的局面，看来并非西蜀无人，而是他不让人才脱颖而出罢了。

（天问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闲话三国》一书，黎青图）

最后的计算

●王吴军



波莱尔是法国著名的数学家，他一生倾心于数学计算研究。他常常对别人说：“数学计算是我的第一生命。”因为经常勤奋地研究数学计算，波莱尔积劳成疾，倒下了。

在波莱尔临终的时候，他的亲朋好友默默地守在他的身边，希望他能睁开眼睛再说些什么。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波莱尔闭着眼睛躺在病床上，没有一丝气息。“看上去他的呼吸已经停止了。”有人小声说道。

其他人听到这句话，立即围到了波莱尔面前，大声呼唤着他的名字：“波莱尔，波莱尔，你醒醒，你跟我们说句话吧……”

波莱尔的妻子一边用手轻轻地晃动着波莱尔的身体，一边流着眼泪说：“亲爱的，难道你不想对我说些什么吗？”波莱尔依然悄无声息地躺在那里，闭着眼睛，一动不动。“让我来试一试。”波莱尔的好朋友季克尔博士走上前来，他弯下腰，在波莱尔的耳边轻轻说道：“波莱尔，我问你，11的平方是多少？”只见波莱尔慢慢睁开了眼睛，用微弱的声音回答：“121。”

完成了这最后的计算，波莱尔闭上眼睛，与世长辞。

（昌辉摘自《团结报》2015年7月4日，全景视觉供图）

● 刘心武



美丽的藩篱

1954年春天，我12岁，在北京隆福寺小学上学。有一天，学校停课，老师带领我们到猪市口大街（今珠市口大街）南边参加义务劳动。那一片地方现在广为人知，就是中国美术馆所在地。记得那一年还没有修建中国美术馆，只是在拓宽马路，好把从朝阳门、东四到沙滩一直通往西四的道路贯通。工人师傅们已经把那一片的房屋拆得差不多了，参加义务劳动的人们只需把一些未及时清理的砖瓦碎木集中到指定的地方。

到了工地，只见早已有很多大人在那里忙碌。那时我系着红领巾，在老师的带领下干得满头大汗，一身是灰，却满心欢喜，生怕落后。

我正忙着把一摞砖头抱到指

定的集中点去时，忽然看到了我妈妈，吃了一惊。因为清晨妈妈给我热早点时，并没有说起要到这里参加义务劳动的事呀！但是我很就想明白了，一定是我上学以后，街道上才通知居民们来义务劳动，好使各方齐心协力，把那片拆迁地的清理工程干完。妈妈年轻时当过小学教师，那时却成了家庭妇女，可是她热心街道工作。看得出来，在工地上，妈妈的角色就像我们的班主任老师一样，从工地指挥部领到具体任务后，带领我们家所在的钱粮胡同海关宿舍的居民，前往指定的区域清场。她细致分工、身先士卒，大家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妈妈当时已年过半百，相当胖，干起搬运杂物的粗活自然十分吃力，脸涨得通红，可是她满

面春风，仿佛是一种难得的享受。我家自1950年从重庆迁到北京以后，眼见着北京市政府疏浚什刹海、翻修下水道、增补自来水设施、开辟一条又一条的公共汽、电车线路……爸爸妈妈提起来总是赞不绝口，现在能亲自参与提高首都人民生活品质的工作，妈妈那种心甘情愿的劲头，自然体现在每一个动作里。

我望见了妈妈，妈妈一定也看见了我，我除了没有大声地呼唤她，整个儿的表情身姿都在拼命地朝她显示：“嘿！我在这儿呢！”可是，令我非常失望并且惊诧的是，妈妈的目光从我身上掠过时，仿佛看到的是一个她并不认识的孩子，倒也不是冷淡，她脸上分明带着微笑，然而那只是看到任何一个参加义务劳动的少先队员时都有的微笑，而不是我所期盼的那种看到她最心疼的么娃儿的特殊笑容！我几次试图接近她，并且频频以夸张的肢体语言以期引起她的关注，她却依然不给我哪怕只是表情上的一个小小的特殊回应！情急中，我一个趔趄，跌倒在地，磕破了腿。我恨恨地望着那边的妈妈，心想难道你还不来管我吗？可是，她却直起腰来，耐心地跟一位去问她什么事的老大爷解释起来……班主任老师赶过来，扶起我，带我去卫生站清洗伤口，涂红药水。

当时的我，怎么也弄不明白，妈妈为什么在义务劳动的工地上不格外地关照我。那天从学校回到家里，妈妈正在厨房里烧我最爱吃的豆瓣鲫鱼……晚饭前，她仔细查看了我腿上磕破的地方，说不要紧的，又嘱咐我先洗个脸再吃



下酒

● 蔡澜

用什么来下酒？这是一门大学问。花生米最普遍，但是我认为这是最单调和最没有想象力的下酒菜，叫我吃花生，我宁愿“白干”。

我反对的只是吃现成的花生，偶尔在菜市场看到整颗新鲜的落花生，买上一两斤，用盐、糖、五香和大蒜煮熟剥壳吃，又另当别论。

自制红烧牛肉，当然是上等的下酒菜，但太花费时间。要是闲暇来准备，那花样可真不少：炸小黄花鱼、芋头蒸鹅、酱鸭舌……举之不尽。花钱花工夫的下酒菜，总觉得不够亲切。

在庙街档口喝酒的外国水手，掌上点一点盐，也能下酒，其乐融融。家父的友人黄先生，没钱的时候用一把冬菜，泡了开水干上两杯，比山珍海味还要好。

岳华和我两人，在日本千叶的小旅馆，半夜找东西下酒，无处寻觅，只剩一条咸萝卜干，要切开又没有刀子，唯有用啤酒瓶盖锯开来吃，亦为毕生难忘之事。

三五知己见面，有时偶遇比相约更快乐，拿出酒

来，有什么吃什么，开心至极。家里常泡有一罐鱼露芥菜胆，以此下酒，绝佳。

至于现成的东西，我喜欢南货店里卖的咸鸭肾，切成薄片，一点也不硬，又脆又香。要不然就是日本的瓶装海胆掺鱼子或海蜇、韩国的金渍和酱油大蒜、意大利生火腿和蜜瓜、泰国的指天椒虾酱，最方便的有宁波的黄泥螺，这些都比薯仔片等高明得多。

最近由两位舅舅处学到的下酒菜，我认为是最完美的，各位不妨一试。那就是在天冷的时候，倒一小杯茅台，点上火，拿一尾鱿鱼，撕成细丝，在火上烤个略焦，慢慢嚼出香味，配任何酒都适合。

把一个小火炉放在桌上，上面架一片洗得干干净净的破屋瓦，买一斤蚶子，用牙刷刷得雪亮，再浸两三个小时盐水让它们将老泥吐出。最后悠然摆上一颗，微火烤熟，“啵”的一声，壳子打开，里面鲜肉肥甜，吃下，再来一口老酒，你我畅谈至天明。

（生如夏花摘自长江文艺出版社《活，该快乐着》一书，Getty Images供图）



饭，晚上要洗个澡……晚上洗了澡，我忙着赶作业，也就没有问妈妈，为什么在工地上，她对我视而不见。

这事我始终没有追问她。其实越到后来，越用不着问。这类事后来经常出现，都很细小，形态不一，含蓄微妙，然而如雪花飘落积累，使我的认知越来越澄澈清明：妈妈一再地在我生命的活动空间中，设置出无形的藩篱，使我懂得，藩篱的一边是我们温馨的家，在这个区域中，我尽可享受亲情，悠游自在，甚或偶尔撒娇使性也无妨；而藩篱的另一边，是公众社会以及他人所在，她要我从小懂得，在公众社

会中不可仗恃或依赖亲情温恤，并且一般来说他人不可能，也无义务给我以“幺娃儿”式的宠溺优待。我一天天地长大成人，应尽早习惯在公众社会中奉献，学会与他人耐心磨合，艰辛劳作，独立生活！

当然，爸爸和妈妈是同样的态度，但他总是很忙，在我17岁离家独立生活之前，给我以深刻影响的是妈妈。她为我设置的藩篱，是无形而美丽的，这是她给予我的最重要的精神财富。我的人生已过中途，回顾往事，我有过许多的错失，有时甚至是重大的失误，然而，托庇于妈妈给我的教养，我从来没有犯过公私

不分，或人我不分的错误。并且，我总是能像她那样，在把自家藩篱内的东西贡献给藩篱外的社会和他人时，只觉得欢愉，而视任何将藩篱外的公家或他人的东西据为己有为奇耻大辱。1988年，电脑在中国还是相当稀奇的东西，一位大款朋友送了我一台电脑以助我写作，我毫不犹豫地那台电脑捐给了当时我任职的单位。恰在那一年，妈妈不幸在成都仙逝，我在流泪祭奠妈妈时，心中告慰她说：“您为我设置的人生藩篱，我要再传给您的孙子，那将是常青的藩篱！”

（余娟摘自同济大学出版社《心灵体操》一书，李旻图）



你可能一辈子都无法这样旅行

●西门湄

每次乘火车出行，我都会有一种强烈的感受：“这就是人间风景啊！”窗外丘陵山谷、河流湖泊已是难得，更重要的是，那些山川里的人迹，那些房屋、田野、道路、桥梁，跟随火车行驶在大地上的时候，更能感受人与自然的关系。我在车窗边，沉迷其中，坐几个小时也不觉得乏味。乘火车还能看另一种人间风景，就是车厢里的人。同车的人，往往是我们日常接触不到的类型。

就像我最近碰到的一个重庆专车司机。她开着豪车，双休日兼职做司机。她老公也迷上了开专车，比她接的单子还多。她说他俩很担心专车涨价，他们都不是为了赚钱来开车的。如果涨价了，坐专车的人就会变得类型单一，见识不同的人的乐趣就会大减。

我跟她说，或者可以试试坐火车。火车车厢，一个封闭的环境，放入许多不同的人，会发生什么都是未知的。这有点像动物行为学家康拉德·劳伦兹的水箱实验。他准备一些环境相同的水箱，每个水箱里再放入一些来自池塘湖泊的水，水箱里会慢慢形成一个微型生态系统。这些看似无甚区别的水，却带着不同含量的微生物，每个水箱里都是不同的世界。

很多火车爱好者，迷恋的就是这样的小世界。

日本有位主持人叫关口知宏，也是这样一位火车旅行爱好者。他拍摄了好些关于火车旅行的纪录片，《欧洲铁道之旅》《中国铁路大纪行》《日本铁路大纪行》，等等。

有人猜想，以一个日本人的角度来拍摄各地铁路，多半是给日本人看的，是介绍风光和民俗的、导游性质的旅游片吧。

事实并非如此。就拿《中国铁路大纪行》来说，这部只通过网络流传、长达8集的纪录片在中国引起的反响是惊人的。

关口知宏凭借什么赢得了这么多中国观众？

这部片子是他2007年到中国拍摄的，分为春季篇和秋季篇两部分。他根据中国铁路路线分布情况，设计了一次火车旅行，且线路不重复，不交叉。他从拉萨出发，终点为喀什，全程共计36543公里，乘车时间累计609小时48分钟。片子记录了他在春秋两季、共两个多月的火车上的生活。

但打动观众的并不是这些数字，这数字后面是一个第一次来中国的日本人，坐了无数趟火车，有高铁动车，更多的是绿皮火车那样的慢车。在这个过程中，他学会了汉语，见识了这片辽阔大地的风物与人情。他最感兴趣的是与这些普通人的交流，了解他们的生活。观众不只是观看这个日本人如何进入中国，更通过他的双眼，看见了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这听起来有点矛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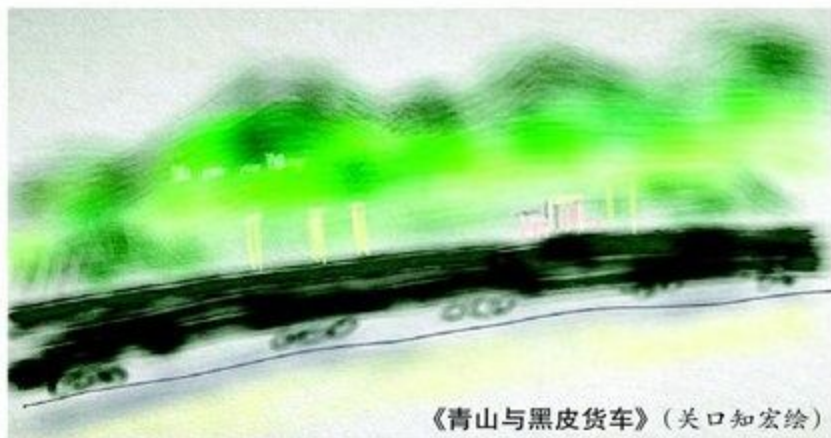
我们借一个陌生人的眼光，更能看清自己身边的世界。但这个陌生人不是普通的陌生人，他有超强的观察力与融入力。

“观察与融入”其实也不能准确形容这种能力，我想把这种方式命名为“体察”。

我们惯常用的“体察”，意指体验考察，通常用于上对下，例如“体察民情”。我想借用这个词，却不是这个意思。我想强调这身体之意。

我们平时所说的观察，更多的是指用眼观看。传统写作课里，都会强调观察。但用眼看是远远不够的。

我在网上看到一个铁路旅行爱好者，经常带着



《青山与黑皮货车》（关口知宏绘）



1969年，作家三毛在西柏林苦读德文，学业的压力、物质的匮乏和身在异国的寂寞，让她在那年冬天的一个早晨突然崩溃。她把书埋在雪地里，想：“心一横，逃课好了，冻死也没什么大不了，死好了，死好了”。

她跑到了柏林墙，申请进入东德，被拒绝。不过她在关卡遇到了一位像《雷恩的女儿》里那么英俊的东德青年军官，“有一双感人而燃烧的眼睛”，那时的三毛也正是一个美丽的妙龄女子，“我知道，我笑，便如春花，必能感动人的——任他是谁”。他帮了她，给她发了临时过境证件，把她拍的证件照小心放在胸口，静默地，陪着她排队。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两个人都不曾说话，却好像已经享受了一段最默契的时光。

分开了，几乎已经不会再见，可还是见到了，他又像王子一样出来，拯救了绝望的过不了关的她，他送她到车站，坐那辆车就可以返回西柏林，回到她的世界中，虽然只是一墙之隔，但那是咫尺

一个人的倾城之恋

●晚睡姐姐

天涯的隔绝。“没有上车，他也不肯离去。就这么对着、僵着、抖着，站到看不清他的脸，除了那双眼睛”。那西方人深邃的目光，就像一口井，“那双眼睛里面，是一种不能解、不能说、不知前生是什么关系的一个谜和痛”。

顾不得了，舍不得就这么分开，她拽着他的袖子，让他跟她走，他说：“不可能，我有父母，快上！”她想留下，“我留一天，留一天！”最后一刻，他把她推上车，“风很大，也急，我吊在车子踩脚板外急速地被带离”。

回去后，她高烧三日不退，被送进医院。病痛之中，她依然在心里呼喊着一个没有名字的人，“那份疼和空，仍像一把弯刀，一直割，一直割个不停”。

这段奇遇，被三毛写到了《倾城》这篇文章中。

他们一见钟情。那一刻，天地无光，世界沉寂，只有两个人四目相对，陷落于爱情的罗网中。

（麦子摘）

相机，坐绿皮火车，拍铁路沿线美丽的风景。我读到她写的火车日志。他说，在绿皮火车上，车厢很空，只有一对夫妻，带着一对小孩，他觉得他们是很美好的普通人，忽然见那家人乱扔了垃圾，顿时心生反感。那妻子热心跟他打招呼，问：“你一个人旅行啊？”他立马生硬地顶了回去：“旅行就是要一个人，人多了烦不烦啊？”搞得那一家人很惶惑，他却安心了。

他有观察能力，却缺乏“体察”之功。他看到旅途中的冰山一角，却错失了更深沉的部分。

关口知宏在这一点上就太强了。

他进入旅行的陌生世界后，会不断调适自己，尽量去理解、全身心地投入这个新世界。因此，在屏幕上，我们看到不少令我们咋舌的画面。

众所周知，中国的火车，除了高铁动车，其他的卫生环境都很不好，现在很多中产阶层都难以接受这样的环境。关口知宏不仅在这样的环境里安之若素，还能轻轻松松地和各色乘客打成一片。有好些乘客，发现他是一个外国人，于是，纷纷拿出自己的食物分给他。甚至有人像喂动物园的动物一样，跑过来，把食物塞到他的嘴里。

有一次，有位老年旅客拿了自己的电动剃须刀，直接给关口知宏刮起了胡子。我们知道，日本

人相处时十分克制，关口知宏在中国的火车之旅中，得怀抱怎样一颗宽容之心？

不单是宽容接受，关口知宏还全身心投入。他也为相遇的陌生人唱歌、画画、讲笑话、“卖萌”、干活。他想去别人家里拍摄，经常把“好想吃”挂在嘴边，一向以食为天的中国人一听说便招架不住了，想马上与他分享。

回报是丰厚的。那些亲密的陌生人，让他看到外人难以了解的东西。他们会倾诉心声，会唱歌给他听，会带他回家。

因此，这部片子，呈现的内容非常丰富：准备报到的大学新生，高考后才买了吉他，想在车上练习一下；独自修复长城的人，靠一己之力默默地修了好长一段；在日语学校集训的女学生，第一次见到日本人。除此之外，还有养蚕的人、摘棉花的人、乡村里留守的老人、蜜月旅行的人……关口知宏在旅途中，写了四个字：异乡有悟。他觉得旅行改变了他。

通过他，观众也能有所体悟，能够发现，世界不是只有我们在新闻里看到的那部分，也不仅是我们周边的生活，还有很多不易进入我们眼帘的存在，除了愤怒、激烈，还有亘远、绵长。

（小雨摘自腾讯网《大家》栏目）



2005年的一个暮春的中午，我来到寿山先生的故里——河北省馆陶县寿山寺乡寿山寺村采访。谈及当年悲惨的一幕，他的孙子张子成老泪纵横，泣不成声。

寿山寺村，原名南彦寺村。由于距离县城45里，日本人鞭长莫及，这里的抗日气氛格外浓烈。带动小村抗日气氛的原因还有一个，那就是著名抗日将领——国民党鲁西游击总司令、聊城行署专员范筑先，八路军著名将领——一二九师新九旅旅长张维翰都出生在这里。一个小村诞生了两位抗日名将，这在全国不多见。

小村有一个民兵队，有40个人，24支枪，每天早晨以铜锣为号，在村外的打麦场上进行军事训练。晚上，队员们则聚在一起，学唱抗日歌曲。唱歌、口号、喊杀声，列队、投弹、冲锋。老百姓的热情也被鼓动起来了，每当训练时，老太太们纷纷出来观看，树上的孩子也应和着喊，仿佛整个小村都在喊。

更让小村人有底气的是开明财主张寿山。寿山先生1896年出生，从军后，曾在湖北督军王占元部下任连长、营长，后来升任湖北煤建局局长。1926年，王占元败散后，寿山先生隐退老家，置办庄田，课教子孙。日本人进占冀南，一些士绅充任伪职，送粮、送钱、送女

人，而他却与八路军交好，不仅自己带头捐钱捐粮，还担任村粮秣委员，秘密为八路军筹粮、筹款。由于他的特殊贡献，八路军冀南军区的不少高级将领常常登门拜访。

张子成清楚地记得，宋任穷、陈再道曾几次到家里做客。



寿山先生

●李春雷

有一年冬天，邓小平从涉县来到馆陶，还在他家秘密住了3天。白天，邓小平就在屋内看书，闭门不出。每到夜晚，几匹战马便悄悄进村，马上坐的是冀南军区和地方党委的主要干部。

南彦寺村西南7里许，有一个小镇——房寨，是八路军冀南

军区新人旅二十三团的秘密驻地。团长郝树桢经常偷偷地来找寿山先生商谈。彼时日军凶焰正高，八路军困难重重。他们常默默地抽着烟，苦思冥想，愁雾笼罩着小屋。

日本兵发现这一带八路军活动频繁，就在村南4里的法寺村修造了一座炮楼。摩托和马队在路上来回巡逻，黄尘滚滚，恶气汹汹。

寿山先生亲近八路军的消息被汉奸侦知。炮楼里传出话来，让他“小心狗头”。1943年阴历年前，他又为二十三团筹集了一批小麦，正准备送去。然而形势发生突变，部队需立即转移，不仅没有带走小麦，还送来一批子弹和枪支，托他妥善保管。他二话没说，当天夜里，就和家人把这些东西藏进了村东张家菜园的一眼土井里。

村民的眼睛睁得圆圆的，日日夜夜盯紧四周。冬天夜里太冷了，怎么办？他们就在野外挖一个井状深坑，人跳进去，只露出头。乡下人每年秋后都把积攒的杂草垃圾和猪粪牛粪掺

在一起，堆成坟丘型或方块型，发酵后，里面热气腾腾。挖一眼小洞，钻进去，虽然臭气烘烘，身上却是暖烘烘的。

正月十四黎明，300多名日军发动突袭，此举被粪堆中的眼睛发现了。一声报信枪响，村民全部撤退。日军进村，一无所获。

村民们回来后，庆贺胜利。根据经验，日军扫荡都是一次性的，短时间内不会再来。

可这一次，村民们大大地失算了。仅仅隔了一天，日军就杀了回来。

凌晨时分，日军猛然从四周包围小村，挨家挨户把村民驱赶进村中央大庙前的一个大坑里。寿山先生和民兵们都来不及转移，尽在其中。

鬼子先是从人群中拉出一个中年人，没有问话，直接劈砍。死者的血浆“噗”地喷出两三米，顷刻分离的尸身和头颅各自颤动着。一个日本兵猛然飞脚，血淋淋的人头，足球似的滚进了人群中。顿时，村民们一阵哭叫，但立时就哑下来，一片死寂。接着，日军又拉出十几个青年男女，剥光衣服，拷打、火烧、灌水，逼问谁是民兵，谁是村干部。不说实情者，一一砍头。十几个青年的血液，霎时涂满整个坑沿，血腥浓烈，直呛鼻喉……

村民张廷俊吓得浑身发抖如筛糠般，屈服了。村长范树奇，民兵武进安、范树伍、范成发和范成普等人被一一指认出来。但这些人都是硬汉子啊，日军拷问无果，全部砍杀。

寿山先生披着一件破棉袄，头上裹一条灰毛巾，脸上涂满锅黑，抱着小孙子，被挤在人群最中间，不幸也被揭露。

日军先是把张寿山横捆在树下的一张木床上，追问粮食在哪里，枪支在哪里，寿山先生摇摇头，闭着眼，拒不答话。几个皇协军便开始撬寿山先生的嘴巴，灌辣椒水——红红的辣椒捣碎后，掺水，辛辣无比。寿山先生

猛烈地咳嗽着，破口大骂：“狗日的小日本，禽兽……”

日本人把他吊在树上，脚下堆满木柴，泼上煤油。一个岁数稍大的皇协军凑到寿山先生面前，低声耳语。寿山先生咬牙切齿，再次狠狠地摇摇头。

木柴被点燃了，大火舔着寿山先生的双脚。他拼命地挣扎着，仰天大骂：“我操你祖宗！小日本，王八蛋……”

寿山先生素来是一个文明人，从来都是笑眯眯的，没有说过粗话啊。

日本兵愈加恼怒，愈加疯狂。烈焰中的寿山先生，棉鞋被烧着了，棉裤被烧着了……村民们吓得心惊肉跳、魂飞魄散，不忍面对这惨绝的一幕。

太阳在云层里闭上了眼，大槐树剧烈地颤抖着，小村里所有的房子和树也在剧烈地颤抖着。

日军挖地三尺，最终也没有找到粮食和枪支弹药，撤出之前，把寿山先生的房子全部点燃了，也把小村叛徒张廷俊的头砍了下来。

这一天，日军在南彦寺村共杀害村民53人。

几天后，八路军二十三团的官兵回到小村，在村东张家菜园里高搭灵棚，为寿山先生举行公祭。300多名官兵在团长郝树祯的率领下，集体跪下，泣泪宣誓，为寿山先生报仇！

又一天夜里，宋任穷骑一匹枣红马来到张寿山坟前，磕头致哀，并向陪祭的当地干部传达邓小平和冀南行政公署的命令：将南彦寺乡南彦寺村改名为寿山寺乡寿山寺村。接着，他掏出一张纸，交给寿山先生的二儿

子张化普，嘱咐道：“从今以后，可以凭此证向当地抗日政府领取抚恤金。”

张化普现住在黑龙江省塔山县，已瘫痪多年。我电话采访他时，他也是哽咽难言。

他是“文革”中出走的。那时，因为父亲与邓小平、宋任穷的关系，寿山寺乡寿山寺村被改名为向阳公社向阳大队，张家被查抄，那张特殊的抚恤证也被烧了，他被造反派吊在庙前的那棵大槐树下，打得死去活来。“文革”过后，国家规范地名，村名又要被改回先前的南彦寺村。张化普为此专程到北京申诉。宋任穷说，寿山先生对革命有大功，还是叫寿山寺村吧。

于是，乡和村的名字又被确定为寿山寺乡和寿山寺村。

我到寿山寺村采访的那一天，正好赶上大集。石榴如火，杏儿金黄，桑葚槐花，各呈黑白。太阳的温暖，静静地飘浮在街市上。人群熙熙攘攘，笑语喧喧，处处飘酒香，满街晃醉人。这么多年过去了，安逸早已成为庸常的生活状态，他们或许不再理会寿山寺的含义，更或许，他们压根儿就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曾经有过一位名叫张寿山的老人……

（阿 喆摘自《人民日报》2015年7月22日，宋德禄图）

国人以精神为本体，西人以生命为本体，这是中西区别之根本。

——陈丹青

太多人高估了他们所欠缺的，又低估了他们拥有的。

——洛克菲勒



迟到半个世纪的荣誉

◎张达明

1942年1月下旬，日军从泰国侵入缅甸并于3月8日占领首都仰光，这不但使盟军士气遭受重创，而且也令中国经缅甸对外的唯一交通要道——中缅公路危在旦夕。

日军占领仰光后，兵分三路继续北犯，以两个联队7000多人的兵力，迅速占领了仁安羌油田区附近，断绝了英军后路，将英军第一师包围于仁安羌油田东北、拼墙河以南地区。日军另一部兵力渡过拼墙河，在北岸建立封锁线，切断了英军的全部供给线，并采取双线封锁，使原本已死伤惨重的英军濒临崩溃。

万分危急关头，中国远征军新38师113团团长刘放吾，接到英军司令史莱姆于1942年4月17日上午11时亲笔签发的手令：“致113团团长刘上校：兹派贵官率领贵团全部乘汽车至拼墙河地区，在该处，您将与安提司准将会合，他将以所有战车配合您，您的任务是攻击并消灭拼墙河北岸约两英里（3.2公里）公路两侧之敌军。”

在征得上司、新38师师长孙立人同意后，刘放吾立即带领不足一团的兵力发起仁安羌战役，和数倍于己的日军展开激战。经自1942年4月18日起的三昼夜殊死拼杀，歼灭日军千余人，迫使敌人弃尸逃窜，仁安羌战役大获全胜。

此役，刘放吾率领的113团不仅救出已经绝望的英军第一师和装甲第七旅官兵7000多人、战马千余匹，还救出被日军

俘虏的美国记者及相关人士500余人。他们在被解救后情不自禁地高呼：“中国军队万岁！”

仁安羌大捷震动了世界，这是自清朝中叶以来，中国军队在异域首次取得以少胜多、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辉煌战果。战役结束后不久，刘放吾由上校晋升为少将。



但长期以来，在历史记载中谈到仁安羌大捷时，只提到中国远征军新38师解救盟军的事迹，却很少谈及身先士卒、冲锋陷阵的第113团团长刘放吾。刘放吾又是一个淡泊名利之人，他只是摇头叹息，从未在任何人面前谈起过自己的“当年之勇”。

除了打仗别无一技之长的他，退役后生活陷入了困境，只得以卖煤球为生。这从他在1943年7月18日写给孙立人的信中可窥见一斑：“现职家有七旬余老母在堂，素乏奉养……下有妻儿数口，大者尚不盈十岁，

正在求学之中，小者犹在怀抱，嗷嗷待哺，年来全赖几斗军米勉强维持生命以度活……际此困难严重、物价高涨数百倍之日，全家大小唯有束手待毙而已。”

如果不是后来发生了轰动一时的“冒牌将军”案，刘放吾这颗“沧海遗珠”也许还要被埋没更多时日。

在仁安羌大捷中被刘放吾解救的一位英军炮兵团团长菲士廷，于1950年晋升为中将，当上了英国驻香港陆海空三军司令。每每回想往事，他总觉得应该找到当年的救命恩人，以表感恩之情。于是，他开始着手寻找。这时，一个叫林彦章的难民听说此事后，打听到一个茶楼的掌柜曾是中国远征军的一位副师长，便设法与其套近乎，混熟之后，林彦章将这位前任副师长的军服及勋章全部借了来，又搜集了不少中国远征军的历史资料。不久他就堂而皇之地去见菲士廷，说自己就是当年113团的团长。

他居然骗过了菲士廷，摇身一变成了菲士廷家的座上宾。此后，林彦章经常以菲士廷的名义出入上流社会，到处行骗，大发横财，直至1963年8月东窗事发而被捕。

媒体在揭露假将军的同时，不约而同地想到，谁才是当年的那位将军？经多方探寻，终于在一座煤矿找到了正在做煤球的刘放吾。在记者的一再追问下，刘放吾道出了仁安羌大捷的真相，经媒体报道后，震惊世人。

1992年4月20日，是仁安羌大捷50周年纪念日。此前的4月10日，在美国芝加哥市的卡尔登酒店大厅，英国前首相撒切

安闲清福

●那秋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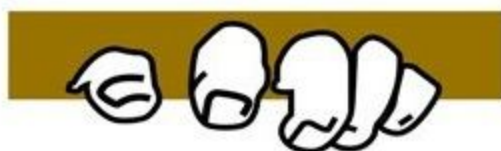
《笑林广记》中有这样一则故事：一鬼托生时，冥王判作富人。鬼曰：“我不愿富。只求一生衣食不缺，无是无非，烧清香，吃苦茶，安闲过日子足矣。”冥王曰：“要银子使，再给你几万也是有的，但这样的安闲清福，难给你享啊。”安闲才是人生至境，如水扬清波，如风过疏林。每一个日子，看起来很平淡，但都是心头的日子，潜着香，藏着甜，是自己真正活过的每一天。

（云开雾散摘自《新民晚报》2015年7月14日）

尊重

●李广森

在台湾阳明山蒋家官邸，看到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卧室，门对门分房分床，便向工作人员询



意 · 林



问：“两个人怎么不睡一起呢？”

工作人员说：“蒋公作息时间非常严谨，始终保持军人作风，按时睡，按时起，非常规律，雷打不动。宋女士是个‘夜猫子’，晚上不睡，早上不起，又读书，又画画，很不规律。他们的卧室分屋分床门对着门，可以分，可以合，既能相互关照，

又不打扰对方，很方便。”

（刘 振摘自《今晚报》2015年7月14日）

大雨

●黄惠子

还记得儿时，在老家，于一场大雨中活蹦乱跳。

现在，此刻，路上人们行色匆匆，车与车互不相让，大家不管做什么，似乎都显得很暴躁。身上东西也太多，手机、平板电脑、名贵着装，它们在大雨面前变得不堪一击，于是大雨变成了阻碍，叫人狼狈。可曾想，在我们什么也没有的年纪，雨尽管下，不怕淋湿简单的衣服和鞋，痛快地投入雨中，从不必小心翼翼来保护那些所谓的贵重物品。

原来，并不是雨越下越大，而是我们把自己围得越来越小。

（王传生摘自《新民晚报》2015年6月10日，（德）施拉德图）

尔夫人紧紧握住93岁高龄的刘放吾的双手，再三感谢他50年前于缅甸仁安羌解救英军的壮举。4月20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彼得·威尔逊、美国洛杉矶议会议长迪恩·巴纳均向刘放吾发函致敬。

同年6月10日，英国国防部

长马尔科姆·里夫舍德致函刘放吾：“今年是仁安羌战役50周年，我愿在此向您及您团官兵对英军的支援，表达最诚挚的谢意。”7月27日，时任美国总统的乔治·布什也致函刘放吾：“在仁安羌大捷50周年之际，我愿再次代表国家，感谢您解救500名美国记者、传教士和数千名英军的英勇行为。”

台湾当局也给刘放吾补发了一枚陆海空军甲种一等奖章。

面对种种荣誉，刘放吾只是淡然道：“那是并肩战斗的友军，友军在遭遇危难

时，援救他们是作为一个军人应该做的，不能列为战果。”

历史是公正的，真正的民族英雄刘放吾应得的荣誉，虽历经半个世纪后姗姗来迟，却被永远载入史册。

1994年，刘放吾在美国洛杉矶逝世。他的次子刘伟民在整理父亲的日记时，看到父亲在记述仁安羌大捷时引用了唐代诗人陈陶的《陇西行》：“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

将军一生戎马沙场，这短短的诗句，道尽了他对残酷战争的无奈。

（周继红摘自《羊城晚报》）





总防范别人，自己先犯错

●罗振宇

清代历史上，诛杀顾命大臣的事件有两次：第一次是清初康熙擒鳌拜，第二次是慈安、慈禧串通恭亲王奕訢诛杀肃顺，发动“辛酉政变”。

咸丰皇帝死的时候，小皇帝同治尚且年幼，慈安、慈禧俩太后年纪轻轻，又是妇道人家，所以咸丰皇帝事先把身后的政局安排得非常好。他安排了以载垣、端华、肃顺等人为首的八个顾命大臣，将朝廷所有的日常行政事务都交给他们处理，但是皇家也保留了最后的否决权。咸丰皇帝把自己的两枚玺印分别给了两个太后：一枚叫御赏印，给了慈安；另一枚叫同道堂印，给了载淳（因载淳年幼，慈禧就顺理成章地代理了钤印之责）。

当时朝廷的公文下发流程是这样的：所有要下发的谕旨最后都要让太后过目，太后觉得不行就行使否决权；如果觉得没问题，慈安太后就在谕旨开头盖下御赏印，慈禧太后在谕旨末尾盖下同道堂印。这样一头一尾，就算是皇家同意了。

按说这个体制没有问题，可以照此运行。但是肃顺不这样想，他一直担心这俩太后要夺他的权，甚至在咸丰皇帝还没死的时候，他就建议：“你把这俩寡妇留在世上，恐怕对国家不利，你要不要学学汉武帝，行钩弋之事？”

什么叫钩弋之事？汉武帝临死的时候，觉得儿子年幼，他妈妈钩弋夫人还很年轻，万一将来勾搭上外面的男人或勾结外臣，那

刘家的江山不就完了？所以就把小皇帝的妈妈钩弋夫人给杀了。

肃顺一开始就对慈禧相当顾忌，也想让咸丰皇帝把慈禧宰了算了，可惜没能如愿。咸丰皇帝死后，他越来越担心。

当时有一个叫董元醇的御史，上了一道折子，提议请太后出来垂帘听政，并且让恭亲王也加入执政队伍。

这时候肃顺如果心里没什么的话，其实完全不用搭理他。

但是肃顺如临大敌，他担心这个人万一挑动了太后们的心思，太后真要垂帘听政怎么办？所以他草拟了一道谕旨，用非常严厉的言辞批判了董元醇，然后拿到太后那儿盖章。

但两宫太后拒绝盖章，她们觉得在没有回北京之前就把这样的矛盾暴露出来，没有必要。这道折子就不要发了，按照当时的术语，叫“淹了”或者“留中不发”。肃顺当然不干了，他的兄长、另外一个顾命大臣端华，就跑到太后那儿去吵，声震屋宇，把小皇帝都给吓哭了，还尿了。即便如此，两宫太后依然坚持不能发。于是八位顾命大臣就“罢职搁车”，意思是如果你们不发这道谕旨，我们就罢工，爱咋咋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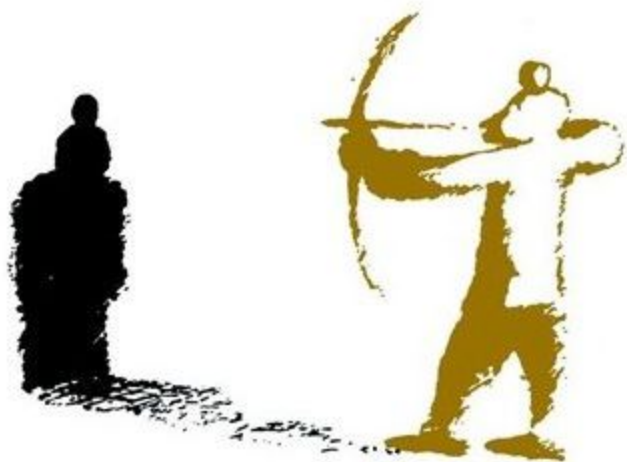
太后们一看，也没办法，只好同意了。但问题是，这个梁子就此结下了。

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哥哥死了，作为弟弟，于情于理，恭亲王奕訢都该到



民意是如何被篡改的

●宋桂奇



2013年12月28日，白岩松的新书《一个人与这个时代》在北京一家书店举行首发式时，话筒出现问题，于是女主持人在开场前就大声地“喂，喂”，继而又问：“后面的观众听得到吗？”虽有观众说“听不到”，但同样也没听到的主持人却说：“哦，听得到是吧？”闻此，白岩松随即借题发挥道：“知道民意是如何被篡改的了吧？回望历史，多少次都是这样的：‘你们的日子过得好吗？’‘不好！’‘啊，挺好的，是吧？’于是形势大好！”听完这发人深省的话语，现场一片笑声和掌声。

观众说“听不到”，主持人却以为“听得到”，这种误会虽属无意，但导致的结果肯定是“鸡同鸭讲”。

（赵 雷摘自《做人与处世》2015年8月上）

避暑山庄去奔丧。可是八大顾命大臣特别紧张，担心他和两宫太后串通密谋，一直不让他们见面。后来据溥仪讲，当时恭亲王奕訢扮成萨满（巫师），见了两宫太后，密谋如何把这八个人干掉。所以，在两宫太后扶着咸丰皇帝的灵柩回京的路上，奕訢就派兵把八大臣给抓了。

回到北京之后，两宫太后当着所有大臣的面一通大哭，声泪俱下地说：“我们孤儿寡母，受了这帮奸贼的逼迫，大家说应该怎么办？”大家都说杀了他们，于是，慈禧太后就把这帮人给杀了。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辛酉政变”。

我们仔细分析一下这个过程，就会发现肃顺也是作死。因为肃顺这个人是一位能臣，他经常挂在口头上的一句话就是：“我们旗人都是浑蛋，一定要重用汉人。像曾国藩这种人，一定要重用。”有一次咸丰皇帝要杀左宗棠，肃顺还设法营救，可见他是一个明白人。

明白人为什么会犯下这样的大错呢？很简单，不会就事论事。他总是在想，别人会怎么看我？两宫太后会不会夺我的权？如果要夺我的权，我应该怎么防范？说白了，就是他想多了。

想得多，他的行为就会变形；行为一变形，对方心里就会结疙瘩；对方心里结了疙瘩，对方的行为也会变形，最后双方自然而然就产生了冲突。

如果肃顺能够学学曾国藩就好了，“结硬寨，打呆仗”，遇到任何事先不管周边的因素，而是看这事该怎么处理。董元醇上折子不对，把他驳了就

完了，跟太后较什么劲呢？奕訢跑来奔丧，就让他见太后，你拦什么呢？正是因为肃顺在防范别人的时候，自己掉到了一个大坑里，最后才会身家性命不保。

其实，我们普通人处理人际关系的时候，也经常会犯这样的错误。还记得俄国作家契诃夫写的那篇著名的小说《小公务员之死》吗？主人公是怎么死的？被将军吓死的。将军真要处理他吗？没有。他不就是在戏院看戏的时候，把唾沫星子溅到了将军的光头上吗？他老是担心将军要对他怎么样，最后把自己活活吓死了。这就是一种纠结。

还有另外一种纠结：为了防范别人而做出过度的反应。《吕氏春秋》里面就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越王有四个儿子，有个奸臣要陷害他们，说这个儿子要造反，那个儿子要造反。越王先杀了一个，又杀了一个，然后再杀了一个。等到奸臣想要陷害第四个儿子的时候，越王已经不信了，自己只剩下这一个儿子了，他还能造反吗？但是越王没想到，他的儿子不这么想。他的儿子想，奸臣一怂恿，你就把我的三个哥哥砍了，这个时候我还能保得住命吗？最后真的造反，把越王给杀了。越王临死的时候后悔万分，早知道把这最小的儿子也杀了。

这就是人际关系当中的互动博弈，当你总在防范别人会怎么样的时候，你的行为、你的判断就会产生错误。

（陈海蓉摘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成大事者不纠结》一书，王 青图）



我与妻子的传奇缘分

◎余 杰

弱与无助，我终于提起了笔，给你，严肃而真诚。

这封信深深地打动了，我立刻给她回了一封信。从那以后，我们开始通信。我们谈论的都是些严肃而沉重的话题，不太像青年男女之间的通信。

就在我26岁生日的那天深夜，我突然接到一个陌生女孩的电话。那充满磁性的声音，我好像在梦中听到过。对了，那声音来自那些信件！

我说，今天是我的生日。她说她并不知道这一点。她给我打电话的原因是，她刚刚拔掉了一颗智齿，麻药失去药效后，伤口疼得厉害。由于她身边没有亲人和朋友，不知为什么就想给我打电话，只给我一个人打。

那天晚上，我们居然在电话中聊了一个多小时。她说，她每天都与那些豪商巨贾打交道，在香港也见到过腰缠万贯的商人，但是，金山银山也有散尽的那一天，而诗人的诗句永远在自己的心中。茫茫时空中，多少政客和富翁灰飞烟灭，穷困潦倒的诗人却能够以一句诗歌而获得永恒。

窗外，是北京已经很少见的满天星光，南方的星光一定比北方的还要亮。天空的星辰实际上对应着我们内心的星辰，正像康德说的那样，心中有星星的人，头上才会有星星。

几天以后，她获得了一次到北京出差的机会，我们约好在北大校门前见面。远远地，我就看见了一个清秀的女孩站在寒风中，嘴唇冻得发白。我想，一定是她。

她来到我那简陋的小屋，我打开电脑给她看我新写的文章。她毫不客气地就在上面修改起来，好像在修改自己的文章，而一向像珍惜生命一样珍惜自己文字的我，对她这种“放肆”的行为，居然没有生气。刚刚见面，一切礼仪都已经消失了，我们好像认识了几个世纪。后来，妻子说，当时她就有一种十分奇妙的感觉，觉得这间小屋就好像是属于她自己的。

见了第一面，一切就已经尘埃落定。她回了一趟南方，放弃了当时拥有的所有东西。老板提出给她加一倍的薪水，并安排一套别墅给她自由使用。

我与妻子的缘分，比电影《罗马假日》的情节还要富于传奇性。本来我已经不相信20世纪末还有这样的传奇，但它确实发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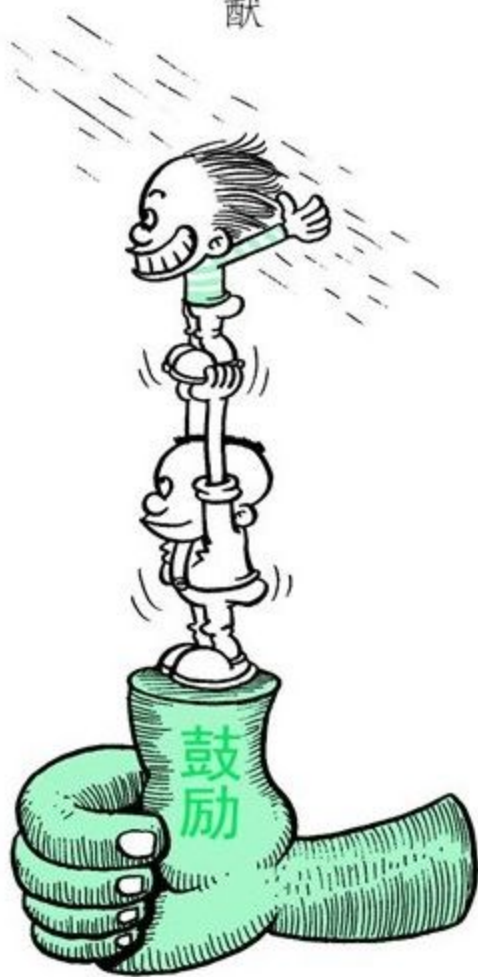
妻子是我的读者。她大学时学的是金融，毕业后在南方的一家香港公司担任部门经理。她喜欢文学远远甚于喜欢自己的专业。一个偶然的机会，她读到了我的《火与冰》，便按照模糊的地址，尝试着给我写了第一封信。她在信中写道：

迄今为止从未给陌生人写过信，但王小波的死给了我极大的冲击，因为他就是我曾想要给他写信的人，而如今，信还在心里酝酿，人已渺然不知所向。我体味到前所未有的痛心与悔恨。世事喧嚣，人生寂寞，我一直以为，支撑我生活的动力便是罗素所称的三种单纯然而极其强烈的激情：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以及对人类苦难痛彻肺腑的怜悯。而在这样的动力下生活注定是孤独的，无尽的近乎绝望的孤独。我想，如果还有一双眼睛同我一同哭泣，那么生活就值得我为之受苦吧。

于是，因为王小波，因为孤独，因为生命的脆

第四种说话之道

游识猷



鲁迅写过一则故事，说一家人得了男孩，满月时抱出来给客人看。客人甲说：“这孩子将来是要发财的。”客人乙说：“这孩子将来是要做官的。”客人丙说：“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

结果自不必说，那家人对甲、乙千恩万谢，然后合力将丙痛打一顿，赶将出去。鲁迅感叹，许诺升官发财者是在哄人，却得到好报；说必死的是在说实话，但遭遇痛打。

难道全世界只剩这一句实话？就没有诚实且讨喜的第四种说话之道吗？

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的心理学者谢莉·加贝尔表示，当然有，这种方法叫作“ACR说话法”。

加贝尔曾在《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期刊上发表论文，将可能的回应方式总结为四大类。

熟人之间常见“被动暖心回应”，简短的一两句恭贺，虽然不伤人，但容易令人觉得不够真诚。

亲近的人之间常见“主动冷水回应”，回应者本着“戒骄戒躁为你好”的主旨，借用“每朵乌云都有金边，每朵白云都有阴影”的辩证思维，指出好消息之下潜藏的种种隐患。

尽管“主动冷水回应”总能成功地让报喜者意兴阑珊，但还不是最伤人的一种，最糟糕的是“被动冷水回应”，回应者往往对报喜者的好消息无动于衷，只关注自己或者毫无反应。

四类回应中，有且仅有一类回应是“正确的回应方式”——“主动暖心回应（actively constructively respond）”，简称ACR。首

先发自内心地为对方高兴，其次要主动追问更多细节。

ACR说话术有多重要？加贝尔发现，通过观察一对伴侣的交流方式，就能预测他们在4年内是否会分手，正确率超过83%。关键点并非“伴侣受挫时，你如何安慰”，而是“当你的伴侣心花怒放时，你如何应对”。

大部分人都懂得如何“共患难”，却不知如何“同富贵”。当伴侣消沉落寞时，我们自然而然就知晓，此时应当温暖陪伴、安慰打气。然而，没人教过我们该如何应对伴侣的好消息，伴侣兴高采烈时又该怎么说。外面虚情假意的恭贺已经够多，不缺我一个锦上添花？正因为我是自己人，所以更要诚实指出福兮祸所伏？

不不不！请迅速丢掉你那些即将出口的“但是、然而、不过呢”，以及“就算、即使、别忘了”。倘若当下是欢庆时刻，请暂且收起你的顾虑警惕，过一阵再展现先见之明也不迟。

加贝尔曾不止一次见证，伴侣中的一方对好消息给出ACR回应，会迅速让对方的情绪更加高涨，而对方的好情绪又反过来传染提升了自己的情绪，加贝尔称之为“情绪的提升螺旋”；反之，一个兴冲冲带回好消息却遭遇当头冷水的人情绪会迅速低落，两人互相影响，情绪都变得更加恶劣，就会变成“情绪的下降螺旋”。参加满月宴时，不妨说句“瞧这孩子被照顾得多好！你们是怎么喂的？”既不说谎，亦不挨打，不是皆大欢喜吗？

（水云间摘自《南方人物周刊》2015年第20期，魏克图）

她微微一笑，拒绝了。

于是，她来到北京这座陌生而寒冷的城市，来到我这间时常停水、停电的小屋，成了与我风雨同舟的人生伴侣。她曾经是时尚的都市白领，穿名牌的衣服，用昂贵的化妆品，去女子健身俱乐部。如今，她舍弃了当初这些奢侈的消费习惯，因为她选择的人生伴侣是一个穷书生。同时，她也选择了一

条颠沛坎坷的人生道路。我曾经很认真地问她：“假如有一天我像俄罗斯的十二月党人那样，被流放到遥远的西伯利亚去，你怎么办？”她咬了咬小虎牙，说：“我跟你一起去！在那冰天雪地中，我们互相温暖对方。”

（安格尔摘自珠海出版社《沉默的告白》一书，李小光图）



狼的尊严

◎姜戎

这年初冬的第一场雪，很快就化成了空气中的湿润，原野的空气变得寒冷而清新。

小狼越长越大，铁链显得越来越短。敏感的小狼只要稍稍感到铁链与它的身长比例有些“失调”，就会像受到虐待的烈性囚犯那样疯狂抗议：拼尽全身力气冲拽铁链、冲拽木桩，要求给它增加铁链的长度。不达到目的，小狼几乎不惜把自己勒死。小狼咽喉的伤还未长好，陈阵只得又为小狼加了一小截铁链，只有20厘米长。然而，陈阵不得不承认，对已经长成大狼的“小狼”，新加长的铁链还是显短，但是他不敢再给它加长了。否则，铁链越长，小狼助跑的距离就会越长，冲拽铁链的力量就会越强。陈阵担心铁链总有一天会被小狼磨损冲断。

开始采取狱中斗争的小狼，对拼死争夺到的每一寸铁链都非常珍惜，只要铁链稍一加长，它就会转圈疯跑，为新争到的每一寸自由而狂欢。陈阵不得不让小狼继续忍受，面对着雪原上连大狼都难以生存的漫长严冬，它一旦逃离这个狼圈，就只有死路一条。小狼不断挣扎，更加延缓了咽喉处创伤的愈合。

小狼伤情的突然恶化，是在一个无风、无月亮、无星星和无狗吠的黑夜。

那晚的后半夜，陈阵突然被一阵猛烈的铁链哗哗声惊醒。边境大山那边传来了微弱的狼嚎，那些被赶出家园和国土的残败狼群，可能又被境外更加剽悍的狼军团攻杀，只剩下白狼王和几只伤狼孤狼，逃回了边境无人区。然而，它们无法返回充满血腥的故土。狼王在焦急呼嚎，似乎在急切地寻找和收拢被打散的残兵，准备再次率兵攻杀过去，拼死一战。

陈阵最为担心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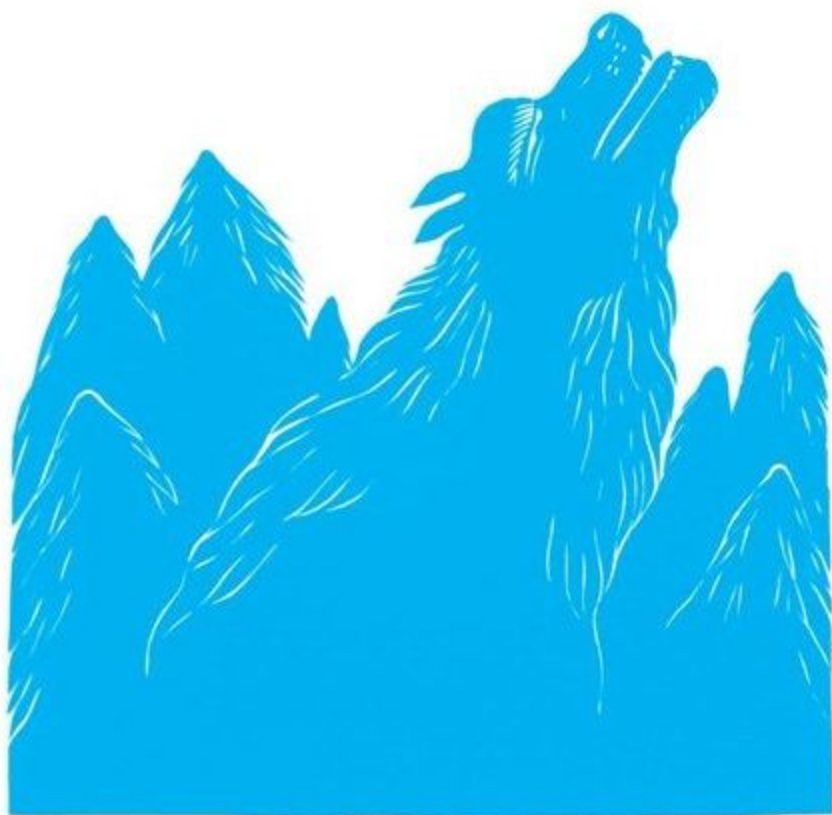
情也终于发生了。久违的狼嚎声唤起了小狼的全部希望，它顿时变得焦躁狂暴，急得想要把自己变成一发炮弹发射出去，又急得想发出大炮一样的轰响来回应狼嚎。然而，小狼的咽喉已伤，它发不出一丝狼嚎声来回应同类的呼叫，它急得发疯发狂，豁出命地冲跃、冲拽铁链和木桩，不惜冲断脖颈，也要冲断铁链、冲断项圈、冲断木桩。

陈阵吓得掀开皮被，迅速穿上皮裤皮袍，冲出了蒙古包。手电光下，雪地上血迹斑斑，小狼果然在大口喷血，一次又一次地狂冲，它的项圈勒出了血淋淋的舌头，铁链绷得像快绷断的弓弦，胸口挂满一条条的血冰。狼圈里血沫横飞，杀气腾腾。

陈阵不顾一切地冲上去，企图抱住小狼的脖子，但他刚一伸手就被小狼吭地一口，袖口被撕咬下一大块羊皮。杨克也疯了似的冲了过来，但两人根本接近不了小狼，它憋蓄已久的疯狂，使它像杀红了眼的恶魔。两人慌忙用一块盖牛粪的又厚又脏的大毡子扑住了小狼，把它死死地按在地上。

小狼在血战中完全疯了，咬地、咬毡子、咬一切它够得着的东西，还拼命甩头企图挣脱锁链。陈阵觉得自己也快疯了，但他必须耐着性子一声一声亲切地叫着小狼、小狼……不知过了多久，小狼终于拼尽了力气，慢慢瘫软下来。两人像经历了一场与野狼的徒手肉搏，累得坐倒在地，大口喘着白气。

天已渐亮，两人掀开毡子，看到了小狼疯狂反抗、拼争自由和渴望父爱的严重后果：那颗病牙已歪到嘴外，牙根显然是在撕咬那块脏毡子的时候被拽断的，血流不止，它很可能已把脏毡上的毒菌咬进伤口里。精疲力竭的小





恩佐·法拉利

不增产的法拉利跑车

◎周牧辰

断飙升，以致供不应求。就在公司上下都觉得恩佐一定会多增添几条生产线、增加跑车的年产量时，他却宣布不仅不会增产，还要严格控制产量，并且要求公司每年对外销售的跑车不得超过3000辆！

销量被限制，也就意味着利润被框死，唾手可得的钱居然不去赚，恩佐严控产量的意外决策让公司上下一片哗然，高层们更是对此深表不满。面对众人的不满，恩佐在一次公司会议上做出了回应，他说：“法拉利跑车是一位绝代风华的佳人，值得所有爱车人的等待和期许。很多人都以拥有一辆法拉利而感到骄傲，更多人则希望将来某一天能拥有

一辆。如果我们控制了产量，市场上就不会遍布法拉利的身影，法拉利新老车主的跑车也会因此变得更为稀有、更为保值，车主们也会更加荣耀；反之，如果我们不控制产量，让法拉利跑车到处都是，那么谁还会以拥有它为荣呢？”

恩佐最后还表示，增产是短视之举，而限量生产才是占领未来市场的明智之选。今天，法拉利公司依然秉承着恩佐的理念，虽然订单多如雪片，但每年的产量却严格控制在7000辆之内。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法拉利跑车依然是世界上最好的跑车。

（今云摘自《中国花卉报》2015年7月15日）

狼，喉咙里不断冒血，小狼瞪着血眼，一口一口地往肚子里咽血。皮袍上，厚毡上，狼圈里，到处都是大片大片的血迹，比杀一匹马驹子的血似乎还要多，血都已冻凝成冰。陈阵吓得双腿发软，声音颤抖、结结巴巴地说：“完了，这回可算完了……”杨克说：“小狼可能把身上一半的血都喷出来了，这样下去血会流光的……”两人急得团团转，却不知道怎样才能给小狼止住血。陈阵慌忙骑马去请毕利格阿爸。老人走进蒙古包，摇了摇头说：“活不成了……趁着它还像一只狼，还有一股狼的狼劲，赶紧把它打死，让小狼像野狼一样战死！别像病狗那样窝囊死！成全它的灵魂吧！”

杨克用靴子踢着雪地，低头说：“小狼已经不是狼崽了，它长大了，它会为了自由跟咱们拼命的，狼才是真正‘不自由，毋宁死’的物种。照这个样子，小狼肯定是活不了了，我看还是听阿爸的话吧，给小狼最后一次做狼的尊严……”

陈阵松开了手，小狼立即大口大口地吞咽雪块。虚弱的小狼疼冷交加，浑身剧烈抖动，犹如古代被剥了皮袍罚冻的草原奴隶。小狼终于站不住

了，瘫倒在地，它费力地蜷缩起来，用大尾巴捂住自己的鼻子和脸。

小狼还在发抖，每吸一口寒冷的空气，它全身都会痉挛般地颤抖，到吐气的时候颤抖才会减弱，一颤一吸一停，久久无法止息。

陈阵猛地站起身，跑到蒙古包旁，悄悄抓起半截铁锹，然后转过身，又把铁锹藏到身后，大步朝小狼跑去。小狼仍然端坐着急促喘息，两条腿抖得更加厉害，眼看就要倒下。陈阵急忙转到小狼的身后，高举铁锹，用足全身的力气，朝小狼的后脑砸了下去。小狼没有发出一点声音，软软地倒在地上，像一只真正的蒙古草原狼，硬挺到了最后一刻……那个瞬间，陈阵觉得自己的灵魂被击出体外，他似乎又听到灵魂冲出天灵盖的铮铮声响，这次飞出的灵魂好像再也不会回来了。

陈阵像一段惨白的冰柱，冻凝在狼圈里……

那一刹，陈阵相信，他已见到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内心的狼图腾。

（张建中摘自长江文艺出版社《狼图腾》一书，赵希岗图）

“《读者》光明行动”(29) ——用心看世界，用爱传光明

小荣的故事在第16期杂志报道后，得到很多爱心人士的关注。沈阳的王先生打来电话说想要帮助这个小朋友，并资助了她4个疗程的全部费用。

8月4日是小荣的生日，听说她从来没有吃过蛋糕，“《读者》光明行动”的工作人员专门买了一个拿到医院。同样来自贵州的小虎和小雄也是8月份的生日，3个孩子蹲在病房里简单拼成的桌子边，伴着烛光，一起唱生日歌，许下愿望……

经过45天的治疗，小荣的视力得到了明显提升，右眼矫正视力达到1.2，左眼为0.9。目前，小荣已回到贵州老家。再过几天就要开学了，愿她今后的生活里也能多一些阳光。

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胜利70周年。革命老区人民为了取得抗战胜利，抛头颅、洒热血，做出了巨大牺牲。今天，虽然硝烟不再，但多数老区仍然是经济发展的落后地区，需要得到更多的关注。“《读者》光明行动”决定将2015年筛查救助的重点放在革命老区。自“情系老区·同心义诊”活动发起以来，专家医疗队赶赴沂蒙山区、太行山区、大别山区、湘赣革命根据地、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为山东、河北、河南、湖北、江西、湖南6省22个县市的5685名儿童免费检查了视力，并确诊964人患有弱视。截至发稿日，已有299个孩子结束治疗，出院返乡。（详细治疗信息已在新浪、腾讯官方微博@读者-光明行动公布，欢迎监督查询。）

“《读者》光明行动”开通支付宝捐款账户，打开支付宝手机客户端，“扫一扫”或直接转账到支付宝账户dzgmx2013@163.com即可完成捐赠，即时到账，方便快捷。



《民国记忆——〈读者〉插图版画精品》



《民国记忆——〈读者〉插图版画精品》是从鲁迅美术学院李晨教授多年来为《读者》创作的百余幅民国人物插图中，精选出30幅制作成的版画艺术品。成品尺寸：320mm×450mm；版种：石版；数量：限量发行80套。版画基材采用法国进口的康颂版画专用纸，制作精良考究，装帧大气沉稳，由作者亲自签名、编号，由读者杂志社颁发收藏证书，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准和收藏价值。

户名：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兰州广场支行

账号：6200 1750 1010 5150 5588

咨询电话：0931-8773243、8773350



定价：30000元



关注读茶会， 即刻享有专属福利

读茶会是由读者杂志社发起创建的互联网主题社交平台，是为《读者》粉丝量身定制的会员俱乐部。

读茶会以“读好书、喝好茶”为初创理念，以“让生活更有品”为使命，以提供面向《读者》粉丝的延伸服务为宗旨。

读茶会以读书、喝茶为主题，为会员们提供精品阅读、文化交流、众筹公益、线下读书会、茶会活动等服务内容，并将陆续组建地方分会，为全国各地的《读者》会员提供本地化延伸服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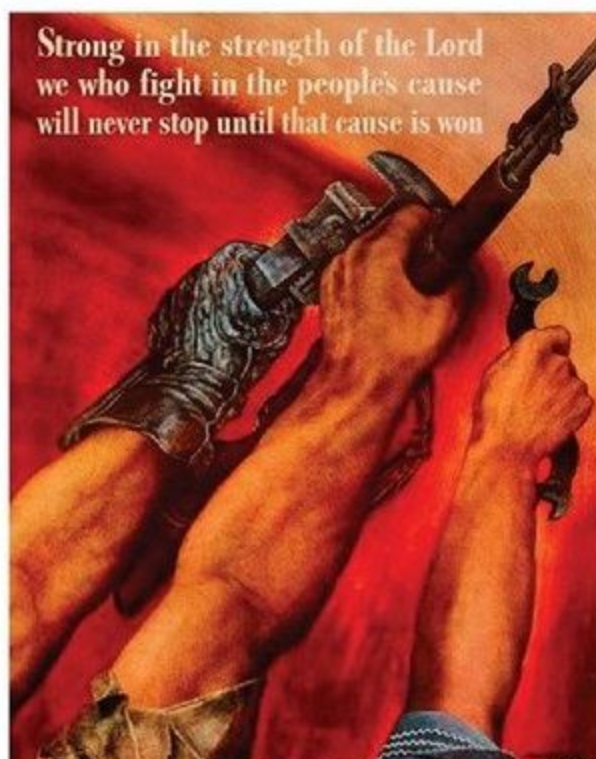
为庆祝读茶会正式运营，答谢《读者》粉丝的厚爱，现特别推出读茶会会员专属福利——只要扫描下方二维码，关注ducha798微信公众号，立即获赠50元读茶会代金券！（代金券使用方法参见ducha798公众号内会员公告）

读书喝茶有私享。动动你的手指，快来加入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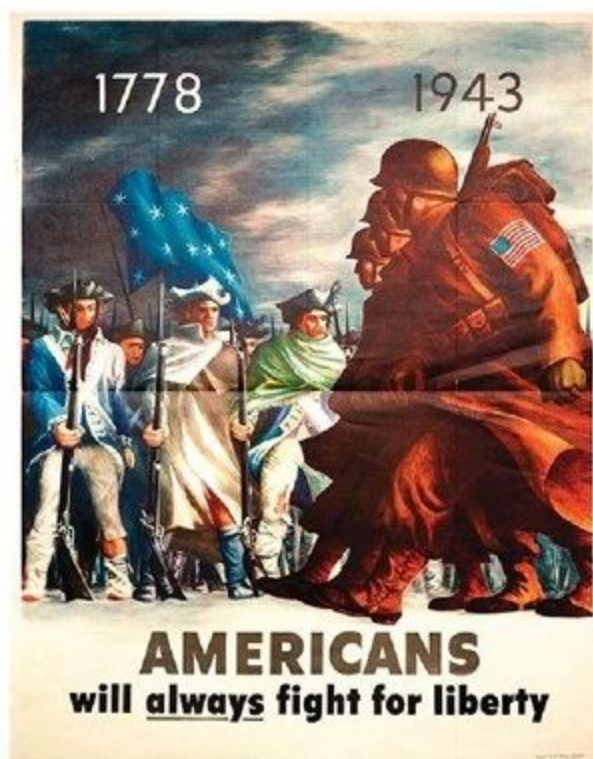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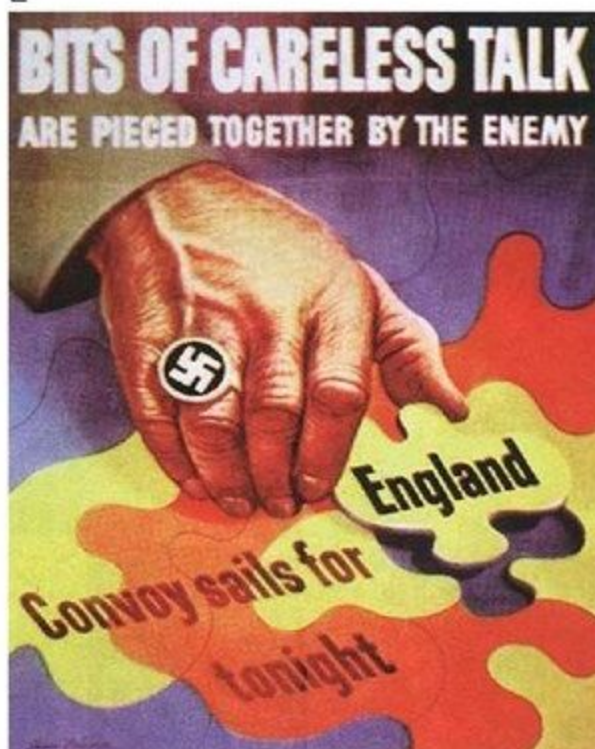
E



F



G



H



I



J



K



L



M (EFG美国 HI英国 J法国 KLM中国)

